

中国政治经济学 年度发展报告（2020）

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编者按 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推动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更好地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服务，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发布《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报告主要以专题形式汇集和反映该年度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进展，并探讨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报告并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力求突出主线和重点，希望能够刻画出报告期内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发展的主要特点和轨迹，从而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2020年的年度报告设立了以下主题：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经典著作研究
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
3.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4. 决战脱贫攻坚、全面决胜小康研究
5. 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6. 国际经济格局新变化与中国开放型经济体制构建研究
7. 数字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8. 货币金融理论与实践研究
9. 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新进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 经典著作研究

李 琼 余清霜*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上，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领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再加上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和列宁诞辰150年，为了深刻缅怀恩格斯和列宁的历史功绩，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发展历程的认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本年度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经典著作学习研究方面，特别是恩格斯和列宁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方面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

一、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和百科全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深刻准确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和方法，并指导我们认识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本质与趋势、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演变的趋势和新特征，特别是如何坚持和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发展《资本论》的理论成果，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当下我们学习研究《资本论》的主要任务和目

* 李琼，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余清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的。2020年理论界的研究依旧是围绕《资本论》中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及其当代应用与价值、手稿文本等方面展开，虽然研究成果在数量方面比上年有所减少，但也取得了较好的研究进展。

（一）《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有过时，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对于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原则和方向上的理论及现实指导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应该以怎样的方法和态度学习和研究《资本论》？邱海平指出，《资本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和思想资源，“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首先是指“坚持和继承、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资本论》的理论成果，其基本原则应该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以坚持和继承为前提，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根本目的正在于更好地坚持和继承”。^①这就需要我们既要在学习和研究中贯彻《资本论》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也要科学地对待《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基本立场、研究目的、基本范畴、基本理论、逻辑方法等各方面成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通过对《资本论》重要理论要素（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和价值观、关于社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及基本矛盾的分析等）的坚持和继承，对《资本论》中的某些范畴和术语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和对象。

董志勇、方敏根据《资本论》中的国民经济循环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原理，和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对立统一关系，阐述了我国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是由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环境、条件等变化引起的，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是经济循环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②因此，新发展阶段与新发展格局是内在统一的。胡博成、朱忆天则从马克思的空间生产理论出发论述了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构建问题。^③他们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围绕资本生产及空间需求，分析了生产

^① 邱海平：《〈资本论〉的创新性研究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

^② 董志勇、方敏：《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历史与实践——以政治经济学为例》，《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12期。

^③ 胡博成、朱忆天：《从〈资本论〉到新时代：马克思空间生产理论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过程、流通过程和资本生产总过程中所需要的生产空间、流通空间和土地空间等经济空间，这些空间是资本实现持续扩张的前提基础，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就是资本不断生产、发掘并占有新经济空间的过程。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畅通双循环的深刻本质就是拓展经济发展空间，避免市场变化引发的经济波动，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蔡仲旺、徐春华运用《资本论》中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对此次疫情对社会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造成的冲击进行了考察，认为发达国家大水漫灌式的经济政策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原理，也不符合中国国情。^① 中国要实现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再生产恢复，需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的指导下，在恢复社会再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基础上，继续实施优化结构和稳中发展的经济策略，并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

张开认为，资本二重性是由劳动二重性派生出来的范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本质内容就是“资本二重性的内在矛盾”，是“商品二因素内在矛盾”的转化和发展形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类资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资本），是马克思“资本二重性内在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创造性转化形式”。立足于马克思劳动二重性之上的“中国特色资本二重性理论”，是理解新型政商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基础。^② 吴宇轩、杨小勇认为人工智能与机器具有相似性，他们根据《资本论》机器大生产理论，提出机器在直接应用它的部门会排挤工人，但同时也能够促进其他部门劳动的增加。他们据此对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全面提高劳动者专业转换能力，从而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就业创造效应的政策建议。^③ 张凯从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价值意蕴三个角度梳理了《资本论》中的反贫困思想，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分析，说明了无产阶级贫困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经济根源和制度根源，为社会主义国家消除贫困提供了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④ 张秀芬总结了《资本论》中的绿色发展思想，并在批判资本主义非绿色发展的现实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构筑绿色发展型美好社会和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等问题。^⑤

① 蔡仲旺、徐春华：《马克思总生产原理对国民经济调控的启示——新冠疫情冲击下的恢复再生产问题》，《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6期。

② 张开：《如何理解资本二重性——兼论新型政商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9期。

③ 吴宇轩、杨小勇：《〈资本论〉机器大生产理论视角下的人工智能就业创造效应探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④ 张凯：《〈资本论〉反贫困思想的三位审视》，《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⑤ 张秀芬：《马克思〈资本论〉绿色发展思想及其实现路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二) 关于《资本论》的重要理论研究

洪银兴介绍了《资本论》中的财富范畴,说明了财富的积累及其属性,指出财富的物质内容是使用价值,现代财富包括物质财富、服务财富、精神财富和生态财富等形态,并分析了财富范畴的理论和现实价值,提出要明确财富这一基本范畴和创造财富的源泉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①冯金华认为,根据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根据等价交换和劳动价值论,可以推导出任意一种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根据等价交换、劳动价值论和生产均衡条件,可以推导出任意一种商品的市场供给曲线,从而用数理的方法说明和证明供求关系及市场竞争机制都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无论是局部均衡价格还是一般均衡价格,都是价值的相应表现形式。^②方敏对理论界存在的几个劳动价值论方面的误解进行了澄清。他指出,劳动价值论不是一种关于相对价格的狭义的价格理论,价值范畴是有现实对应物的客观存在,对价值关系的分析并不否定价值实体的客观性,这两个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不是对立关系。《资本论》对于转形问题的分析既包含了对转形结果的分析,也包含了对转形过程的分析,转形问题的实质是从一种价值关系转化为另一种价值关系,即从简单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劳动价值论包含了供求分析,价格围绕价值的上下波动就是供求与价格相互作用的具体形式,“价值方程”不论其形式简单还是复杂,都和价值范畴及价值规律相违背。^③荣兆梓在对转形问题研究中存在的三大偏误进行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认为以往研究只注意了售卖阶段,忽略了购买阶段成本价格和购买盈余的变化,从而不能理解单次转形结果与N次转形叠加的差异。因此,荣兆梓构建了一个转形问题的C体系,并在转形轮次和转形阶段划分的基础上,在总剩余价值率不变和可变资本与净产品生产价格同方向同比例变动的前提下,建立了“一个总量相等,一个总比率不变”的转形模型,形成内在逻辑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转形问题解决方案。^④

李连波、陈享光运用马克思的生息资本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国家从金融资本到金融化资本的分析,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家庭和个体日常生活金融化趋势。^⑤同时,

① 洪银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财富理论的探讨》,《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

② 冯金华:《价值规律、供求关系和市场机制——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

③ 方敏:《对〈资本论〉中劳动价值论的几点认识与澄清》,《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6期。

④ 荣兆梓:《成本价格转形与转形问题C体系的特点》,《世界经济》2020年第6期。

⑤ 李连波、陈享光:《从金融资本到金融化资本——日常生活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6期。

李连波还对虚拟经济背离与回归实体经济问题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① 谢富胜、匡晓璐在区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货币形式和收入的货币形式的基础上，通过将收入循环过程纳入生息资本和虚拟资本循环理论，揭示了金融部门利润的本质——金融部门所获取的任何形式（利息收入、投机收入和派生收入）的利润最终都源于生产过程中活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中的产业资本积累。因此，脱离实体经济基础的金融化积累体系是不稳定的。以此为基础，基于中国 A 股上市制造业企业 2007—2018 年的经验数据，阐释了我国制造业企业扩大金融活动的现状和动机，对金融活动影响企业利润率的具体路径进行了系统分析，说明了金融活动与企业利润率之间存在着两种动态平衡机制或者说抑制效应，具体来说就是，随着企业利润率的提高而减弱，也会随着企业利润率的下降而增强。其经验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化，准确地说是制造业企业扩大金融活动显著抑制了企业经营利润率，但对我国制造业总体利润率的抑制作用尚不明显。^②

（三）《资本论》手稿及方法论研究

最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8 卷和第 39 卷，收录了马克思在 1863—1867 年期间写的经济学手稿，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2 部分第 4 卷第一册对译文重新做了校订。这些手稿的内容不仅涵盖了《资本论》第 1 卷、第 2 卷、第 3 卷所讨论的大部分内容，还包含了许多超出《资本论》第 2 卷从而具有补充意义的内容。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的“两部门模型”广为人知，守健二通过对 MEGA 中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梳理和整理，认为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多部门分析不仅包含了“两部门模型”，还有“六部门模型”，而这个模型在《资本论》第 2 卷的编辑中被恩格斯完全忽略了。守健二介绍了马克思原始的六部门模型，和马克思关于生产价格及两种均衡状态动态过渡的动态过程的观点。^③ 薛睿系统梳理和介绍了《资本论》及其手稿在法国出版传播过程的三个阶段——1870—1910 年代的传入期、1920—1990 年代的发展期和 21 世纪以来的转型期的情况，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发展脉络和出版传播特征，

^① 李连波：《虚拟经济背离与回归实体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 年第 3 期。

^② 谢富胜、匡晓璐：《制造业企业扩大金融活动能够提升利润率吗？——以中国 A 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例》，《管理世界》2020 年第 12 期。

^③ 守健二：《MEGA 中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新视角——马克思原始的六部门模型》，《当代经济研究》2020 年第 4 期。

为我们了解《资本论》及其手稿在法国的传播和研究状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① 卢江系统梳理了马克思《资本论》及手稿中的技术范畴研究，归纳了马克思基于资本积累的角度从资本积累的质的规定和量的规定，以及基于社会发展的角度从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两方面，对技术范畴展开的二重性批判，并将技术如何影响物质资料生产和劳动力的自由解放科学地内嵌于《资本论》理论体系之中。作者据此提出，只有将技术的应用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才能推动社会健康稳定发展。^② 王蔚根据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分析，对资本影响下科技与劳动的对立进行了阐述，认为这一对立始于科技对劳动的替代，因此，科技的资本主义运用是这一对立的前提，其结果是失业率的上升和资本对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剥夺。^③

对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命题之一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是否需要借助中间环节——生产方式，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郭冠清通过对《资本论》和马克思手稿、书信及MEGA2中其他著作的研究和考证指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贯穿于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到《资本论》的始终。^④ 魏旭、陈冬源通过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再解读指出，将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理解为“逻辑的开端与历史的源起相对应”，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论述的误解和误读。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或相一致，是指对作为社会主体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行事后的逻辑分析并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不是要求逻辑与历史的严格一致。^⑤ 张作云认为，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理论不仅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核心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作者还叙述了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及其结构学说的形成过程和这一理论要点，并说明了这一学说的当代意义。^⑥ 张开则从《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出发，对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的内涵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共同构成《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他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具有历史过渡性的特殊类型的社会生产，其生产过程与资本主义形式之间存在着矛盾，由此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四种形式的危机：剩余价值实现危

① 薛睿：《〈资本论〉及其手稿在法国出版传播的历史演进轨迹》，《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6期。

② 卢江：《马克思技术二重性批判理论研究——基于〈资本论〉及相关手稿的文本考证》，《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③ 王蔚：《资本影响下科技与劳动的对立》，《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④ 郭冠清：《回到马克思：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再解读》，《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

⑤ 魏旭、陈冬源：《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中的逻辑方式与历史方式的辩证统一》，《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1期。

⑥ 张作云：《马克思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理论的创立与当代启迪》，《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

机、微观企业层面有计划与宏观社会层面无政府的矛盾诱发的危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平衡条件失衡危机和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危机。^①

特别需要注意和强调的是，在关于《资本论》基本原理和范畴的研究方面，《资本论》研究哲学化问题依旧在相当程度上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第1、2、3卷分别论述了资本的生产、流通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资本论》是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律的政治经济学著作。^② 遗憾的是，近年来，有人通过模糊马克思使用的某些概念、曲解《资本论》的分析方法、歪曲和错解《资本论》中的某些原文的含义的做法来进行所谓的学术创新，用概括程度更高的抽象层次的研究来论证其表面或逻辑形式上的合理性，不进行任何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研究，将《资本论》作为存在论、本体论、新世界观进行研究，将《资本论》解读为哲学著作。张旭、常庆欣等在一篇文章中反复指出，这类对《资本论》所做的哲学化解读和研究成果，要么只有使马克思退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水平上才能够成立，要么就是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实现的对具体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拉回到一种高度概括的、语言游戏式的、极为倚重有序的观念结构所要求的生硬排列的研究状况，对人们理解《资本论》、深化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规律的认识没有增加新的见解。^{③④} 因此，《资本论》研究哲学化，既伤害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也伤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身。

二、关于恩格斯及其思想的研究

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界深入探讨并全面总结了恩格斯对发展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系统梳理了恩格斯的论述和思想，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思想家。

① 张开：《试论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形式”》，《经济纵横》2020年第8期。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10页。

③ 张旭、常庆欣：《〈资本论〉是光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驳〈资本论〉哲学化》，《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11期。

④ 常庆欣、张旭：《〈资本论〉哲学化解读再研究》，《天府新论》2020年第1期。

（一）恩格斯与《资本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毕生工作”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资本论》。追溯这一伟大著作的创作出版过程，我们看到，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恩格斯初心不忘、始终如一，为《资本论》的创作、宣传、捍卫和完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因此，学者们关于恩格斯的研究和评价都绕不开对“恩格斯与《资本论》”的讨论。

在关于恩格斯与《资本论》的研究中，学者们或从某一段时期，或从某一具体理论出发来评价恩格斯对《资本论》的贡献，而李建平和杨臻煌则按照时间顺序系统完整地梳理了恩格斯对《资本论》的重大贡献。^①下文也主要运用这种方法，对政治经济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总结。

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为《资本论》的写作和出版奠定实践、方法、政治三大基础。实践基础主要是恩格斯的“一文一书一旅”，即恩格斯在接触了大量英国经济事实后，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写作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及恩格斯专门陪同马克思到英国访问。方法基础是指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过程中，恩格斯与马克思由不同的道路走到一起，他们的思想集中体现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政治基础是指马克思、恩格斯致力于把唯物史观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并把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恩格斯在其中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19世纪50年代至1867年，恩格斯不遗余力地支持《资本论》的创作，在理论研究以及物质援助和精神支持方面给予马克思大力支持。首先是为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提供智力支持，包括为研究提供所需的各种材料，通过书信交流与马克思深入讨论经济学理论问题，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恩格斯为马克思提供了大量实际材料和有益思考，推动马克思更快地去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其次是撰写书评宣告政治经济学新时代的到来，科学解读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郑重宣告马克思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此外，恩格斯在经济上对马克思一家进行资助，为马克思从事繁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写作《资本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19世纪70年代前后，恩格斯为《资本论》增光添彩。为了增强《资本论》的社会

^① 李建平、杨臻煌：《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恩格斯对〈资本论〉的巨大贡献》，《东南学术》2020年第4期。

影响力，为《资本论》第1卷撰写九篇书评，打破了资产阶级学者制造的沉默局面，从理论阐述方面很好地宣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的修改过程中，恩格斯提供了重要建议，使得第二版比起第一版无论是在内容的充实还是形式的明确上都大大前进了一步。除了阐述、宣传、建议之外，恩格斯还进行了重要的独立研究，填补了理论空白。张雷声强调，恩格斯不仅在唯物辩证法的形成过程中贡献突出，更是完成了唯物辩证法的系统化和完善化这一艰巨任务。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恩格斯在马克思一生最终未能完成唯物辩证法的专门而系统阐发的情况下，写作了《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对唯物辩证法作了完整准确、系统的阐述。^①

1883—1895年，为《资本论》的完善和传播竭尽全力。包括整理、编辑和出版《资本论》第2卷、第3卷，精雕细刻《资本论》第1卷的新版和英文版。恩格斯对《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编辑出版，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成为学界争论的重点之一。

《资本论》第2卷、第3卷的编辑工作内容十分复杂，耗费了恩格斯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恩格斯所做的不仅是整理马克思的文稿，更重要的是对杂乱的文稿进行合理的编排和结构搭建、补充遗漏、添加注释等。正是恩格斯完成了这些繁重的工作《资本论》才得以面世。张新概括了恩格斯编辑整理出版《资本论》第2、第3卷的主要贡献。在《资本论》第2卷的编辑中，恩格斯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根据马克思的原意，将马克思的手稿编排成为逻辑严密的完整著作；二是为《资本论》第2卷制定完整的章节结构；三是对马克思的原稿作了必要的调整和修改，使其更加准确、完整。第3卷编辑耗费了恩格斯9年时间：恩格斯首先是根据第3卷要研究的核心内容对手稿的篇章结构进行编排，在此基础上对正文缺漏进行补充，最后还根据资本主义新变化写了序言和两篇专论。^②

从恩格斯的编辑工作可以看出，恩格斯对于《资本论》第2、第3卷的出版发挥了核心作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和发展来说意义重大。但是，这仍然避免不了学术界对于恩格斯编辑工作的质疑：恩格斯编辑出版的部分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马克思的思想、是否对原稿进行了篡改等等。客观评价恩格斯的编辑工作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必须完成的工作，也是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关键。恩

^① 张雷声：《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贡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② 张新：《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4期。

格斯在《资本论》第2册第一版序言中明确了第2册手稿的写作顺序，即“第Ⅰ稿—第Ⅲ稿—第Ⅳ稿—第Ⅱ稿”，并指出自己根据最后文稿进行编辑的原则。但是，恩格斯在第一篇的五至八章的编辑中却并未使用第Ⅱ稿，由此引发了部分学者的质疑。王旭东对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2册的编辑原则进行了深入考证，发现提出质疑的国外学者实际上误读了恩格斯的编辑原则，没有理解恩格斯所说的“最后文稿”的适用范围。^①这一解读为理解恩格斯的编辑原则提供了新视角，肯定了恩格斯编辑工作的严谨性。米夏埃尔·克莱特科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是恩格斯与马克思长期合作形成的共识，二是恩格斯是唯一能够识读马克思《资本论》手稿的人，三是恩格斯本人有很高的学术素养和渊博的知识，进行的补充没有违背马克思原意，使流畅、成熟的《资本论》得以出版。^②程恩富和朱炳元也对恩格斯的编辑贡献给予了肯定，认为恩格斯是唯一能够胜任这一工作的人：首先，恩格斯对《资本论》的思路、内容、观点非常熟悉；其次，恩格斯具备编辑《资本论》所需的理论实践积累和专业能力。^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恩格斯早年的学术和实践经历为他编辑《资本论》提供了可能性，而他强烈的使命感则支撑他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

恩格斯对《资本论》第2、第3卷的编辑出版是他对《资本论》研究作出的最为显著的贡献，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了他对《资本论》整体结构的研究以及对第4卷所做的开创性探索。顾海良总结了恩格斯关于《资本论》整体结构和第4卷的贡献：第一，在深刻理解理论逻辑到历史逻辑的序列结构基础上，确定了《资本论》4卷结构；第二，对《资本论》第4卷的主题进行了探索，计划以《手稿》中“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编辑文稿，并对编辑工作做出了具体的设想。^④这一工作虽然没有最终完成，但是正是恩格斯的探索和设想，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资本论》的整体结构，也为继续研究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二）恩格斯与唯物史观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

① 王旭东：《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2册的编辑原则考证》，《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

② 米夏埃尔·克莱特科：《如何评价恩格斯对〈资本论〉的编辑工作》，侯振武译，《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5期。

③ 程恩富、朱炳元：《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0期。

④ 顾海良：《恩格斯对〈资本论〉整体结构及第四卷的研究》，《经济纵横》2020年第10期。

点。作为一种崭新的科学的历史观，它是由马克思首先发现并作了明确而系统的阐述的。但是纵观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在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恩格斯通过不同的道路与马克思走到了一起，在争取思想解放的斗争尤其是在亲身考察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第二，在马克思未能完成对唯物史观系统阐发的情况下，恩格斯推动了唯物史观的规范化构建、完善了马克思的历史发展动力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为深化与传播唯物史观作出了独特贡献。张雷声、张娥、刘同舫、李福岩等学者深入研究了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立、发展过程中所做的工作。^{①②③}

早年期间，恩格斯和马克思通过不同的道路发现了唯物史观，得出了“政治及其历史应该用发展中的经济关系来解释”的相同看法。其中恩格斯独立创作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提出的诸如社会发展是由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等观点，为马克思后续的批判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他们共同写作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对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对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进行了系统阐释和具体应用。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马克思明确表述了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但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两次表述都不是成熟、完整的唯物史观。为了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恩格斯晚年期间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梳理和补充，并做出了创造性的发展，使得唯物史观得以系统化和完善化。

恩格斯为唯物史观的系统化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梳理唯物史观形成史，明确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其他哲学思想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二是重新强调了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尤其是对经济因素“归根到底”的作用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明确了它的辩证含义，包括经济因素决定作用的间接性、历史决定因素的多样性、经济因素发生作用的基础性。虽然恩格斯的这部分工作在内容上并没有明显突破马克思的思想，但却使得唯物史观在形式上更加全面、系统，表述更加清晰。

恩格斯在晚年时期，出于理论发展和实践变化的需要，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完善和创造性的发展。首先，恩格斯完善并拓展了马克思的历史动力理论。恩格斯强调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相对独立性是指这种独立性是有范围

① 张雷声：《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贡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② 张娥、刘同舫：《恩格斯晚年在何种程度上推进了唯物史观》，《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③ 李福岩：《恩格斯对〈资本论〉的思想创见》，《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6期。

限制的，是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的，这是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出的重要补充。此外，恩格斯提出了“历史合力论”，反对将经济因素作为唯一决定因素，拓展了考察历史决定因素的领域。恩格斯的补充和拓展使得马克思历史发展动力理论更加完整和系统化。其次，恩格斯完善和拓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在俄国农村公社发生重大变迁之后，恩格斯对其作出了丧失“跨越”可能性的判断，从而为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跨越”条件的判断提供了现实案例，使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更具科学性。恩格斯不仅通过结合现实变化来完善理论，还将理论研究运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恩格斯在摩尔根与马克思的研究基础上，从经济的视角出发考察了原始社会的家庭、氏族关系，从而解释了史前时期到真正历史的过渡。恩格斯对原始社会的系统研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在历史思维中推动了唯物史观的发展。

（三）恩格斯著作研究

除了书信、摘录、笔记之外，恩格斯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上，学者们对恩格斯的著作进行了专门的探讨，主要涉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①②③}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主要贡献包括：阐述了英国工人阶级产生的大工业基础；把工人阶级的状况看作所有社会运动的基础；深入了解了无产阶级的状况，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基础；揭露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现实悲惨命运；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觉醒程度作出高度评价；指出了无产阶级必定起来革命；强调工人阶级的解放是与全人类的解放相一致的。

《反杜林论》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了理论批判和创新：首先，针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关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表述，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学科，并对政治经济学体系进行了划分和详细说明，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关于价值理论，恩格斯批判杜林混淆了内容和形式、价格和价值的区别，强调商品的价值是由人类的抽象劳动形成的；再者，关于剩余价值理论，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纯粹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解决剩价值来源问题，使得工人阶级更加明晰自身受压迫的根源。《反杜林论》的发表使得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加明晰，同时也使

① 辛向阳：《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

② 程恩富、朱炳先：《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0期。

③ 吴家华、闫鹏：《恩格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路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6期。

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的内涵得到了强调和丰富。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也是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经典之作：一是对当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影响很大的杜林主义进行全面批判；二是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三是深刻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科学性。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原始创新的典范。前者在考察自然科学发展历史和最新成就的基础上，深刻分析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创立了自然辩证法。后者运用唯物史观系统阐述摩尔根关于原始社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明确概括并系统阐述了两种生产理论，从而科学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出了重要的补充和创造性的发展；揭示了现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历史起源，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到了分析家庭的起源问题之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理论，填补了唯物史观的空白；深刻地揭示了私有制、阶级、国家的产生过程及其消亡的历史趋势。

（四）对恩格斯贡献的评价

学者们围绕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从多个角度对恩格斯进行了评价。其中付文军的评价具有很强的概括性，他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身份概括为六种：拓荒者、合作者、阐释者、编校者、传播者、保卫者。^① 吴家华和闫鹏则总结了恩格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路径：回答时代之问、填补理论空白、建构理论体系、规范命题范畴、深化基本理论、修正思想观点、推进理论武装、批判错误思潮。^② 学者们关于恩格斯的研究和评价大体都是从以上几种思路出发的，下文将对学者们普遍承认的恩格斯的贡献进行总结。

第一，恩格斯正确认识并评价了马克思的历史地位，尤其是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地位。恩格斯明确指出了马克思的两大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并指出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另一大发现。辛向阳强调，这两大发现不仅是理论创造，更是客观实际，正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这两大基石使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有了客观的判断标准。^③ 刘建军也明确指出了马克思的地位：马克思是第一个给社会

① 付文军：《论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身份”》，《经济纵横》2020年第5期。

② 吴家华、闫鹏：《恩格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路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6期。

③ 辛向阳：《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

主义，因而也给现代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① 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

第二，恩格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转向”起到了关键的启发作用。“政治经济学转向”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之一。众所周知，马克思大学时期的专业是法学，但是最终却走向了经济学研究，创作了巨著《资本论》。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转向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除了当时社会问题的推动之外，恩格斯在马克思的研究转向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刘秀萍考察了1841年到1843年期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转向”的思想轨迹，指出恩格斯早年期间对资本主义的观察思考为马克思提供了研究的方向启示和基本思路。^② 尤其是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起到了关键启发作用，促使其走上政治经济学批判道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历史价值也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米夏埃尔·克莱特科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始于恩格斯，因为是恩格斯首次阐发了核心批判要点：现代经济发展中导致危机一再发生的资本主义的独特动力并非自然过程，但却表现为自然过程。^③ 余斌指出虽然《大纲》内容以经济学为主，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部分都有涉及，这是一部天才的早期经典著作。^④ 魏泳安评价称，正是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先河，因为其中使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虽然《大纲》存在历史局限性，但其贡献是显著的。^⑤ 除了《大纲》外，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阐发了一些早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命题，比如“双重自由”、商业危机、商业周期、长短波等。孙喜香详细研究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认为正是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了关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形成史和现代性批判的经济社会学分析框架。^⑥

第三，恩格斯通过批判错误思潮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萌芽、创立、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多种错误思潮的曲解和攻击，而恩格斯在

① 刘建军：《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科学评价及其现实启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6期。

② 刘秀萍：《作为“阶级”存在的工人：命运及其解放——重读〈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4期。

③ 米夏埃尔·克莱特科：《恩格斯与资本主义大转型》，王筱译，李怀涛校，《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

④ 余斌：《〈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4期。

⑤ 魏泳安：《青年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及当代价值——基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及内容的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4期。

⑥ 孙喜香：《青年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时代价值意蕴——基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经济学家》2020年第12期。

批判错误思潮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传播。吴家华和闫鹏将恩格斯在批判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总结为五种：第一，在批判中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二，在批判中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第三，在批判中澄清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第四，在批判中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第五，在批判中清除错误思潮对工人运动的影响。^①张雷声则将恩格斯在斗争中阐释、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表现归纳为三个方面：恩格斯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中阐释了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实现的阶级条件和宗旨；恩格斯在批判“讲坛社会主义”思潮中坚持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科学性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恩格斯在批判“青年派”机会主义思潮中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以及唯物史观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②

在受到攻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历史唯物主义和劳动价值论受到的攻击尤为猛烈。19世纪90年代：以德国社会学家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把马克思的理论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加以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保尔·恩斯特等人把唯物史观庸俗化、教条化，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加以鼓吹。田心铭总结了恩格斯的回应：恩格斯对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进行重申和强调，突出了其“归根到底”的作用，同时也否认经济是唯一决定因素，并且对经济因素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进行了补充，阐述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维护并完善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③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立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但是，由于对于这种方法论的曲解或者理解的不透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及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初学者错误解读了劳动价值论。针对这种现象，恩格斯再次作出回应。丁堡骏总结了恩格斯为维护 and 阐释劳动价值论所做的主要工作：首先，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使用的方法论进行总体介绍，并对具体应用进行详细解读；其次，对洛贝尔图斯所谓剽窃的说法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以此捍卫劳动价值论；最后，指出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超越和创新，论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伟大成就。^④恩格斯对于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的捍卫不仅有力回击了错误思潮，更是突出了马克思两大发现的伟大之处，体现出马克思主义

① 吴家华、闫鹏：《恩格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路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6期。

② 张雷声：《恩格斯在批判错误思潮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4期。

③ 田心铭：《从〈共产党宣言〉看恩格斯对创立和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贡献——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3期。

④ 丁堡骏：《坚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9期。

政治经济学的强大生命力。

恩格斯在晚年时期也对诋毁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错误观点作出过深刻批判，这种批判特别体现在同欧洲主流经济学家的三次“战役”中。顾海良对此进行了总结：第一次“战役”是对所谓马克思“剽窃”洛贝尔图斯谬论的批判，第二次“战役”是1890—1891年间的对布伦坦诺攻击《资本论》科学性的错误观点的批判，第三次“战役”是对阿基尔·洛里亚诋毁《资本论》中价值和生产价格理论观点的批判。^① 秉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精神，恩格斯坚持和捍卫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第四，恩格斯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拓展尤其体现在恩格斯晚年的思想中。恩格斯密切关注社会发展，晚年思想也极为活跃，从而及时地对资本主义新变化作出了科学的判断和认识。徐伟轩和吴海江总结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生产动力从蒸汽时代到电力革命、经营方式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生产、资本逻辑从产业增殖到信用积累、阶级关系从赤裸裸的压迫到虚饰的剥削以及危机形态从“不能适应的地步”到“习以为常的条件”。^② 面对资本主义新变化，恩格斯作出了全面客观的回应，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创新，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程恩富和朱炳元^③对恩格斯晚年的主要创新进行了概括，涉及恩格斯对垄断、金融危机、资本家寄生性、殖民地和世界革命等问题的认识。恩格斯晚年思想活跃，学界对其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总结，这不仅是为了对恩格斯的贡献作出全面科学的评价，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展。

回答时代之问的同时，恩格斯也深入探讨了历史和未来的演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根据历史和环境的变化，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是不同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对这些具体差异的研究来发现一般规律。因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狭义上的政治经济学。顾海良认为，广义政治经济学至少有两种形式：一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前的”经济关系的研究，二是对“在不太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经济关系的研究。^④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德农民问题》对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未来社会的经济关系进行了分析，并且涉及了“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问题，为广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① 顾海良：《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6期。

② 徐伟轩、吴海江：《恩格斯晚年对资本主义变化的认识及其时代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4期。

③ 程恩富、朱炳元：《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0期。

④ 顾海良：《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6期。

然而，在中外政治经济学界，处于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依旧是狭义的政治经济学。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学界需要将研究拓展到广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创新和拓展，逐步构建起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恩格斯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为当代理论的开拓创新提供了借鉴。

三、关于列宁的著作及其思想的研究

2020年既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也是列宁诞辰150周年。学者论述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阐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指导意义，通过对列宁的著作及思想特别是帝国主义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一）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

学术界一致肯定并高度评价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认为列宁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把握了这些变化的本质。同时，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俄国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多方面的创造性贡献，主要表现为如下。

第一，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本质及特征的论述。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的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列宁关于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新变化及发展趋势的阐述，既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科学理论，又提出并推进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和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①

第二，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权建设等方面的思想及实践。如他提出的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应该使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发展，以及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的知识和经验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开创了20世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新道路。^②

^① 张雷声：《列宁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创新性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② 余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发展与践行》，《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第三，列宁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观点，而且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研究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革命理论。比如，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里取得胜利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判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地阐明俄国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以及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等。^① 俞良早通过对反映列宁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主要文献的研究，梳理和介绍了列宁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东方各国已经奠定了苏维埃运动的基础；东方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突破它们目前所处的阶段，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行不悖；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取决于东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②

（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及其当代价值

1917年4月，列宁出版了他1916年春天在苏黎世写的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在该书中列宁总结和分析了《资本论》问世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国际关系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发生的新变化，提出了资本主义已经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帝国主义阶段的重要论述和判断，并概括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垄断在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统治；资本输出在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国际垄断组织在经济上瓜分世界，以及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领土上瓜分世界。列宁指出，“我希望我这本小册子能有助于理解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问题”，“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③

一百多年过去了，列宁针对资本与国家、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关系所做的分析有没有过时？国内学者一致认为，列宁所概括的帝国主义的特征在当代或许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本质及根本特征的分析依旧是正确的，对于我们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价值。国外学者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否过时则存在争议，出现了多种帝国主义理论。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殖民地纷纷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了民族独立，发达国家与不发达

① 顾海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5期。

② 俞良早：《关于列宁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5期。

③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2、676页。

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关系成为研究焦点，先后出现了以保罗·阿兰、伊曼纽尔、阿明为主要代表的不发达政治经济学，认为不发达国家虽然在政治上独立了，经济上却没有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发达国家则利用这种依赖关系，以不平等交换的方式从经济上继续剥削和控制不发达国家，形成后者对前者的依附关系；沃勒斯坦从世界分工和世界体系的视角，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间的关系概括为“中心—边缘”关系；经济全球化兴起后，伴随着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特别是跨国公司的迅速增长，出现了强调资本无国界、去中心的超帝国主义论。大卫·哈维则提出新帝国主义论，强调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其政治、军事及经济优势，以“剥夺性霸权”的形式来获取剩余价值；福斯特认为，生产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和垄断金融资本世界范围的剥夺，是当代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A. A. 科里亚科夫采夫提出，二战后资本主义经历了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新重商主义三个阶段，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预见到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和延迟性特征，“寄生性”和“衰落性”并非总是“死亡性”。^①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这种转变意味着资本主义的体制性危机或下行发展，列宁关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永远结束了的判断依然正确，经济发展不平衡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不可避免的条件和前提，列宁将他的帝国主义概念作为资本主义崛起的终结，是绝对正确的。A. 久加诺夫也认为，跨国公司对全球经济的统治，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殖民主义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变得更加巧妙和残酷，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的现代形式，全球危机的各种表现预示着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因此，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全球化时代仍具有现实意义。^②

谢富胜梳理了国外的帝国主义研究，并将其概括为超级帝国主义、霸权帝国主义和晚期帝国主义三种范式。经过比较研究后，他提出，虽然当代帝国主义的某些特征和表现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不同，比如依附国与宗主国或中心—外围国家间的从直接的殖民地掠夺转变为不平等交换关系，全球生产网络中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和金融控制代替了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等，但由于垄断这一帝国主义的最基本特征和实施民族压迫和剥削的经济基础没有发生变化，当代帝国主义并没有发生质变。“当代帝国主义实际上是美国为了促进国内垄断资本积累，借助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协调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通过全球生产网络和金融化手段占

^① A. A. 科里亚科夫采夫：《资本主义社会体制性危机视域下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求是学刊》2020年第6期。

^② A. 久加诺夫：《列宁的思想遗产与21世纪劳动者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真理报》2020年3月27日。

有其他国家的剩余价值，并辅之以政治和军事等手段控制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秩序的阶段，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①这种帝国主义秩序面临多种国内国际矛盾，导致全球治理赤字，世界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中国要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完善世界经济秩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赵敏、邱海平、王金秋认为，列宁通过对帝国主义经济特征和历史地位的分析，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②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在总体上并没有超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框架。在当代，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当今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势。安启念认为，历史充分证明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科学性和价值性，列宁对帝国主义特征的分析对于我们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③但时代的发展需要理论的创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开创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新篇。孙来斌论述了列宁帝国主义定义的方法论特征；陈学明、邱卫东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内在规定性，为审视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危机提供了理论武器，其最直接、最根本的现实意义就是增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心，在把握资本全球化的内在限度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④⑤⑥}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他经典著作及应用的研究

（一）对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现代科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近年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迅速发展和更新，表明社会正经历着重大技术变革，而新的生产技术又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革，这一系列新现象引发了学者的广泛讨论。一种观点认为，智能化技术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浪费，

① 谢富胜：《当代帝国主义研究的三种范式》，《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1期。

② 赵敏、邱海平、王金秋：《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及其当代价值——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经济学家》2020年第12期。

③ 安启念：《列宁与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4期。

④ 孙来斌：《列宁帝国主义定义的方法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4期。

⑤ 陈学明：《论〈帝国主义论〉的当代意义——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北方论坛》2020年第4期。

⑥ 邱卫东：《列宁帝国主义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思想理论教育》2020年第6期。

使整个生产流程更加准确、高效，并且改变了传统的雇佣关系，将工人从单调、程序化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相反的一种观点则认为，智能化技术虽然提高了资本的利润率，却是以对全球数字劳工的过度剥削为代价的，对人类本真的生存发展有着潜在的威胁。

谢富胜、吴越、王生升首先界定了“共享经济”“零工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这几个相关的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的内涵，并运用马克思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一分析框架，分析了数字技术革命下资本主义平台经济组织竞争的新变化，这种变化对劳动者经济、社会地位的影响，以及对社会稳定、制度合理性和全球秩序的挑战，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从交换关系来看，在竞争领域中，以数字平台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数据的潜在生产力为基础，平台经济中的各种组织形式之间的竞争关系是动态的不完全竞争关系，天然具有垄断倾向；第二，从生产关系角度来看，依靠数字平台，平台组织重组了劳动过程，包含知识劳动、传统劳动和新纳入的劳动在内的劳动，其对资本的隶属不断加深，从形式隶属日益转向实际隶属，不稳定就业趋势的加剧就是典型表现；第三，平台经济作为一种与数字技术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实现了对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跨空间、跨部门集成，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同时也蕴含着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①

从积极影响来看，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传统的生产过程，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虽然生产力系统始终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三个要素组成，但是在智能化数字化时代，三者的具体形态和结合方式发生了变化。白永秀和刘盼概括了这种新变化：数字化时代出现了极具创造性的智能劳动者，系统化、无形化的智能劳动资料以及可开发可培育可拓展的智能型劳动对象。这些新变化大大提高了生产的质量和灵活性、延伸了人的体力和脑力、扩大了人类可开发利用的资源。但是，在人工智能带来生产方式变革和生产力提高的背景下，也要认识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虽然智能化的普及会导致“人一机”分工变化、“人一机”融合加强，但是即使人工智能高度发达，我们也不能忽略人的活劳动仍然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本质。^② 杨慧玲和张力分析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社会积累的物质条件、劳动要素、社会生产过程的变革，在承认数字技术是当代最先进生产力的同时，强调我国应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克服资本化生产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引导技

^① 谢富胜、吴越、王生升：《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② 白永秀、刘盼：《人工智能背景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经济学家》2020年第6期。

术更加公平地服务和惠及人民，并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①

新技术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提高，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力量能够化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或者实现工人的解放。赵敏和王金秋回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考察了智能化生产技术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应用。他们发现，在形式上，智能化技术重塑了劳动过程，实现从机器化生产到智能化生产、出现“无人工厂”“虚拟车间”等新形式。但是实质上，资本主义剥削体系依旧存在，榨取剩余价值的目的也未改变。资本主导的智能化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解放工人，而是对更多的劳动力进行控制和剥削。不仅如此，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对智能化社会生产会产生限制、造成社会资源严重浪费，以及智能化会侵蚀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的价值生产体系，智能化的发展其实在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矛盾。^②

此外，虽然新技术改变了传统的雇佣关系，“去劳动关系化”成为了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得到解放。韩文龙和刘璐指出，“去劳动关系化”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过程出现的转型，主要表现为“非雇佣制”“众包”“共享”“零工”“劳资合作”等“去劳动关系化”的具体形式。他们深入剖析了这种形式变化背后不变的本质，发现数字技术下劳动者更加分散、进一步“去技能化”“被迫同意”，“去劳动关系化”其实强化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其本质是通过变相压低工资来攫取超额剩余价值，而且这种趋势还出现了全球性扩展。从消极影响来看，数字化劳动过程中的“去劳动关系”带来了更严重的不稳定就业、劳动者劣势地位和相对贫困化。^③ 胡磊详细论述了平台经济下劳动从属性的演化，判断标准是劳动者对劳动过程控制权的大小。按照这一标准，他发现劳动从属性在平台经济下呈现出新的特征：劳动时间和地点等控制权向网约工转移，劳动的人身和组织从属性弱化；劳动过程控制权的生成根源由物质资本所有权向数据所有权扩展，劳动的数据从属性强化；劳动过程控制手段数字化且重点不一，劳动从属性呈现多层分化；劳动过程控制主体向消费者扩展，劳动从属性易被遮蔽。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网约工权益保护体系的建设之路。^④

大数据、云计算、超级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在迅速改变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的

① 杨慧玲、张力：《数字经济变革及其矛盾运动》，《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1期。

② 赵敏、王金秋：《资本主义智能化生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③ 韩文龙、刘璐：《数字劳动过程中的“去劳动关系化”现象、本质与中国应对》，《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10期。

④ 胡磊：《平台经济下劳动过程控制权和劳动从属性的演化与制度因应》，《经济纵横》2020年第2期。

同时，也改变着人的观念意识。尤其是消费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深刻改变了传统消费模式和消费心理。张峰和刘璐璐认为与传统消费模式相比，数字化消费在形式、内容、模式和思维几个方面都有着重要差异，并且成为数字资本积累的主要引擎。在这种消费模式下，在线消费方式的大众化、诱导性广告营销、放大畸形消费理念，消费异化现象日益严重，资本权力渗透消费过程从而实现对消费者的隐形控制，使其主动为资本积累服务。^① 发展科学技术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但现实中往往单一注重经济效益，从而导致对新科技的盲目崇拜，忽视技术发展对人的主体性带来的损害。孙颖和韩秋红在破解人工智能这一“新神”形象之后，提出要以唯物史观的思维方式审视现代性危机，辩证看待当代科技，认清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人类解放的根本途径。^② 刘伟杰和周绍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使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框架来分析新科技革命下人与技术的关系，发现人的主体性缺失与技术进步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人的主体性的顺利实现取决于生产关系能否适应技术发展的需要。因此，要同步实现技术发展和人的主体性复归，需要做的应该是变革生产中的不合理因素，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关系。^③

科技既不是导致人的异化的源头，也不是解放人的主体力量，但它可以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支持。实现健康良性的社会发展，关键在于谁来使用科技、怎样使用科技。因此，人类解放的关键仍是要回到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上来，即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来变革生产关系以进一步适应和解放生产力。在这场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中国必须处理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和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的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针对新技术带来的劳动关系和社会变革，要建立健全风险识别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推动技术更加公平地惠及人民，让劳动者共享新科技带来的经济发展成果。

（二）关于马克思人的学说的研究

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学者们针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这对于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

① 张峰、刘璐璐：《数字经济时代对数字化消费的辩证思考》，《经济纵横》2020年第2期。

② 孙颖、韩秋红：《以唯物史观辨析人工智能的现代性挑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1期。

③ 刘伟杰、周绍东：《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人与技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解读》，《经济纵横》2020年第9期。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和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对人的生存发展状况进行了重点关注和论述。随着他们研究的深入，人的发展理论也不断深化。陈新夏通过溯源的方式还原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过程，将其分为萌芽、形成、发展三个时期：人的发展理论的萌芽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剥削压迫工人的批判，初步确立了人的彻底解放的目标；形成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包括对人的发展含义的全面阐述和对人的发展价值取向的确立；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得到更进一步丰富，开始从与社会历史发展相结合的角度理解人的发展。^①

经过长期的发展完善，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成为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石云霞将其核心内容概括为以下三点：人的现实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理想状态和远景目标。^② 梳理、研究人的发展理论不仅是因为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发展中更好地把握和应用这一理论。中国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便是这一理论的时代化发展。常庆欣和张旭指出，从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思想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之间，存在着运用、发展与创新关系，深化了人的主体地位的内涵，^③ 这也是人的发展理论在中国发展建设中取得的重要实践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理论不仅对于当下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意义重大。中国在改革发展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需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以阐述中国的发展经验。在批判“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常庆欣认为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现实的人”这一范畴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具有成为这一体系基础范畴的潜力。^④ 因此，不管是从中国的社会发展还是理论构建出发，马克思的人的发展理论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和现实价值。

① 陈新夏：《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文本溯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5期。

② 石云霞：《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2期。

③ 常庆欣、张旭：《从“现实的人”到“以人民为中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立场探析》，《经济学家》2020年第5期。

④ 常庆欣：《马克思“现实的人”的理论潜力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尝试》，《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2期。

（三）关于美好生活的研究

“美好生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界关注和讨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人的发展理论在新时代的发展，也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体现，更是人类社会探讨的永恒话题。美好生活作为古今中外人类共同探索和追求的目标，理解其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内涵尤为重要，政治经济学学者们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论述出发，对“美好生活”进行了溯源分析和现实解读。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这种矛盾及其演变。刘荣军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和“社会生活的本质”思想出发，解读了“社会生活”这一核心概念，其本质、层级结构、特征内容是我们理解“美好生活”的出发点。首先，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正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其次，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社会生活可划分为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三个层级，为了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国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正是在继承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创新；最后，在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生活的主导样态是有所差异的，而中国主要矛盾的变化正是反映了社会生活内涵的丰富，在基本物质生活之上要求更加广泛，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有了更多的关注，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时代内涵和具体特征。^①美好生活不仅仅是个体层面的需要，更是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反映。因此，必须从更加宏观角度解读这一概念，形成一个整体性分析框架。项久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构建起分析美好生活的逻辑体系，包括理论、历史、实践三个层面，即从“自发”到“自觉”、从“时间”到“空间”、从“愿景”到“现实”，并对美好生活的内涵、形成过程和实现方式进行了详细探讨。^②孟宪平则从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理论逻辑出发，解读当前中国“五位一体”文明。这一表述实质上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当代转换，包括叙事内容和话语形式的转换、叙事空间和依存基础的转换、建构思路和构建范式的转换，以及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换。^③“五位一体”文明的建设是中国满足人民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重要布局，随着中国现代化文明建设

① 刘荣军：《马克思对“社会生活”的论述与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② 项久雨：《论美好生活的马克思主义逻辑》，《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7期。

③ 孟宪平：《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转换论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

的推进，美好生活将逐步实现，从而为中华文明以及人类文明贡献新方案。

在宏观和整体分析之外，也有学者从更加具体的视角出发对美好生活进行了解读。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人的解放最终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这必须建立在异化“劳动”的消灭和“闲暇”时间增加的基础上。秦维红和姚文杰运用马克思思想中的“劳动—闲暇”这一范畴来剖析美好生活的内涵。他们认为，美好生活的内核应该是劳动与闲暇的贯通，这里的劳动和闲暇是真正的劳动与闲暇，而不是异化的，两者是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要实现这一愿景，不仅要依靠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更重要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① 这一观点既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肯定，也是一种提醒。当前世界正经历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生产力快速提高，在这种背景下，更要坚定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科技创新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警惕科技进步对人造成新的异化和束缚。

美好生活这一概念的新颖和进步之处，体现在其超越了对物质、文化的简单追求，将发展目标拓展到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更广阔的领域。尤其是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和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而我国生态现代化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有必要在考虑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批判地借鉴国际经验。姚晓红和郑吉伟对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生态批判进行了梳理和评价，一方面，他们肯定了这类研究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即立足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来讨论生态问题，而不是抽象的道德指责，并且通过分析资本与生态的矛盾冲突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生态退化根源，这类研究的代表人物为泰德·本顿、瑞尼尔·格伦德曼和保罗·伯克特；另一方面，他们也指出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缺陷，主要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掌握不充分、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夸大以及批判过于偏激。^② 对西方生态理论研究的梳理和批判性评价有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在借鉴经验的同时汲取教训，平衡好资本与生态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利用我国制度优势建设生态文明。在文献梳理、国际比较分析之外，还有学者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来判断绿色制造的价值创造效应。陈昊和丁晓钦首先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创新性发展，将市场供求纳入了价值理论框架，然后构建了一个模型来考察绿色制造、环境规则对

① 秦维红、姚文杰：《马克思的“劳动—闲暇”思想对理解美好生活的启示》，《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3期。

② 姚晓红、郑吉伟：《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生态批判——基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

价值创造的作用，通过对比分析发现绿色制造有显著的价值创造效应。^①不管是已有的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都发现了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下一步更为重要和紧迫的便是研究如何实现绿色发展，更好地发挥理论研究对我国实践的指导和启发作用。

（四）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关系理论研究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理论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之一。长期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都由西方话语体系主导，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并不能揭示国际关系的内在矛盾，因此也不能对许多政治经济现象作出良好的预测和解释。与此相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被边缘化，这一理论的解释力被严重忽视和低估了。虽然马克思未能对国际关系这一范畴进行完整系统的研究，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剖析对于我们理解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相关国际关系论述对于我们分析国际关系有着启发意义。

在马克思的影响下，部分西方左翼学者看到了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历史性和不平衡性，但从根本上来看，他们的研究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赵敏在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批判研究进行梳理之后，提出了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国际关系分析框架，这一框架重视国家行为和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动力机制，关注资本运动带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变化，而不是仅关注现象层面的外在关系。^②这种分析方法对正确认识中国在当前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以及处理与不同国家的关系有着启发意义，也是中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需深入探讨的领域。张小波和刘世强将采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和世界观来分析国际问题的理论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并梳理了其演进过程，归纳了其特点：采用阶级分析、重视经济因素作用、关注不平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应用范围不断扩展，对理论和实践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③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发生趋势性转变，中国国内面临经济转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任，深刻认识国际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外交关系的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也是为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健康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① 陈昊、丁晓钦：《绿色制造机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7期。

② 赵敏：《回归马克思：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1期。

③ 张小波、刘世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及其对国际关系学科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7期。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

周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拓进取,开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总结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在习近平总书记“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号召鼓舞下,理论界涌现了一大批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立足于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理论、新范畴进行充分阐释,为开拓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作出了贡献。2020年理论界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主要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原则、理论基础、理论属性、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基本范畴、逻辑主线、体系框架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

2012年6月19日,习近平同志视察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研究中心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追本溯源,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指导之下取得的”。构建和

* 周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邱海平提出，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首先是指以马克思经济学为指导，更进一步说，又首先是指坚持和继承、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资本论》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贯彻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对待《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基本立场、研究目的、基本范畴、基本理论、逻辑方法等各个方面理论成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以马克思经济学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具体化为三个层次的途径和方法：首先，坚持和继承《资本论》的重要理论要素，包括《资本论》的基本立场和价值观、《资本论》中关于社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基本理论；其次，创造性转化《资本论》的范畴和术语，包括资本、劳动力商品、剩余价值等核心范畴和理论；最后，创新性发展《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索，离不开新中国 70 余年经济建设伟大实践。学界研究认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写下了序篇、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朱鹏华、王天义提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具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是人民主体论，理论主线是解放、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立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主导是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理论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基点是统筹兼顾地发展经济，理论核心是区域经济均衡布局，理论根基是立足自力更生、积极向外国学习，理论导向是共同富裕，本质特征是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这些内容都源于毛泽东的理论探索。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具有基础性和连续性、整体性和全面性、时代性和发展性，是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了学理依循和理论初心。^②

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任务之一，现有研究讨论的重点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蔡之兵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

^① 邱海平：《〈资本论〉的创新性研究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

^② 朱鹏华、王天义：《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

具有多元性，分别是经济学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社会主义经济学属性、政治属性、中国特色属性。其经济学属性，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在尽可能保证真实化的基础上追求数学化；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立场上，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坚持联系、系统、整体、动态的分析方法；其社会主义经济学属性，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解决公有制如何有效率，以及如何避免市场经济的弊端两个难题；其政治属性，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其中国特色属性，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必须立足于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贡献。^①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系统化学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必须明确其研究对象。周文、代红豆提炼了当前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种研究取向：第一种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第二种主张丰富和发展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将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包括进来；第三种主张避开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作新的阐释。学界普遍强调确立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要性，普遍持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态度，普遍认为要根据发展变化着的中国实际拓展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目前学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上形成的基本观点，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相关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难以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缺乏专门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系统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考察缺乏深入的学理性分析，以抽象或纯粹思维演绎的分析居多等方面。^②

^① 蔡之兵：《从西方经济学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五层理论阶梯》，《江淮论坛》2020年第5期。

^② 周文、代红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争论与成效》，《人文杂志》2020年第2期。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体研究对象，国内学者各抒己见，发表了一系列观点。王立胜、郭冠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应包含国家、历史、生产、交换和分配五个维度，可以概括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交换及其分配规律。考虑到政治经济学有别于自然科学，也有别于应用经济学，不能把生产力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研究对象；由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身就包含了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维度中不能再列入生产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形式是相对确定的，是由国家和历史维度两个变量决定的外生变量，不是独立变量，因此不应该把所有制形式列入研究维度中。^① 洪银兴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进入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需要重点关注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研究，不是研究其技术层面，而是研究其社会层面，研究内容具体包括：一是解放生产力，涉及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发展生产力，涉及的是生产力各种要素的动员和协同；三是保护生产力，涉及的是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明确为生产力，不意味着不需要研究生产关系，只有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分析产生的理论，才能准确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② 周绍东认为，政治经济学将生产关系界定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生产资料所有制界定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这种做法属于研究对象范围过窄。必须扩展传统的生产关系定义，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维度对其进行分解，微观维度的生产关系涉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中观维度的生产关系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城乡关系以及国内外经济关系，宏观维度的生产关系最主要的就是指市场与政府的关系。^③

学界基于不同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洪银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的是重大改革和发展问题导向的理论创新，应摆脱先验论导向，克服模型导向，提倡时代问题导向。时代问题导向具体包括生产力导向、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导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导向。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尤其要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要面对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分析，而不是越来越深入到抽象的象牙塔中去。^④ 张俊山提出，经济过程的物质多样性、物质生产活动的社会性、经

① 王立胜、郭冠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3期。

② 洪银兴：《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管理世界》2020年第9期。

③ 周绍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进展、争鸣与共识》，《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④ 洪银兴：《问题导向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经济研究》2020年第10期。

济活动的历史性，使得科学抽象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必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建设必须恢复和发扬科学抽象方法的研究传统，要对经济运行中的现象包括经济活动成果、价值、经济增长、“供给侧”等做出理论上的科学抽象，要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对象、以阶级分析为方法的研究传统，要通过科学抽象改造旧概念，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概念体系，要恢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传统，使经济学教育走上正确道路。^① 张林、周济民基于经济学史研究的视角，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始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时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起点，这个时间应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算起，从那时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分为前史、探索、形成、完善四个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研究，要按两条线索进行，一条是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的理论贡献，一条是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政策史研究，应包括经济思想、经济方略和经济政策三方面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事件研究，应重点关注在发展进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学科事件。^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基本范畴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在日益丰富的经济发展实践基础上，学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和研究内容的认识，也越来越成熟。刘伟认为，如何统一公有制与市场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面临的根本问题，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为了统一公有制这一基本制度与市场机制这一资源配置方式，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同时，满足市场机制对于所有制关系的基本要求，其中，关键是使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本身适应市场机制的基本要求。市场机制对所有制的基本要求包括：所有制及相应的所有权必须是单纯经济性质的权利，不能具有超经济性质；交易者之间在所有制（权）上必须有严格的排他性，不能取消彼此间的所有制（权）界区；企业作为要素所有权的集合，内部产权结构治理必须均衡。市场机制的这些基本要求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提出了众多具体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

^① 张俊山：《科学抽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中的意义》，《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1期。

^② 张林、周济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书写新范式》，《思想战线》2020年第4期。

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科学地回答这些具体问题，这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特殊魅力所在。^①

国内政治经济学界一批知名学者围绕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经济大循环等，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基本范畴。刘灿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系统化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理论问题，包括社会主义所有制与产权理论、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理论、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② 洪银兴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只研究基本经济制度，还要研究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研究基本经济制度，要从共存论的角度认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要素报酬、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解决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的问题。研究经济运行要从要素配置和组合两个方面明确经济运行的效率目标、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寻求经济运行的动力、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研究经济调节机制、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研究经济发展，要依据共享发展理念研究现代化目标、依据创新发展理念研究现代化战略、依据绿色发展理念研究现代化道路、依据协调发展理念研究二元结构现代化、依据开放发展理念研究对外开放。^③ 杨承训提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动”时代课题，是“十四五”期间甚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和战略部署。内循环为主、双循环互动的理论创新，将社会再生产四大环节和五大发展理念相契合，阐释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律，深化了改革开放理论，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论，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长期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课题，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崭新篇章。^④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既要学习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要使之得到不断丰富和创新。洪银兴将马克思关于财富的一般规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相结合，提出具有新时代特征的财富理论，主张把财富作为基本经

① 刘伟：《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3期。

② 刘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系统化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理论问题》，《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1期。

③ 洪银兴：《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管理世界》2020年第9期。

④ 杨承训：《内循环为主双循环互动的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课题》，《上海经济研究》2020年第10期。

济范畴，把财富分析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终，系统研究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具体来说，要以财富增长来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准确判断各种生产要素对财富增长的作用，以明确转变发展方向；要研究创造财富的各种要素的组合关系，以及在生产方式变迁中的历史特性和动态结合关系，以明确各种要素结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要在参与财富创造的要素所有者之间，按照各自对财富创造的贡献进行分配，以使各种创造财富的要素充分涌流，各个要素所有者各尽其能、各得其所。^①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和体系框架

万事开头难，如何确定起点范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心之一。刘谦、裴小革基于逻辑起点选择的三条基本原则，即坚持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借鉴但不囿于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原则的阐述、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提出将所有制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在对二元化所有制结构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证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将所有制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原因在于：第一，所有制是一个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决定着该社会的最终发展方向和基本性质；第二，现阶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均发轫于对所有制认识的深入以及对所有制关系的调整；第三，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经济现象，迫切需要对二元化所有制结构的形成、发展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相关问题作出深刻的理论说明。^②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理论界有不同观点，其中代表性观点包括人民中心主线论、共享发展主线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主线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线论等。孙迎联、李炳炎提出了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应遵循的一般性原则，即确立逻辑主线所依据的经济事实应该具有典型意义、逻辑主线确立的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运行、以反映经济关系本质的核心范畴辩证运动

^① 洪银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财富理论的探讨——基于马克思的财富理论的延展性思考》，《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

^② 刘谦、裴小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定位研究——基于所有制视角的探索》，《上海经济研究》2020年第6期。

而形成的范畴系统为逻辑主线。在此基础上，引入“需要价值”这一范畴，所谓需要价值，是指社会主义劳动者所创造的社会产品价值中扣除补偿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后的余额，由一般必要价值 V 和一般剩余价值 M 两部分构成，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所要求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之间的联系。受马克思确立《资本论》逻辑主线的启示，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在新时代发展的目标和特征，他们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应该是需要价值的运动转化的范畴体系，即由生产的直接目的（生产出尽可能多、尽可能好的需要价值产品）向最终目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运动和转化的范畴体系。^①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框架来说，学界争论激烈，选择差异较大。周绍东认为，当前学界主要运用两种方法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一是选择明确的逻辑起点和叙述主线，通过核心概念把研究内容串联起来，同时尽可能地体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二是采用比较抽象或宏观的“概念”来统摄各种现实经济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展开叙述。基于这两种方法，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框架研究主要分为六种类型。（1）由逻辑主线贯穿而成的体系框架。使用一个明确的概念或命题，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前后贯穿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2）理论分析加实践经验的组合体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分为理论和实践两大板块，理论板块沿袭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写法，实践板块围绕当前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重要政策展开分析。（3）专题式体系。围绕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以专题形式进行分析，以问题导向作为根本遵循，力求把理论运用到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中去。（4）专家论著汇编体系。收集政治经济学领域相关专家学者历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按照一定的逻辑线索汇编成册。（5）“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综合体系。全面综合地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并积极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6）史论结合体系。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建设实践出发，梳理实践和理论互动发展的历史脉络，力图刻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萌生、发展、争论以及探索的全貌。^②

① 孙迎联、李炳炎：《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1期。

② 周绍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进展、争鸣与共识》，《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韩文龙 刘璐*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新概括，从所有制、市场经济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三个方面规定了基本经济制度范畴，使得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全面，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战略部署，系统推进各项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此《意见》为指导，我们梳理了2020年政治经济学者对所有制、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宏观经济治理体制、收入分配制度、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加强党在经济领域的全面领导等重点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保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应当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①同时也要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促进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各类经济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积极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

* 韩文龙，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副教授；刘璐，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曹泳鑫：《社会主义制度是新中国发展进步的前提和根基》，《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

高质量发展。

（一）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近年来国有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呈现继续增长的趋势；同时，国有经济布局也不断优化。静态来看，2018年国有经济在交通运输、邮电通信、金融服务等关键服务领域占比超过50%，在工业、建筑业领域占比超过30%，国有经济显示出强劲的控制力。动态来看，国有经济在工业竞争性行业大幅退出，有研究显示，在过去20年里，工业41个子行业中，有37个子行业的国有经济占比下降，国有经济在不同领域有退有进，结构调整取得成效。^①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有经济的制度功能没有变，但其具体的政策与战略功能却一直随着实际变化，国有经济改革也从最初激发企业活力转变为增强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②

国有经济布局注重增强全球竞争力。国有经济的布局要瞄准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需要国有企业具有全球视野，向世界一流企业的方向前进，积极参与全球竞争，勇于同跨国公司展开竞争。应布局一批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主导地位的领军国有企业，增强国有企业在全球产业发展中的话语权，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③

国有经济布局注重增强中国整体创新力。国有经济应当布局在国内急需的关键技术与“卡脖子”的关键领域，并起到创新的正向外外部性作用。当民营经济对具有公共品特性的通用技术不愿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创新以及对价值链顶端的技术缺乏创新能力时，就需要国有经济介入这些关键领域，利用自身的政治资源、组织规模与技术整合优势坚定不移地投身于高精尖技术和关键领域的长期创新，弥补民营企业只关注和投资较为成熟的技术的缺陷。^④相比国有经济承担的国家创新突破的重担、拥有的国内一流人才和丰富科研资源，目前国有经济的科技创新水平与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国有经济在重大创新技术突破方面，在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的引领方面，在数字经济技术开发与智能经济领域的支撑和引领方面还应当发挥更大作用。^⑤国有经济布局注重增强创新力不只体现在单个国有企业上，而且体现在质的突破、正的外部性

① 平新乔、黄昕：《新世纪以来我国国有资本分布格局变化及其经济含义》，《经济纵横》2020年第4期。

② 李政：《中国国有经济70年：历史、逻辑与经验》，《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1期。

③ 王立胜、张弛、陈健：《习近平关于国有企业论述研究》，《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

④ 李政、周希慎：《国有企业创新功能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

⑤ 李政：《增强国有经济创新力的理论基础与实现路径》，《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2期。

与提升中国经济整体创新力上。

国有经济布局注重增强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同非公有制经济大多在竞争性行业、以获取利润为目标不同，国有经济主要处于自然垄断性行业，更加注重公益目标与国民安全。^① 国有经济布局应当考虑不同行业、不同的战略和功能定位，根据国有企业的不同属性进行结构性改革。^② 对于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和涉及国计民生的自然垄断性行业，国有经济应当继续发挥主导与控制作用，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对于一般竞争性行业，国有经济应当适度退出。^③ 虽然国有经济一直在积极进行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但仍然存在布局不够集中导致其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削弱的问题。究其原因，地方国有企业小而散、多而杂，产业结构趋同，造成了重复建设和资源利用不合理问题。^④ 解决地方国有企业带来的布局不集中问题，就需要破除国有经济隶属关系的“条块分割”，加强国有经济布局政策的整体性与系统性，让国有经济产生聚合效应，从而在国民经济中更好地发挥其控制与主导作用。^⑤

（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企业内部的融合。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保持国有经济主导权、维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发生改变的前提下，积极引入了各类市场投资主体，使得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⑥ 继续推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将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优势结合起来，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放大国有经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辐射功能与带动作用，是实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的重要方式之一。其次，新时代下中国国情有了新的变化，社会资金财富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不仅要求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还要求国有资本能够以安全的形式保值增值，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有利于保障国家主权投资基金的稳定。^⑦ 再次，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有利于赢得国际社会认可，促进国有企业

① 洪银兴：《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管理世界》2020年第9期。

② 江剑平、何召鹏、刘长庚：《论习近平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想的内在逻辑》，《经济学家》2020年第6期。

③ 杨瑞龙：《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0年第1期。

④ 张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下国有企业改革路径思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⑤ 刘现伟、李红娟、石颖：《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的思路与策略》，《改革》2020年第6期。

⑥ 顾钰民、廉国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州学刊》2020年第6期。

⑦ 方茜：《中国所有制理论演进与实践创新》，《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9期。

“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从而在“逆全球化”态势下维护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①最后，区别于国外“混合经济”概念所具有的暂时缓解资本主义矛盾的过渡性质，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要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是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措施，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②

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新一轮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根据企业不同的功能定位分类实施。^③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资本的流动以及各类资本的进入、退出与监管成为关注的焦点。为了避免国资委自己监督自己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这项监督权力，并指出国有资本流出时应防范过分低估价值、通过违规操作隐匿或侵吞国有资本的行为。^④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另外一个关注焦点是“混而未改”，即国有企业从股权上完成了国有和非国有股份的混合，但在治理结构、管理方式等方面缺乏改进。^⑤如何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提高内部治理结构的科学化？有学者提出照搬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不具合理性，因为现代企业制度成长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背景下，它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必然存在矛盾与冲突，直接套用现代企业制度有可能削弱国有企业保障国民整体利益的重要作用。因此，应当在借鉴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⑥

（三）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⑦在新发展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也面临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在转变过程中，传统的“红利”消失，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出新的制度红利、新

① 刘志彪、姚志勇、吴乐珍：《巩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重组过程中的分工地位研究》，《经济学家》2020年第11期。

② 周文、刘少阳：《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构想及其当代形式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6期。

③ 盛毅：《新一轮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涵与特定任务》，《改革》2020年第2期。

④ 王婷、李政：《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进展与述评》，《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6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黄群慧：《“十四五”时期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趋势及优化政策研究》，《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3期。

⑥ 江剑平、何召鹏、刘长庚：《论习近平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想的内在逻辑》，《经济学家》2020年第6期。

⑦ 洪功翔：《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营经济地位和作用的理论争论》，《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6期。

的资源红利和新的创新红利。^① 创造新的制度红利，需要健全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制基础，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营造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与非公有制经济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创造新的资源红利，则要创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的市场环境，保障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② 随着非公有制企业能够使用的资源日益丰富，市场可能会出现失灵，尤其是市场的马太效应将不利于行业整体创新力的提高，此时创造新的创新活力，就需要国家与政府担负起平衡市场参与者的责任，破除行业垄断，激发有成长性的非公有制企业的活力和创新力。

非公有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还面临着成本快速上升、市场开拓难、企业的工业互联网转型艰难等困境。这就需要政府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引导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③ 例如在非公有制经济转型方面，通过工业互联网转型，企业能够形成新的分工，降低信息搜寻和生产要素成本，促进生产协调与高质量发展。政府可以根据非公有制企业面临的关键问题精准施策，增强数字互联网安全保障能力建设，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对工业互联网进行投资，创建与维护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业互联网生态。^④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蕴含着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之间相互竞争、合作和融合的动态机理。^⑤ 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有利于加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企业内部的融合，有利于实现两者之间的优势互补。应坚持推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努力形成各类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二、完善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与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成熟的商品市场和商品定价机制已逐渐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增强。然而我国要素市场发展仍不充分，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仍有完善空间，需要进一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市场准入和

① 厉以宁：《中国道路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宏观质量研究》2020年第2期。

② 谢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1期。

③ 张于喆：《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浙江、贵州等七省八市的调研》，《宏观经济管理》2020年第1期。

④ 任力：《以工业互联网推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3期。

⑤ 杨春学、杨新铭：《所有制适度结构：理论分析、推断与经验事实》，《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公平竞争等制度，构建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筑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体制基础。

（一）产权制度改革

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增强产权的激励作用。进一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目前中国的自然资源资产仍然存在底数不清、交叉统计、产权主体不明晰以及自然资源权益难以落实等问题。应当加快进行自然资源资产确权登记等工作，明晰自然资源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之间的权属关系，探索使用权的抵押和担保等功能。^①进一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目前中国农村集体产权仍然存在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实质性权能受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传统村两委的办事协调能力不足等问题。^②因此，还需要明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和法律地位，优化农村治理结构，加大相关政策支持和保障力度。^③进一步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还需要兼顾公平与效率。^④推进“三权分置”中的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有序分离、提高农地利用效率的同时，也要积极构建农民的可替代性收入与保障体系，维护农民的长远利益。^⑤也有学者指出现有农村集体土地缺少发展权，认为未来农村产权改革应当促进农村和城市土地的同权化，从而更好地适应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需要。^⑥

除了传统领域的产权制度改革，新领域新业态的知识产权制度改革也备受关注。知识产权对于保护创新、激发内生增长动力具有重要作用，而新领域新业态具有知识密集的特点，并且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更加隐蔽，执法难度更大。2020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进行了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强调要完善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国家知识产权局同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多部门共同参与制定的《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管理》也已发布，并将于2021年6月1日起实施。完善新业态新领域的知识产权制度对构建更加公

① 钟骁勇、潘弘韬、李彦华：《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中国矿业》2020年第4期。

② 郭晓鸣、王蕾：《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创新经验及突破重点》，《经济纵横》2020年第7期。

③ 夏英、张瑞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创新逻辑、行为特征及改革效能》，《经济纵横》2020年第7期。

④ 李萍、田世野：《论马克思产权思想与我国农村产权改革的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⑤ 陈思、叶剑平、薛白、姚睿：《农地“三权分置”产权解构及政策优化建议》，《中国土地科学》2020年第10期。

⑥ 李江涛、熊柴、蔡继明：《开启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和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新里程》，《管理世界》2020年第6期。

正、开放的新业态市场环境十分重要，应当有效发挥司法维护知识产权权益的有效作用，惩罚侵权行为，同时探索新业态新领域下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机制，优化相关知识产权确权救济程序，创新行政知识产权保护手段，推进线上线下多渠道的保护，提升知识产权的执法效能。^①

（二）负面清单制度与公平审查制度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创造不同主体平等进入市场的条件。推行“全国一张清单”，放宽事前企业市场准入门槛，落实“非禁即入”政策，注重事中事后的监管，提高政府服务水平。^②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实时评估与动态调整制度，随时把握市场的变化和具体情况，定期检查、清理各种显性或隐性壁垒，打破“玻璃门”“弹簧门”，让负面清单制度在传统经济以及新业态新领域都能发挥有效作用。^③

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完善审查实施细则。首先，要做好存量清查和增量审查工作，清查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存量政策，强化审查增量政策，提高审查的约束力与透明程度。其次，在对微观企业主体进行竞争监管基础上，还要关注地方政府存在的不公平竞争现象，清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区域壁垒，加大对地方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力度，弱化地方政府对当地市场的干预能力，促进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全国统一市场的畅通。^④然后，进一步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学者研究发现《反垄断法》实施后，区域间要素市场壁垒被打破，地方政府从对低盈利能力企业的扶持向打造当地禀赋优势产业转变，既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又促进了市场竞争体系的形成。^⑤未来加强反垄断的执法效率，可以积极运用政务大数据来获取相关证据，加强多部门之间的协调。最后，我国目前还缺少针对互联网和平台等新业态新领域的竞争政策，平台的垄断定价和滥用算法等违背公平竞争的行为难以得到有效规制。^⑥对此，应当加快相关政策的制定，建立公平竞争审查的评估与追责制

① 曲顺兰：《知识产权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与对策——来自山东的实践经验》，《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② 任保平、王思琛：《新时代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升级版的构建》，《经济与管理评论》2020年第4期。

③ 李先军、罗仲伟：《新时代中国营商环境优化：“十三五”回顾与“十四五”展望》，《改革》2020年第8期。

④ 杨振：《高质量发展导向下地方竞争秩序规范与制度选择》，《经济体制改革》2020年第3期。

⑤ 王彦超、蒋亚含：《竞争政策与企业投资——基于〈反垄断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

⑥ 王微、刘涛：《以强大国内市场促进国内大循环的思路与举措》，《改革》2020年第9期。

度，对平台企业的不公平竞争行为进行及时惩戒，让公平竞争理念深入人心。^①

（三）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构建与要素价格改革

应以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改革的重点，建立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体系，针对不同类型要素的特征来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提高各类要素的配置效率。

土地要素是人类所有经济活动的空间基础，建立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首先要考虑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② 伴随改革开放，土地要素市场从缺失到建立，取得了显著成果，但目前仍存在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尚未完成、商用土地市场化配置效率较低、农用土地流转和利用不畅通、土地要素市场化配套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因此，要在坚持土地要素公有制的基础上，继续完善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匹配商业用地供需、支持农用土地要素市场与相关配套机制的有效运转，实现土地要素的自主有序市场化配置。^③

统一开放的劳动要素市场构建需要进一步破除排斥性的制度壁垒。目前，劳动要素市场化仍然面临排斥性制度安排的阻碍，调整户籍制度涉及相关医疗教育服务、社会保障等福利格局的变动，从而引起复杂的利益博弈，成为劳动要素市场化改革中的阻力。农村劳动力向大城市流入增加了当地的公共物品供给压力与财政压力，从而产生了对劳动要素市场流动的抑制动机。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福利水平远高于其他地区，劳动要素市场化的排斥性制度改革难度更大。^④ 为此，需要重点破除农村劳动力流动在大城市的制度阻碍，平衡利益关系，解决好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城市居住环境和配套公共服务问题，提高劳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

建立统一开放的资本要素市场。一方面要加快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破解传统重银行轻市场带来的企业利息负担重、社会杠杆率高等难题，鼓励股权融资，形成债权、股票、基金、期权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要规范资本要素市场配置行为，引导资本支持实体经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⑤

① 刘泉红：《“十四五”时期我国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思路 and 关键举措》，《经济纵横》2020年第5期。

② 马建堂：《新时代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管理世界》2020年第7期。

③ 严金明、李储、夏方舟：《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战略思考》，《改革》2020年第10期。

④ 韩磊：《改革开放以来要素市场化改革政策演进、制度阻力及未来走向》，《经济体制改革》2020年第2期。

⑤ 洪银兴：《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经济学家》2020年第2期。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石油”，可以使传统制造业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资源优势，使数字经济下制造过程更为精准与智能。^① 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有利于进一步释放数据红利，促进数据的利用与流转。然而，目前数据权属在法律上尚未明确阻碍了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为此有学者提出可通过数据合同路径的方式暂时规避数据权属问题。数据拥有者如平台企业可以通过合同来实现数据要素共享的业务模式，通过对数据要素进行“技术措施”+“许可合同”的方式来达到数据要素流转和价值实现的目的。^② 也有学者坚持数据要素确权是数据市场化改革的基础，建议加快形成以数据法律权属确认为前提、数据有效估值为关键和数据畅通交易为基础的数据市场配置机制。^③

健全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机制也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相比商品市场价格机制，目前国内要素市场价格机制不健全，配置效率较低，要素市场价格发现能力较差，导致许多要素价格扭曲。健全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机制，一是要进一步加大对自然资源、垄断行业的价格改革，完善由市场决定反映要素供求状况的价格机制；^④ 二是要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利率走廊和市场化利率体系，健全人民币汇率市场调节机制，增大双向浮动弹性，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要加快数据、技术等要素的交易平台建设，促进数据、技术等要素有序流动和 market 价格的合理形成。^⑤

新时代构建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重点在于完善产权制度，发挥产权的激励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深化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推进负面准入清单制度与公平审查制度，形成竞争有序、充满活力、公平公正的市场新格局。

三、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

科学有效的宏观经济治理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具有开放、融合的优势，但也存在盲目、失灵等缺陷。^⑥ 应探索宏观调控的新机制，加大

① 焦勇：《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转型：从价值重塑到价值创造》，《经济学家》2020年第6期。

② 金耀：《数据治理法律路径的反思与转进》，《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③ 黄再胜：《数据的资本化与当代资本主义价值运动新特点》，《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④ 任保平：《建设高质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1期。

⑤ 逢锦聚、荆克迪：《加快完善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5期。

⑥ 周文、何雨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经济纵横》2020年第9期。

宏观金融财税体制改革力度，优化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通过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结合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演变过程中，一直存在将市场和政府对立的倾向，认为市场与政府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将政府看作一种外生因素，以形而上学的“二分法”割裂了经济与政治的内在联系。^①事实上，国家性质决定了市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本质特征。西方主流经济学只片面看到了政府代表公共利益执行保护私有产权、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责，而没有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质，当公共利益与资本利益冲突时，资本家会通过游说等方式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退出市场，政府难以发挥积极有效作用。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性质不同，中国政府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②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政府被动受限的局面，使政府可以主动有效弥补市场的缺陷，进行市场监管，推进市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又通过政府规范纠正市场失灵导致的宏观结构失衡等问题，超越和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判断。^③

除了国家整体角度外，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也为解决世界各国市场和政府关系难题提供了创新路径。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不仅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在城市经济建设过程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市场中存在企业与地方政府双重竞争主体：企业竞争在资源稀缺基础上按照产业资源优化配置展开，地方政府竞争在资源生成的条件下按照城市资源优化建设进行。双重竞争相辅相成，共同激发了市场活力，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双驱动力，也为世界各国解决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开辟了新路径。^④

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将使市场与政府的优势结合更为便利，数字信息技术减少了信息的不对称与滞后性，提升了政府对市场调控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市场根据价格对有限资源进行配置，只能保障效率和当下利益，容易忽视社会公

^① 包炜杰、周文：《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和突破——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学术研究》2020年第11期。

^② 刘凤义：《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

^③ 周文、刘少阳：《再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9期。

^④ 陈云贤：《探寻中国改革之路：市场竞争双重主体论》，《经济学家》2020年第8期。

平和长远发展。政府可以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更加合理地进行收入的再分配，加快生态保护、环境治理、资源可持续制度的建设，未来数字信息技术可以让政府更有作为，也为市场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①

（二）宏观调控新机制

宏观调控是政府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能，目的是通过对社会供求进行数量和结构上的调控，弥补单纯市场运行的缺陷，实现经济的平稳运行。^②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经历了“计划经济下的直接调控”“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下的宏观调控探索”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三个阶段。^③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要稳”与“有度”为实施原则的政策框架，宏观调控成果斐然。^④ 中国经济发展仍将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期，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目前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来自于周期性、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需要进一步发挥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深化改革、尊重客观规律，探索更为有效的宏观调控新机制。

探索宏观调控的新机制需要加深对宏观政策和宏观运行规律的认识，注重宏观政策在时间长短、结构多元和政策目标之间的动态平衡，避免西方主流经济学只强调宏观调控短期效应而忽视长期效应的做法，树立平衡系统的经济哲学思维。^⑤ 建设宏观调控的新机制需要完善以国家重要发展战略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手段的生产、投资、消费、就业、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宏观制度体系。^⑥ 形成宏观调控的新机制离不开对宏观调控方式、调控工具的创新与完善，例如面对周期性这一世界难题，欧美国家的单一货币政策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需要对传统的宏观调控方式和工具进行创新整合，中国在这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⑦ 未来要继续推进宏观调控各类政策工具的组合与创新，疏通政策传导渠道，坚持通过全方位的多样化的政策

① 周立、赵秋运：《信息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理论学刊》2020年第6期。

② 何自力：《努力形成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制》，《红旗文稿》2020年第2期。

③ 杨小勇、吴宇轩：《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内在规定性及成功机理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1期。

④ 董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8期。

⑤ 庞明川：《宏观政策的性质、效应与“政策—制度”的演进逻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⑥ 张建刚：《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逻辑及其优势》，《经济纵横》2020年第9期。

⑦ 林木西：《健全宏观调控制度体系，推进国民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2期。

工具形成合力来调控宏观经济。同时积极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数字信息技术工具，通过对经济数据实时、全面和准确的把握，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科学性和预见性。^①

（三）金融财税体制改革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领域，也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保障。应加大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具有活力、竞争力、普惠性和适应性的现代金融体制，健全金融监管框架，落实微观审慎措施同宏观监管政策的相互协调配合。^② 引导和促进金融回归服从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本源，优化金融结构，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理念推动金融的高质量发展。^③ 应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有序审慎推进金融开放。过早的金融开放可能会使得外来经济体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传输到国内，降低本国的资产价格和产出水平。^④ 深化金融的对外开放应当选取恰当的时机审慎进行。现有的金融风险已经由早期的单一机构风险转变为机构和市场风险并存的局面，要积极构建数字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加强国际协调，提升金融抗风险能力。

健全现代财税体制，优化政府间的事权和财权划分。首先，针对中央和地方过多公共事权导致的中央下发文件，地方各级转发却不落实的形式主义，应当根据利益的相关程度明晰事权归属，减少不当的共同事权。对于确有必要的共同事权，如义务教育，应当规范共同事权的职责划分，保障相应公共服务的质量。^⑤ 其次，现代财税体制离不开科学透明、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目前中国已经建成了以“行政控制”为主的预算体系，未来改革的重点是实现全面的绩效预算管理。^⑥ 现有预算管理尽管也开始关注产出和结果，但绩效评价仍未能有效应用到预算安排中，应当继续加强绩效预算对支出优先次序的影响，通过绩效预算法律制度建设，规范预算参与者的权责，保证绩效评价结果的作用与可追溯性。^⑦ 然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需要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不当的地方政府融资可能会对中小企业贷款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市场资源

① 何大安：《大数据革命与经济学创新》，《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3期。

② 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吴晓求：《“十四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监管研究》，《管理世界》2020年第7期。

③ 杨世伟：《习近平关于金融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探析》，《经济学家》2020年第9期。

④ 王永钦、祁鼎：《金融创新如何影响新兴市场金融和经济：兼论中国金融改革》，《世界经济》2020年第7期。

⑤ 楼继伟：《坚持现代财政制度主线 完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财政研究》2020年第2期。

⑥ 苗庆红：《公共财政框架下中国预算改革：回顾和展望》，《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⑦ 崔惠玉、周伟：《中期视野下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思考》，《财政研究》2020年第1期。

的有效配置。^① 剖析地方政府设立融资平台的原因可以发现，财政压力是其寻求制度外收入的主要动机，因而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的融资困境，需要为地方政府确立稳定充足的收入来源，形成事权和财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② 最后，需要加大税收体制改革，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推进房地产税改革，构建所得税和财产税并重的直接税体系，加大促进生产的增值税改革，优化税收征管方式，实现税负公平。^③

（四）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体系

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是十八大以来经济政策的重点，产业和区域属于生产方式的两个维度，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分别在产业层面和区域层面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重组与配置，区域的协调发展需要通过产业政策来实现，而产业的结构升级也离不开区域政策的实施。^④ 具体来看，现阶段的产业政策要着重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不同于早期产业阶段，主要依据比较优势引进技术进行“从无到有”的扩张，中国已经进入产业“从有到强”的关键技术“机会窗口”期，此时应当避免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根据技术升级的不同阶段进行相应的产业政策调整。^⑤ 当然，产业政策既可能对真正想要从事创新的企业起到激励作用，也有可能被部分企业用于套利。^⑥ 这就需要产业政策在制定时充分考虑到不完全信息因素，灵活制定产业规划，防止企业的套利行为以及打击可能产生的寻租问题，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与产业政策作用的有效发挥。^⑦ 同时，政府应当注重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战略产业的选择，加强顶层设计，做好阶段规划。在时间和空间上合理安排产业政策，以发展的眼光对产业政策进行及时调整，以统筹的视角在中央层面进行协调，避免重复建设，合理安排产业空间布局，发挥产业政策的最大效能。^⑧

产业活动以及人类的全部活动都是在区域中存在的，区域的协调发展不是机械地

① 刘畅、曹光宇、马光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挤出了中小企业贷款吗？》，《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

② 曹光宇、刘晨冉、周黎安、刘畅：《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兴起》，《金融研究》2020年第5期。

③ 闫坤、张鹏：《财税体制改革进展评价及其“十四五”取向：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改革》2020年第7期。

④ 任艳：《区域协调发展与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政治经济学阐释》，《经济纵横》2020年第6期。

⑤ 张海丰、李国兴：《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战略：产业政策、机会窗口与国家创新系统》，《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1期。

⑥ 杨国超、芮萌：《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的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经济研究》2020年第9期。

⑦ 朱富强：《张维迎的企业家观错在何处：假设与逻辑》，《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

⑧ 刘刚、张冷然、耿天成：《产业关联视角下中国战略产业选择研究》，《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10期。

无差别地拉平各地发展差距，而是一个在发展过程中推动相对平衡的动态历史过程。^①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要进一步优化现有的区域空间结构，打破原有按照地理划分区域的思维方式，树立更利于交通组织、经济联系，要素共享的新区域划分理念。^②除了对原有区域划分进行适时调整外，还要积极挖掘潜在的区域发展新空间。潜在的区域发展空间具有生产要素价格较低、基础设施落后、发展潜力巨大的特点，如果能从区域政策角度给予基础设施、人才、技术和金融财税等方面的扶持，其有望成为国内经济增长的新兴力量。^③此外，单一区域的空间规模已经不能满足现有经济的发展需求，应当继续加强区域间的联系，推进城市群建设。跨区域的城市群建设可以形成更强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有效解决区域差距问题，促进中国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表现超越和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判断，为世界各国解决市场与发展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路径。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在调控理念、方式和工具上不断创新，不断深化现有金融财税体制改革，并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积极推进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宏观经济治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四、收入分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促进收入平等，不仅是维持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为此，应当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收入分配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好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近年来随着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推进，收入分配状况正在得到改善，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基本同步，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然而进一步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仍然具有紧迫性，不同于过去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促

① 陈健、郭冠清：《马克思主义区域协调发展思想：从经典理论到中国发展》，《经济纵横》2020年第6期。
② 李国平、孙瑀、朱婷：《“十四五”时期优化我国经济空间结构的若干对策建议》，《改革》2020年第8期。
③ 高国力、滕飞、李天健：《我国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识别与发展方向》，《改革》2020年第12期。
④ 李兰冰、刘秉镰：《“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展望》，《管理世界》2020年第5期。

进经济增长，当前出口经济增速放缓，国际环境复杂严峻，经济增长逐渐向依靠内需拉动转变。^① 有研究显示如果实现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居民消费将提高17%。^② 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对于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可以分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三个层次。(1)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当更加重视初次分配。生产决定分配，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③ 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应当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加强政府在初次收入分配领域的调节作用。^④ 增加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劳动人民在初次分配中更好享受经济发展成果，体现收入分配的公平性。非公有制共同发展要求实现要素的分配功能，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也要健全要素参与分配的渠道，激活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尤其要做好新兴的数据要素的产权界定、建立健全数据要素的市场定价和交易机制，谨防平台的数据垄断行为和由此造成的新的不平等分配与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⑤ (2)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进一步开展再分配调节机制，尤其是注重再分配对于优化城乡收入格局的作用。过去，通过取消农业税、发放农业补贴、改善基础设施等方式，农民收入有了显著提高，^⑥ 但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存在，未来应当将巩固农村脱贫成果与加大再分配政策对农村的扶持统一起来。(3) 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三次分配是一个新提法，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实施的途径与方式。^⑦ 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不同，第三次分配主要是以社会道德为支撑的志愿型捐助分配。在第三次分配发展的过程中应当避免部分国外慈善事业沽名钓誉、增加政治资本的弊端，坚定不移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⑧ 要抓住时机建设和完善第三次分配的政策体系，健全捐赠制度，培育慈善组织队伍，加强政府监管职责，完善新闻媒体、公众对慈善组织运作的外部监督。

① 张车伟、赵文：《国民收入分配形势分析及建议》，《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6期。

② 陈大明：《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的福利效应研究》，《经济学家》2020年第10期。

③ 程恩富、张福军：《要注重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上海经济研究》2020年第10期。

④ 侯为民：《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中的分配因素》，《经济纵横》2020年第9期。

⑤ 白永秀、刘盼、宁启：《对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定位的理解》，《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1期。

⑥ 陈斌开、李银银：《再分配政策对农村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税费体制改革的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⑦ 逢锦聚：《发挥政治经济学学科优势 加强经济制度研究》，《经济学家》2020年第1期。

⑧ 杨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体系的三个层次》，《上海经济研究》2020年第2期。

（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从经济学角度讲，社会保障也是收入再分配的一种类型，是国家通过对社会成员遭遇风险时提供某种收入支持的社会互助共济制度。^① 社会保障是一项与风险管理相关的制度安排，可以有效避免社会成员在经济活动中遭遇风险导致的损失和陷入贫困。当前，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生产效率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主体的创新，而按照熊彼特等学者的观点，创新将导致市场主体的优胜劣汰，创造性破坏是创新带来的负面风险。因此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进一步加大政府的社会保障力度，对受到风险影响的社会成员给予充分保障，为市场主体进行创新扫清障碍，也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共享高质量发展的成果。^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了从“国家—单位保障制”到“国家—社会保障制”的转型，并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③ 但是中国社会保障发展的质量仍有待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社会保障方面也有显现。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力度，注重顶层设计，完善相关法律，解决社会保障体系中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具体包括：（1）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增强养老基金精算平衡能力，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合理有序调节退休年龄，保障养老基金的收支平衡。^④ 完善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除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外，还要关注区域之间养老保险抚养比、实际缴费率、基金结余多寡的差异，通过平衡区域间利益关系，理顺相关组织管理，促进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⑤（2）健全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明确社会医疗保险整合方向，消除不合理的医保差距，统一医保报销待遇。对于医保的“一制多档”，即参保人所选缴费档次不同享受医保待遇不同的政策，应当认识到其具有的过渡性，在实践中“一制多档”容易引起参保人的逆向选择，不利于医保基金的长期稳定运行，应当有序逐步取消。^⑥ 医保个人账户具

① 陶纪坤：《共享发展视角下我国社会保障再分配机制及实现方式研究》，《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2期。

② 蔡昉：《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保持充分的社会性流动》，《经济纵横》2020年第1期。

③ 李春根、张仲芳、赖志杰、刘海兰：《中国社会保障研究现状及展望——第三届中国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论坛综述》，《经济研究》2020年第2期。

④ 赵亮、李灯强：《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影响》，《财经科学》2020年第12期。

⑤ 董才生、常成：《多维二元结构视角下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经济纵横》2020年第3期。

⑥ 彭浩然、岳经纶：《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理论争论、实践进展与未来前景》，《学术月刊》2020年第11期。

有管理成本高、运行效率低、违法现象多以及侵蚀医保基金等负面作用，目前城乡居民医保已经取消个人账户，未来改革的重点是采取权益置换等方式逐步消除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中的个人账户。^①（3）加强就业保障制度，扩大就业保护的规模、范围和力度，对外来就业人口在就业保护上一视同仁并纳入本地就业保障系统。^②适度提高失业保险金标准，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加强失业保险金发放与就业培训制度的衔接，让失业保险制度更好促进再就业。^③完善工伤保险制度，提高就业者的职业保护，适当调整工伤保险中的一次性给付制度，减少工伤保险基金的财务风险，用定期给付的方式更好满足伤残职工的长期生活保障需求，增强工伤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和保障性功能。^④（4）积极发展社会救助制度，改变现有社会救助存在的资金量少、覆盖面窄、定位不清、衔接不畅、救助资源分配不均和管理服务能力弱等问题。积极整合社会救助资源，建设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制，提高社会救助水平。^⑤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还应当与时俱进，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关注面临社会风险的新人群。在数字技术革命浪潮中诞生的大量新业态新领域的就业者，他们大多以个体商业合同的形式参与经济活动，在法律上缺乏劳动关系的认定，在实践中缺少城镇职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覆盖。尽管大量的新业态就业人员可以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但与同一水平的企业参保相比，从社保基金角度看少缴纳了4个点，而从参保人角度看却多缴纳了12个点。这就导致新业态就业者在灵活就业参保时的逆向选择变得更为严重，有研究发现灵活就业参保人员的医疗支出比起企业参保人群高出约78%。^⑥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新业态就业者人数迅速增长，运用灵活就业参保方式将会给社保基金带来沉重的负担，亟需寻求新的经济上有效率且可持续的社保方案。

收入分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应从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三个层面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区域收入差距。应当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革除不

① 华颖：《从医保个人账户兴衰看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理性回归》，《学术研究》2020年第4期。

② 王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就业保护与社会保障》，《经济纵横》2020年第3期。

③ 梁斌、冀慧：《失业保险如何影响求职努力？——来自“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的证据》，《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

④ 向春华：《工伤保险一次性给付制度：现状、问题与改革》，《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⑤ 龙玉其、王延中、宁亚芳：《“十四五”时期社会保障发展的目标思路与关键举措》，《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8期。

⑥ 汪德华：《零工经济的社保难题与应对思路》，《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7期。

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弊端，与时俱进，关注数字经济下涌现的大量新业态就业者的社保问题，积极探索有效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新方案。

五、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当前，实现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统筹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是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环节。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重点是要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加快建设自由贸易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同时坚持独立自主与高质量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积极参与全球多边治理，与其他国家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全面开放新格局

全面对外开放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

面对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大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加快构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内循环重点要做好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推动需求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外循环，重点要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切实落地，同时重点发展区域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等。^①

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重点是要把握好三个方面。一是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不断拓展中国开放之路，加速中国资本走出去，构建以中国为节点的全球自由贸易网络，完善共建国家或地区的交通运输、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工业就业岗位。^②二是转变对外开放道路，需要实现由海向到陆向、由单边到全方位、由简单投资活动到深度产业融合的积极拓展，努力构筑东西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③相关研究表明，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对外开放，到新时代背景下的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型经济的

^① 余森杰：《“大变局”与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② 张辉、闫强明、唐毓璇：《“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③ 李兰冰、刘秉镰：《“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展望》，《管理世界》2020年第5期。

生产方式推动了我国空间生产的进行，也推动了国家空间的重构。^① 三是加快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学者实证检验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三大政策红利的效果：一是贸易红利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对进口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对出口的作用并不明显，但对进出口产生了积极影响；二是增长红利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利于提高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三是投资自由红利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所在地的外资利用水平并未产生明显的作用。^②

推动形成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需要把握七大实践路径：一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加快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促进我国产品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位移；三是坚持高质量“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着力推动贸易平衡发展；四是加快多元开放平台对接发展，提高全面开放新格局的互利共赢合作水平；五是通过“五通”建设，推动形成沿海、沿边、内陆协调联动的区域开放新布局；六是加快完善相关制度体系，加快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七是加快引领新型全球化发展，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③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还包括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并逐步缩减负面清单，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农业、采矿业、制造业等领域的开放力度；拓展开放领域和优化开放布局，实现“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注重规则等的“制度型开放”。^④ 同时要加快实施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打破开放空间的差序格局，加快实施更大范围的全面开放，推进服务业高水平开放，加快实施更宽领域的全面开放。^⑤

（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抉择和优化经济空间格局的宏伟谋划，旨在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实践平台。^⑥ 作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建设真正贯彻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致力于谱写开放、包

① 张晖：《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空间生产及其新国家空间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20年第6期。

② 陈林、肖倩冰、邹经韬：《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政策红利》，《经济学家》2019年第12期。

③ 陈健：《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的现实逻辑与实践路径》，《江淮论坛》2020年第1期。

④ 周泽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体制保障》，《上海经济研究》2020年第1期。

⑤ 杨丽花、王跃生：《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时代需求与取向观察》，《改革》2020年第3期。

⑥ 王志民、陈宗华：《“一带一路”：新时代对外开放抉择的认知与启示》，《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11期。

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国际合作蓝图，不仅开启了世界经济体系积累新周期，更是对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的历史性超越。^①

“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显著，影响日益增强，已经成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和平台。^② 首先，“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东南亚、西亚和中东欧地区共建国家 TFP 的促进效应比较明显，同时投资便利化建设对共建国家 TFP 的促进效应比倡议提出前更大。^③ 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一带一路”的贸易效应在逐渐提升，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出口贸易潜力仍然很大。^④ 因此，在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经贸合作中，应注重与不同国家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⑤ 其次，“一带一路”对微观企业主体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对改善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绩效均有积极作用，“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促进非新兴优势产业企业绩效。^⑥ “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动态影响效应呈递增趋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可以通过逆向技术溢出、资源优化配置、国际市场竞争、规模经济驱动以及政策红利激励五大效应提升其绿色创新水平。^⑦ 研究表明，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红利下，中国与“下环流”沿线非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攀升差”会倒逼中国企业提高技术创新水平，而投资“上环流”非沿线发达国家的企业会优先通过“逆向溢出”机制实现技术创新，从而更快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⑧ 再次，“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中国外贸稳定和加快实现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作为向西开放重大战略转型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稳外贸”具有支撑作用。^⑨ 中国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口资本品与零部

① 王生升：《“一带一路”建设对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的历史超越》，《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

② 高扬：《“一带一路”实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入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1期。

③ 杨栋旭、于津平：《投资便利化、外商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经济经纬》2021年第2期。

④ 袁春晓：《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引力模型的验证》，《湖北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

⑤ 边婧、张曙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析》，《经济纵横》2020年第2期。

⑥ 胡兵、王肖平：《“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绩效——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21年第2期。

⑦ 朱俏俏、孙久文：《“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绿色创新》，《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⑧ 王桂军、张辉：《“一带一路”与中国 OFDI 企业 TFP：对发达国家投资视角》，《世界经济》2020年第5期。

⑨ 戴翔、杨双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口促进效应》，《经济学家》2020年第6期。

件以及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口最终消费品都显著促进了人民币的交易使用。^①最后，“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降低东道国的债务水平。相关实证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收入水平较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与中国外交关系紧密度较高的共建国家的政府债务的削减，同时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相关效应的中间机制，其主要通过促进就业、税收、投资增长等渠道削减共建国家政府债务。^②

要更好推进“一带一路”高质建设，一是要大力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是丝绸之路精神的主要内涵，它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果和指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提炼和升华。^③二是要积极对接和充分遵循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下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做好规则标准的“软联通”，为共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相关国际规则的完善与创新。^④三是积极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一带一路”的协商和建设机制，中国应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多边合作机制完善、参与塑造新的全球治理体系。^⑤四是加强多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通过提升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在扩大全球总需求的同时为全球经济克服长期停滞创造条件。^⑥五是在国际舆论场要为“一带一路”倡议正名，取得国际话语主导权。针对西方学者和媒体将“一带一路”诬陷为“新殖民主义”，我们必须用理论和实践给予反驳，同时从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构建有利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国际舆论体系。例如，有学者对“新殖民主义”进行了批驳，指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技术和制度双重维度的逆不平等性，是缓解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等加剧的重要举措，而非推行新殖民主义。^⑦

① 丁一兵、申倩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机制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6期。

② 鲍洋：《“一带一路”倡议会引发“债务陷阱”吗——基于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视角》，《经济学家》2020年第3期。

③ 任贵祥：《以习近平丝绸之路精神重要论述指引“一带一路”建设》，《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2期。

④ 陶平生：《全球治理视角下共建“一带一路”国际规则的遵循、完善和创新》，《管理世界》2020年第5期。

⑤ 赵斌、唐佳：《绿色“一带一路”与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以议题联系为视角》，《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11期。

⑥ 宋佳音、谭璇、范志勇：《长期停滞及其应对方案——基于“全球化深化”的视角》，《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4期。

⑦ 马艳、李俊、王琳：《论“一带一路”的逆不平等性：驳中国“新殖民主义”质疑》，《世界经济》2020年第1期。

（三）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多重失衡，主要表现为经济体之间贸易不平衡，经济体内部两极分化以及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不统一，由此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的不稳定性。^① 全球经陷入了长期的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等困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供给侧结构的恶化、内生需求的不足和国际贸易与金融体系对潜在增长的拖累。^② 尤其是当前美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使全球合作进程与多边治理体系面临诸多挑战，主要表现为美国固守本国利益至上原则、任性“退群”毁约、频繁发起贸易战、推卸国际责任、排斥外来移民、遏制中国发展、阻挠欧洲一体化进程等。^③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包含的一个主要论题就是世界普遍交往理论，这就意味着，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伟大构想都是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展开中提出的，也将在世界普遍交往中实现。^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也积极回应了“中心—外围”分析模式的资本逻辑批判、霸权主义批判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诉求，体现出多重意义上的超越。^⑤ 有学者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理论价值在于，创造性转化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天下体系”，超越了“文明冲突论”，解构了“历史终结论”，从而显著提升了我国国际话语权中的理论能力。有学者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的辩证关系，认为“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类终极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⑥ 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福利社会提供了一个建设方案，构成了资本否定逻辑中的一个发展环节，是人类通过世界福利社会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一条道路。^⑦

① 董志勇、李成明：《全球失衡与再平衡：特征、动因与应对》，《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② 袁志刚、郑志伟、葛劲峰：《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困境与出路》，《学术月刊》2020年第8期。

③ 吴志成、王慧婷：《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的应对》，《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④ 李包庚：《世界普遍交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⑤ 孙来斌、超越：《“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分析模式——兼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意义》，《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21期。

⑥ 石云霞：《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1期。

⑦ 沈斐：《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福利社会的一个建设方案——基于资本逻辑的辩证考察》，《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1期。

就现实意义而言,面对全球治理的多重困境,中国要沉着应对各种挑战和风险,准确辨识“革新国际制度”与“变革世界秩序”的关系,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引领经济全球化普惠发展、携手消除全球贫困等。^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重大问题,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精髓,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从人类历史的具体阶段和总体维度相统一的视角,实现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性重构,通过增进全球价值共识、树立共同利益至上的意识、推动世界经济平衡发展、保障参与主体平等协商的权利、划定责任范围以及搭建全球治理的实践平台等手段为全球治理秩序的良好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⑤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体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代品格,也是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恶化的情势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贡献。^⑥

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极力倡导和推进国际合作,为各国应对疫情提供有力支持,充分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⑦深刻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所在。^⑧有效控制疫情、化解全球经济衰退风险,需要世界各国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公共卫生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⑨此次新冠疫情也让我们深刻意识到,除了高度重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之外,还必须积极构建富含生态向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⑩

① 郭锐、孙天宇:《制度性话语、制度性开放与制度性合作——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探索》,《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8期。

② 秦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当今世界问题的深刻解答》,《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6期。

③ 乔茂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理论渊源与当代价值》,《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年第5期。

④ 张贺福:《深刻认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1期。

⑤ 刘同舫:《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性重构》,《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⑥ 宋建丽:《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超越性内涵》,《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⑦ 苏长和:《在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中坚定不移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红旗文稿》2020年第9期。

⑧ 刘春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诠释——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年第6期。

⑨ 尹响、易鑫、胡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应对新冠疫情全球经济冲击的中国方案》,《经济学家》2020年第5期。

⑩ 金瑶梅:《构建生态向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

六、加强党在经济领域的全面领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形势越是复杂严峻，任务越是艰巨，越需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①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② 新中国 70 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经验表明，中国经济之所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与党领导下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密不可分。^③ 有学者总结了新中国 70 年党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创新发展的基本经验，即重视党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作用、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④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小康社会建设呈现了从目标提出到全面建成的 4 次历史性飞跃，其成功经验可以总结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经济发展在各项事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始终坚持循序渐进的目标导向、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根本途径。^⑤

加强党在经济领域的全面领导，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发展方向上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处于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枢纽地位，是中国发展最显著的优势。^⑥ 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⑦ 其次，在重大规划中体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例如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一个突出亮点是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⑧ 再次，加强党在国

① 韩文秀：《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几点体会》，《宏观经济管理》2020 年第 12 期。

② 黄宪起：《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 年第 22 期。

③ 周文、刘少阳：《全面理解和不断深化认识市场经济》，《上海经济研究》2020 年第 3 期。

④ 赵铁军、刘儒：《新中国 70 年党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20 年第 7 期。

⑤ 韩保江、邹一南：《中国小康社会建设 40 年：历程、经验与展望》，《管理世界》2020 年第 1 期。

⑥ 林之豪、张兆安：《坚持和完善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显著优势》，《上海经济研究》2020 年第 1 期。

⑦ 顾海良：《基本经济制度新概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 年第 1 期。

⑧ 陈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 年第 6 期。

有经济科技创新中的坚强领导和引导作用，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方面的使命感、紧迫感和责任感。^①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这里所谓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实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在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② 新时代国有金融企业改革与发展的重点应放在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大力服务实体经济上。在产权改革进程中必须分清类别，建立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模式。^③ 最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党要领导好经济工作，必须加强自身政治建设，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必须深刻把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克服拜物教因素的影响以及“重经济轻政治”的错误倾向。^④ 新发展阶段，在党的领导下要充分依托和发挥经济超大规模性优势，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和全球地位的提升，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从“超大”到“超强”的转变。^⑤

① 李政：《增强国有经济创新力的理论基础与实现路径》，《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2期。

② 逢锦聚：《发挥政治经济学学科优势 加强经济制度研究》，《经济学家》2020年第1期。

③ 张嘉昕：《新时代国有金融企业改革与发展问题》，《社会科学家》2020年第10期。

④ 方敏：《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与水平》，《人民论坛》2020年第S1期。

⑤ 马建堂、张军扩等：《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性”优势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从“超大”到“超强”的转变》，《管理世界》2020年第1期。

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贺立龙 刘丸源^{**}

2020年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很大不利影响，给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带来新挑战。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取得了决定性成就。这一年，学界围绕应对疫情冲击如期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与反贫困理论探索、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重大意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相对贫困治理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与实践等重要议题，形成了很多有较高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

一、疫情冲击下夺取脱贫攻坚战胜利的难点与对策

2019年底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2020年夏季南方洪涝灾害都对脱贫攻坚工作产生了一定冲击。克服疫情和灾害影响、破解剩余深度贫困痼疾、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脱贫进程的冲击及应对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收官战，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指示，他在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0ZDA014）的阶段性成果。

^{**} 贺立龙，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刘丸源，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2020年2月21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指出,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优先做好贫困地区农民工返岗就业工作,做好因疫情致贫返贫农户帮扶工作;2月23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帮助贫困劳动力有序返岗,支持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尽快复工,加快建立健全防止返贫机制;3月6日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指出,疫情或灾害对减贫进程产生影响,如外出务工受阻、扶贫产品销售和产业扶贫困难、扶贫项目停工、帮扶工作受影响等,要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解决扶贫农畜牧产品滞销问题,支持扶贫产业恢复生产、加快扶贫项目开工复工,做好对因疫致贫、返贫人口帮扶。^{①②③}2020年夏季南方多省份发生洪涝地质灾害导致一些地区群众面临返贫风险,习近平指出,把防止因疫因灾致贫返贫摆在突出位置,进行针对性帮扶。^④国务院扶贫办就及时防范化解洪涝地质灾害造成的返贫致贫风险提出,将洪涝地质灾害造成返贫致贫的、扶贫产品“卖难”的、特种养殖户转产的、“回流”的贫困劳动力及时纳入监测帮扶,特别是将因灾因疫返贫致贫人口及时录入监测系统,精准帮扶。^⑤

一些专家学者探讨了疫情对脱贫攻坚的短期影响及应对策略。刘永富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影响脱贫攻坚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这种影响除来自疫情本身,还取决于疫情防控的成本,即由于人流、物流限制,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扶贫产品销售及旅游、扶贫项目开工都受影响,如部分贫困劳动力1—3个月无务工收入,贫困户生产经营受阻,产业扶贫因生产和消费下降而不能增收。为此应建立疫情分析应对机制、尽快组织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贫困户发展生产,加强消费扶贫、加快扶贫项目实施,支持湖北脱贫攻坚。^⑥许源源分析认为,疫情对可行能力不足、生计脆弱的低收入者造成更大的返贫、致贫冲击;防止因疫返贫的发生,保障贫困主体健康权、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是关键,因而应开拓与完善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电商扶贫、旅游扶贫、劳务

①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部署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2020年2月21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0-02/21/content_5481871.htm。

② 《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2020年2月24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0-02/24/content_5482502.htm。

③ 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

④ 扶婧颖、万鹏:《洪灾之后如何发展?习近平为安徽“把脉开方”》,2020年8月22日, <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822/c164113-31832741.html>。

⑤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及时防范化解因洪涝地质灾害等返贫致贫风险的通知》,2020年6月30日, http://www.cpad.gov.cn/art/2020/6/30/art_46_182239.html。

⑥ 刘永富:《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力啃下脱贫攻坚硬骨头》,《求是》2020年第9期。

输出扶贫和专业性扶贫方式。^①

还有一些学者对疫情冲击下的贫困性质变化及贫困治理策略进行了思考。贺立龙、张衔提出，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防疫与脱贫矛盾焦点发生新变化，统筹推进脱贫攻坚与疫情防控，关键在于解决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的因疫返贫致贫问题；随着防疫与经济之间决策冲突缓和，在精准防控疫情反弹风险的约束条件下，精准支持弱势经济主体、全面重振市场动能成为高质量脱贫的根本保障；因此应尽快建立精准防疫与精准脱贫的统筹推进与协同治理长效机制，一方面追堵可能导致疫情反弹的治理漏洞，另一方面瞄准疫情伤害民生影响脱贫的传导路径与关键区域，围绕发展减贫进行精准施策和长效赋能，治理防疫脱贫中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② 章文光认为，可将疫情期间就业帮扶、产业帮扶、东西协作、定点扶贫作为城乡民生保障制度统筹建设的催化剂；加强对因疫情收入骤减或支出骤增户的监测，强化脱贫地区健康保障制度“软件”和公共卫生设施“硬件”建设，构建后疫情时代的相对贫困解决机制。^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实施的国情调研特大项目成果“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丛书”2020年11月发布。丛书指出，面对疫情冲击，应以应急和兜底思维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以疫情动态变化为依据，在合力攻坚的超常规治理基础上增加应急和兜底两项举措。应急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以农村社区为单元，以脱贫标准为基准，加强社区返贫和新致贫动态监测，简化边缘户识别、建档立卡、帮扶等程序，适当扩大监测范围和频率，应测尽测，随时将这部分人纳入动态帮扶范围；二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酌情增加应急性帮扶措施，例如扩大消费扶贫，新增以工代赈、扶贫公益性岗位等。兜底主要是指将保障脱贫的范围从无力脱贫户扩大到疫情冲击户，综合利用好低保、社会救助机制，应兜尽兜。^④

（二）破解深度贫困与全面高质量脱贫

脱贫攻坚的主要难点是深度贫困的脱贫工作，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⑤

① 许源源：《疫情对贫困地区影响分析及可持续脱贫建议》，《国家治理》2020年第13期。

② 贺立龙、张衔：《疫情常态化下统筹推进防疫脱贫的矛盾变化与策略调整》，《经济研究参考》2020年第6期。

③ 章文光：《疫情下加快思考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光明日报》2020年3月11日。

④ 戚易斌：《中国减贫经验学术研讨会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丛书”发布》，2020年11月10日，http://news.china.com.cn/2020-11/10/content_76894478.htm。

⑤ 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2017年8月3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8/31/c_1121580205.htm。

脱贫攻坚战从决定性成就走向全面胜利，最后一步是深度贫困堡垒的攻克，胜利成色在于脱贫质量，即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关于深度贫困的特征及其破解，习近平总书记继2017年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讲话之后，2020年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又作出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剩余脱贫攻坚任务集中于深度贫困地区（人口），其总量不大却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其中老年人、患病者、残疾人的比例达到45.7%；要进一步聚焦“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狠抓政策落实，“挂牌督战”；对没有劳动能力的特殊贫困人口强化社会保障兜底，实现应保尽保。^①

学界围绕“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进行了一些区域性的调查研究，但是针对深度贫困这一贫困类型的性质、规律与破解，还缺乏更深入的理论探讨。潘竞虎、冯娅娅利用Flexible方法进行中国农村深度贫困的空间扫描与贫困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发现贫困高风险区集中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深度贫困县多位于省际边缘区，主要分为地形要素制约型、区位交通制约型、经济收入制约型和生态环境制约型4类，这也是2020年后相对贫困的分布区域。^②贺立龙等在结构性视角下梳理了深度贫困的研究进展，发现深度贫困正从一个描述性概念扩展为一种衡量严重贫困的经济标准，基于贫困公理化衡量方法进展，可进行深度贫困的结构化识别与综合测度体系的构建；深度贫困具有不同于一般贫困的性质，呈现出在区域、人口群体、动态演化上的结构性分布特征，深度贫困在发达国家是不平等以及社会排斥问题在弱势人口生存危机上的体现，可通过安全网计划与就业帮扶进行动态管控，在发展中国家则是不均衡增长与市场失灵等结构性因素耦合作用的结果，应通过发展减贫与保障脱贫的综合施策进行系统解决；学界需积极构建中国深度贫困的结构研究范式，指导深度贫困的高质量破解以及返贫风险防控，为全球深度贫困问题解决作出贡献。^③

高质量脱贫是新时代中国脱贫攻坚工作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坚决杜绝数字脱贫、虚假脱贫；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高质量完成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队伍作风。^④刘永富指出，脱贫既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必须多管齐下提高脱贫质量，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历

① 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

② 潘竞虎、冯娅娅：《中国农村深度贫困的空间扫描与贫困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地理学报》2020年第4期。

③ 贺立龙、朱方明、刘丸源：《结构视角下的深度贫困研究进展》，《经济动态》2020年第2期。

④ 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

史和人民检验，攻坚期内要始终坚持这个标准，确保贫困人口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既不能脱离实际、拔高标准、吊高胃口，更不能虚假脱贫、降低标准、影响成色。^①朱方明、刘丸源提出，全面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②

脱贫质量界定及测度仍是学界探索的难点。王汉杰等基于“聚类—粗糙集”方法构建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脱贫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考察农户借贷对脱贫质量的影响，发现农户正规借贷能提升深度贫困地区精英农户脱贫质量，但对深度贫困户作用并不显著，应加快完善深度贫困地区信贷扶贫政策体系，提升农户脱贫质量。^③李志平、吴凡夫构建了包括生计资本和生计决策两个维度 15 个指标的生计抗逆力指数作为脱贫质量的代理变量，进而实证考察财政转移性支出对脱贫质量的影响，发现其对脱贫又返贫户的生计抗逆力提升程度最高。^④但是上述脱贫质量分析以一些特定统计及计量方法为主，高质量脱贫有何政治经济学含义和制度要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李实、沈扬扬提出，高质量脱贫不仅要注重脱贫的效果，更要注重扶贫的效能，新形势下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打造“多维多赢”发展格局、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内容；同时应时刻警惕脱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充分地发挥各种扶贫资源的价值和作用。^⑤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开发〔2020〕6号），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国家扶贫标准 1.5 倍左右的家庭定为不稳定脱贫户，据此，贺立龙将脱贫质量理解为收入脱贫层次、扶贫施策实效、隐性贫困与主观贫困消除，以“质量”基准取代“达标”基准，建构了脱贫质量的一个多维测度框架，对一般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脱贫质量进行了比较测度，发现前者质量短板在收入维度，后者在非收入维度。^⑥

① 刘永富：《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力啃下脱贫攻坚硬骨头》，《求是》2020年第9期。

② 朱方明、刘丸源：《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保障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2期。

③ 王汉杰、温涛、韩佳丽：《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借贷能有效提升脱贫质量吗》，《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8期。

④ 李志平、吴凡夫：《继续增加财政转移性支出可以提高脱贫质量吗——基于生计抗逆力和 CFPS 数据的实证》，《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11期。

⑤ 李实、沈扬扬：《高质量脱贫：内涵、意义和路径》，《国家治理》2020年第28期。

⑥ 贺立龙：《脱贫质量测度的一个多维框架及区域应用》，工作论文，2020年10月。

二、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机制、策略及其成效评估

长期以来,围绕中国减贫的道路、模式及具体机制、策略、政策,学术界从各角度进行了大量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随着脱贫攻坚走向胜利收官,2020年国内学者主要聚焦“贫困县”扶贫、金融精准扶贫、城镇化带动减贫、企业扶贫等重点命题,进行中国特色减贫方略与政策机制的成效评估与经验总结。

(一) 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方略及其实践效果

罗良清、平卫英通过对中国1991—2015年贫困变化的统计分解,从经济增长、不平等和人口变动三个方面解释贫困变化的总效应,检验城镇化对城乡贫困的影响。他们发现大规模减贫离不开增长提供的物质基础,但不平等导致贫困群体从增长中得到的份额逐渐减少;人口城镇化是减轻农村贫困的重要途径,但随着这一效应在减缓,推进乡村振兴变得必要且及时。特别是2011年以来,贫困缺口指数降速趋缓,贫困阶层有固化态势,深度贫困治理及相对贫困管控势在必行。^①周京奎等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农地流转、职业分层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发现农地转出是推动贫困家庭职业分层与减贫的重要动力,其中职业分层是农地流转减贫的关键机制,这种机制效果与非农职业职业声望等级有关,贫困率更高的村、价值更低农地转出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②

徐舒等研究了国家级贫困县政策的效果。他们基于农业农村部1986—2011年微观面板数据,对国家级贫困县设立的减贫效果及收入分配效应进行实证考察发现,这一政策使贫困地区贫困率平均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且具有外部效应,即能改善国家级贫困县内部收入分配情况。这一政策缩小了贫困县内部收入差距,增加了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机会,有利于贫困家庭跳出贫困陷阱。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鼓励外出务工是扶贫政策起作用的重要途径。^③张楠等考察了中国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的减贫效应。他们以2003—2016年东部80个地级市的数据为样本,利用扶贫改

① 罗良清、平卫英:《中国贫困动态变化分解:1991—2015年》,《管理世界》2020年第2期。

② 周京奎、王文波、龚明远、黄征学:《农地流转、职业分层与减贫效应》,《经济研究》2020年第6期。

③ 徐舒、王貂、杨汝岱:《国家级贫困县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经济研究》2020年第4期。

革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试验，使用合成控制法识别了试验区政策的减贫效应、影响机制及作用渠道，发现政策的实施显著实现了收入减贫与多维减贫，即农户收入得到提高和跌入多维贫困概率降低；试验区内家庭的各类收入增加，贫困脆弱性和慢性贫困降低。减贫政策效果差异的宏观影响机制是包容性增长，即通过保险覆盖、金融参与和社会网络等渠道对农户增收和减贫产生间接影响。未来应进一步优化差别化扶贫政策、创新贫困监测机制、构建多元协同扶贫机制并建立城乡统筹反贫困体系。^①

文雁兵等借助百强县和贫困县数据，研究官员治理能力与增长及减贫的关系。他们构建由百强县和贫困县组成的 846 个县级行政单位 2006—2015 年县委书记特征和辖区增长匹配数据，定量识别县级官员经济治理能力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具有经管类专业教育背景和基层提拔工作经历个体特征的县委书记有助于贫困县经济增长，据此提出应重视官员经济治理能力，加快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② 杨义东、程宏伟基于公益项目资本性考量，采集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政治资源对企业精准扶贫的影响，发现政治资源驱动了企业精准扶贫，行业同构也对之产生积极影响；国有企业参与度高但支出水平低，民营企业参与度低但支出水平高。精准扶贫为企业融资、税收规避创造了经济利益，这证实了政治资源驱动企业精准扶贫的观点，对政府优化政治资源配置和把握精准扶贫政策走向有重要启示。^③

（二）精准扶贫的政策、机制及其运行绩效

李芳华等基于贫困人口微观追踪数据，考察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户劳动收入和劳动供给的短期影响，发现精准扶贫新政策显著提高了贫困户劳动收入，其中 2016—2018 年劳动收入效应的主要来源由劳动时间增加转向劳动生产率提升，这一政策在前期对男性劳动供给的促进作用大于女性，但从长期趋势看，带动女性参与劳动的潜力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易地搬迁和产业扶贫是贫困户劳动供给增加的主要渠道，“光伏扶贫”则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呈现负激励，削弱了其他政策的减贫效果。^④

① 张楠、张栋浩、李建军、卢洪友：《长期减贫的未雨绸缪——来自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证据》，《财贸经济》2020 年第 3 期。

② 文雁兵、郭瑞、史晋川：《用贤则理：治理能力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百强县和贫困县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20 年第 3 期。

③ 杨义东、程宏伟：《政治资源与企业精准扶贫：公益项目下的资本性考量》，《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0 年第 9 期。

④ 李芳华、张阳阳、郑新业：《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基于贫困人口微观追踪数据》，《经济研究》2020 年第 8 期。

金融扶贫与信贷扶贫的作用机制和效果是学界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研究的焦点议题。尹志超等基于2011—2017年CHFS数据,研究精准扶贫政策对农业信贷渠道与规模的影响,发现精准扶贫政策使贫困户获得农业正规信贷的概率和规模都有提高;这种政策效果在西部更为显著,反映出该政策在推动金融扶贫区域间协同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非贫困县贫困户正规信贷获得概率及规模提升效果更为显著,体现出先“区域整体”再“精准突破”的贫困治理思路。他们还发现正规农业贷款资金不存在明显的“精英俘获”效应,但极度贫困家庭正规信贷获得仍未发生显著变化,由此可见,极度贫困家庭获得正规金融的渠道还需进一步完善。^①

基于扶贫小额信贷的政策性金融扶贫是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刘丸源等阐释了政策性金融扶贫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即打破小农经济货币资本自我积累不足的经营困境需要外源性货币资金,政策性金融是商业融资的必要补充;金融扶贫核心是生产赋能,给予小农主体以货币资本而非消费资金救济,效能取决于小农经营绩效与市场效率。政策信贷有时难以精准识别有经营动机和回报能力的贫困主体,加之信贷发放中的风险考量不足,易出现“坏账风险”。将信贷资金精准配置到最需要的对象手中是绩效提升的关键一环。对扶贫小额信贷运行的乡村调研考察表明,扶贫小贷供需匹配精准性不足,与农户受教育程度、发展状况以及家庭社会关系等条件相关,也与扶贫小额信贷政策信息传递有关。提升政策性金融扶贫精准性,一方面需要以多渠道方式将政策信息准确传递给政策目标农户;另一方面还需要有多元扶贫政策的长期配合,比如教育扶贫、信息扶贫和知识扶贫等。在此基础上,激发未脱贫和刚脱贫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引导其参与乡村产业振兴。^②

刘锦怡和刘纯阳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及实现机制。他们认为,互联网的“泛在性”特征降低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供给和使用成本,有助于拓展农村金融服务覆盖广度和贫困农户使用深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为贫困农户创造了更多经济机会,从而直接或间接减缓了农村贫困。为验证上述判断,他们利用201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及其影响机制进行计量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促进互联网信贷和互联网保险发展(即金融可得性)直接减缓农村贫困,也通过增加个体就业和私营企业就业(即经济机会)间接减缓农

^① 尹志超、郭沛瑶、张琳琬:《“为有源头活水来”:精准扶贫对农户信贷的影响》,《管理世界》2020年第2期。

^② 刘丸源、贺立龙、涂云海:《政策性金融扶贫的精准性:基于扶贫小额信贷乡村调研的经验考察》,《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7期。

村贫困；直接增加贫困农户金融可得性的减贫效果在整体上优于瞄准当地经济和产业发展为贫困农户带来更多经济机会的减贫效果。他们认为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仍应瞄准直接增加农户金融可得性这一目标。^①

胡浩志和张秀萍考察了精准扶贫参与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探讨了企业扶贫的内生经济动因。他们将精准扶贫导入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框架中，选取沪深 A 股主板上市公司中 2016—2018 年持续参与扶贫的公司为样本，检验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发现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的规模越大，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越显著，其作用机制在于：上市公司通过参与精准扶贫获取了更多市场资源、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也直接获取了政府补贴等政治资源，从而促进了企业绩效增长。进一步研究发现，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还受制于不同制度环境与产权属性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相较教育扶贫，企业增加产业精准扶贫投入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②

三、中国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重大意义

2020 年中国 832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这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反贫困事业的重大贡献，向全球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与能力。2020 年学术界回顾与梳理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减贫事业的伟大进程，阐释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精准扶贫方略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成就与制度优势，总结了中国脱贫攻坚的历史价值、世界意义和国际贡献。

（一）脱贫攻坚的历史意义与世界贡献

黄承伟提出，总结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世界历史意义是必要而紧迫的。他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伟大意义的重要论述表明，脱贫攻坚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体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底线任务，到 2020 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中国共产党向

^① 刘锦怡、刘纯阳：《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效果与机制》，《财经论丛》2020 年第 1 期。

^② 胡浩志、张秀萍：《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改革》2020 年第 8 期。

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作出的郑重承诺，是对全球减贫的重大贡献；习近平关于脱贫攻坚意义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有关扶贫开发意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梳理了国内外论述脱贫攻坚意义贡献的代表性观点，即脱贫攻坚具有政治、制度、实践及国际意义，中国减贫经验为世界带来福祉。他认为，总结脱贫攻坚历史意义，要体现脱贫攻坚的直接效果和间接影响、分析其多重溢出效应，总结物质成效和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贡献，看到其为贫困地区开启新征程奠定的基础，具体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贫困地区发展进程、提高贫困地区自我发展及其乡村治理能力、培育脱贫人口可持续脱贫能力、彰显政治制度优势和治理能力等方面总结。他还从增强全球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减贫目标的信心、贡献中国减贫智慧和方案等方面阐述中国的脱贫攻坚的世界贡献，即为发展中国家减贫树立“标杆”，为解决贫困治理难题提供了可行精准方略。^①

一些学者探讨了中国特色精准扶贫方略的思想内涵、理论创新及价值贡献。雷鸣、邹培从“准”“精准”“可持续”“扩权赋能”“全员式扶贫”“共生共建共享”“反贫困命运共同体”七个方面阐释精准扶贫的思想内涵，揭示出精准扶贫的价值贡献——充分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三个问题。他认为，精准扶贫是一次实践创新、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其利用社会制度优势，采取了中外扶贫史上独有的扶贫措施，如村支部挂帅的村“两委”统揽本村脱贫攻坚、扶贫基层单位下移的驻村工作队制度、建档立卡制度、市场经济条件下全社会参与扶贫、可持续发展能力培育，精准扶贫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发展观、反贫困思想的重要补充和贡献，将会成为全球治理研究的参考；“社会参与、构建五位一体社会大扶贫格局”是新时代用宏观调控、制度框架、法律法规弥补“市场失灵”，用转移支付、公共服务均等化平抑初次分配差距的创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个也不掉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成功实践，发展了人类未来发展理论。^②

一些学者从国家治理视角审视脱贫攻坚的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燕继荣认为，贫困问题被视为国家发展的衡量尺度，应成为国家治理的任务、反映国家治理的水平。中国扶贫成就突出，特别是 2012 年以来在大扶贫格局下开展脱贫攻坚战，把贫困治理纳入国家治理战略目标，实行政府专项治理的方式，动员党政机构、企业、军队、学

① 黄承伟：《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历史意义与世界贡献》，《中国扶贫》2020 年第 7 期。

② 雷鸣、邹培：《精准扶贫的思想内涵、理论创新及价值贡献》，《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 年第 4 期。

校、社会组织与团体全员参与，并采用精确识别、建档立卡、责任到人方法，凭借国家制度体系的政治和行政优势，运用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储备精准施策、对口支援，实施产业脱贫、搬迁脱贫、生态补偿脱贫、教育支持脱贫、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减少。中国贫困治理丰富了“发展型国家”内涵，为后发展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①

中国减贫方案和减贫成就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将有1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国际社会对中国减贫方案是高度赞扬的，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希望分享中国的减贫经验。^②中国减贫的全球意义引发国内外专家学者热议。蒋永穆认为，中国减贫不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展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击破了西方学者贫困无法消除的浅薄之见，也让仍身处贫困的人们看到了一种现实脱贫可能性；制度减贫、精准扶贫将成为人类减贫史华章。^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国为全球减贫做出了最大贡献”，“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联合国粮农组织学者桑德拉姆提出，“希望中国将经验推广到世界，帮助更多国家摆脱贫困”；世界银行前行长金墉评价中国扶贫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巴西学者埃万德罗·卡瓦略认为，中国的脱贫攻坚证明中国制度和治理模式具有优越性；美国学者库恩表示，减少贫困一直是中国发展和现代化的一个优先事项，“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中国史无前例的扶贫行动，记录为世界历史上对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最大贡献”。^④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指出，消除绝对贫困堪称中国共产党改变中国的伟大成就之一，这关乎中国命运、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变；中国脱贫也改变了世界，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减贫人数占全球减贫人数的四分之三，这是对人权的巨大贡献，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展示的是，脱贫是可以实现的，并为之带来了希望、树立了榜样。^⑤

① 燕继荣：《反贫困与国家治理——中国“脱贫攻坚”的创新意义》，《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

② 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

③ 蒋永穆：《消除绝对贫困：夯实“全面小康”的根基》，2020年9月21日，http://www.qstheory.cn/wp/2020-09/21/c_1126520652.htm。

④ 李嘉宝：《中国必将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3月16日。

⑤ 李瑛：《马丁·雅克：消除绝对贫困堪称中国共产党改变中国的伟大成就之一》，2020年7月1日，https://world.gmw.cn/2020-07/01/content_33957336.htm?s=gmwreco2。

（二）消除绝对贫困的“制胜密码”与“中国之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脱贫攻坚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①

一些学者分析了中国实现大规模脱贫的成功经验。汪三贵和胡骏将新中国70多年推进反贫困历程的实践经验总结为，坚持大扶贫格局，不断向贫困人口赋权，不断满足人民需求，不断创新反贫困机制。^②同时汪三贵认为，理解中国实现大规模减贫的原因，要明确贫困度量是以经济福利为基础的，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成为国家大规模减贫的先决条件。中国减贫成就是持续高速增长和针对性扶贫开发共同作用的结果，前者为贫困人口提供了就业和增收机会，国力增强让政府有能力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后者表现为中央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对贫困地区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③蒋永穆和卢洋提出，中国之所以有能力在这么短时间内实现大规模脱贫，离不开三个方面因素的作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贫困与反贫困理论为指导、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贫困与反贫困思想，是消除绝对贫困的能力之源；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凝聚形成消除绝对贫困的强劲合力，是消除绝对贫困的能力之本；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贫困问题、持续探寻多种途径破解贫困顽疾的中国方案，是消除绝对贫困的能力之魂。^④

更多学者将绝对贫困问题的成功解决归结于“中国之治”，阐释中国脱贫攻坚的政治保障、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黄一玲和刘文祥基于对我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展望，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消灭贫困的政治保证。^⑤贺立龙提出，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解决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功能发挥，制度取向是绝对贫困的综合施治与系统解决，是短期纾困与长效赋能、政策兜底与内生脱贫的统一，普惠支持与精准施策的均衡；核心逻辑是政府发挥战略先导作用与市场在发展脱贫渐进起决定作用的耦合互动，其通过中央统领、对口支援与地方能动的资源集成与机制联动，建立新型举国扶贫体制，推动绝对贫困超常规破解；从扶贫到脱贫的主体化、内生化

① 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3月9日。

② 汪三贵、胡骏：《从生存到发展：新中国七十年反贫困的实践》，《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2期。

③ 汪三贵：《中国扶贫绩效与精准扶贫》，《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1期。

④ 蒋永穆、卢洋：《消除绝对贫困的中国之能探赜》，《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2020年第5期。

⑤ 黄一玲、刘文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消灭贫困的政治保证——我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展望》，《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

发力，从系统变革到微观干预的全方位帮扶，从瞄准到施策、赋能的一体化操作，形成精准识别与施策赋能机制；制度效能体现在脱贫退出的高质量、长效性与内生动力上。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政治保证的精准扶贫行动扭转了形式主义扶贫趋向，产生了更系统彻底的脱贫成效。提升脱贫质量、管控返贫风险考验中国制度优势的持续性。^① 蒋永穆等提出，中国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减贫理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围绕彻底消除绝对贫困，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不断发展生产力为物质基础，将保障性扶贫与开发式扶贫相结合、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形成了基于中国实践的制度减贫理论体系。新形势下需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完善“三有”的减贫体系。^②

中国脱贫贡献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使得中国减贫模式与制度范式成为国际比较研究热点。关于中国模式与经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精准扶贫方略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巴西学者罗尼·林斯认为，中国减贫针对性强，“找准了贫困的根”，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教育等措施避免贫困复返，为不少国家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启示；柬埔寨学者谢莫尼勒发现，面对疫情冲击，中国共产党并未放弃 2020 年全部脱贫的目标任务，基层干部对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积极，“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凝聚力、执行力，也得益于中国高效的政治体制”；巴西学者卡瓦略认为，中国追求的发展不仅是 GDP 增长，而且将发展与减贫紧密联系，增进民生福祉，这一点上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榜样，中国“授人以渔”式扶贫为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动力。^③ 关于中国减贫的国际研究，王爱云梳理了关于中国消除农村绝对贫困问题的国际文献，发现国外学者注重运用国际减贫理论分析中国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措施，进而运用中国减贫实践验证国际减贫理论的有效性，总结中国减贫经验为世界发展中国家减贫提供借鉴。^④ 关于中国减贫的理论创新，周文提出，阿比吉特·班纳吉等诺奖获得者的贫困理论及随机对照试验，无法阐释为人类减贫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样本，这不仅反映发展经济学贫困理论的片面性，也映射出中国经济学贫困理论在世界舞台

① 贺立龙：《中国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制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4期。

② 蒋永穆、万腾、卢洋：《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马克思主义制度减贫理论》，《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9期。

③ 李嘉宝：《中国必将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3月16日。

④ 王爱云：《国外学者对中国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3期。

的失语。^① 贺立龙等认为，阿比吉特·班纳吉将制度与行为分析纳入发展经济学范畴，探究贫困的经济本质与穷人的行为逻辑，通过细致的行为探测与干预性实验开展政策研究，这与中国精准扶贫理念有相通之处；但是班纳吉关于经济发展与不平等的制度分析、对贫困者行为和减贫的实验研究，未充分触及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制度本质，尽管有助于一些个性化的减贫施策优化，但难以推进发展中国家结构性贫困问题的系统解决——对于后者的研究，应该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②

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脱贫攻坚胜利之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一个重点是接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2020年学术界围绕脱贫成果的巩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及衔接进行了较多探讨。

（一）稳定脱贫与脱贫攻坚成果巩固

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巩固脱贫成果难度很大。已脱贫的地区和人口中，有的产业基础比较薄弱，有的产业项目同质化严重，有的就业不够稳定，有的政策性收入占比高。数字脱贫、虚假脱贫仍有发生，部分贫困群众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因此要多措并举巩固成果，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稳定，设定脱贫过渡期，严格落实“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要求，加快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骤减或支出骤增户加强监测，提前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施，不能等他们返贫了再补救。^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丛书”指出，一些脱贫人口的返贫风险主要集中在：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虽然达到脱贫标准，但是超过标准不多，分红和补贴性收入占比高，脱贫还不稳定；住户调查数据表明，农村居民还有较高的动态返贫率和较大的边缘人口规模；疫情冲击的长期影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未来经济增

① 周文：《减贫实践的中国贡献与经济学诺奖的迷误》，《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4期。

② 贺立龙、陈月、陈珏颖：《经济发展与贫困治理的微观阐释：阿比吉特·班纳吉的研究贡献》，《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11期。

③ 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

长和新增就业能力难以估计，可能会导致一部分家庭返贫。丛书强调，应不断增强脱贫支撑条件的可持续性，使建档立卡户和原贫困地区能够稳定脱贫；考虑到疫情冲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影响及其对脱贫工作的直接间接影响，建议将“十四五”时期前两年定为脱贫巩固提升缓冲期。缓冲期内重点做好：全面加强扶贫资产的清查和监管；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扶持措施，为建档立卡户和受疫情冲击失业的贫困户就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包括职业教育和劳动技能培训；对近1000万搬迁户继续实施后续帮扶。缓冲期内对扶贫资产、资源、社区建设措施与到户支持措施进行区分：前者以资产保值增值、能力建设为主要目标，权益和收益归属于其所有者，优先惠及建档立卡户，重点用于失能、重病及突生家庭变故的少数困难户；后者采取常规到户支持措施，继续支持脱贫户。^①

学界的脱贫内生动力研究缺乏系统性的解释框架。傅安国等从心理学与经济学交叉视角进行脱贫内生动力机制探究。他们运用深度访谈的扎根理论方法和强度抽样策略，以海南岛某深度贫困村的脱贫个体（7人）、世代贫困个体（10人）及扶贫干部（4人）为对象，进行世代贫困家庭内生动力资源枯竭模型研究，发现：以消极价值观、自我观和被动脱贫倾向为主体的“三因素洋葱模型”是世代贫困的消极内在驱动力；控制感缺失是世代贫困个体内生动力匮乏的诱因，而贫困个体缺少市场理性及扶贫的运动式治理是控制感缺失的外部肇因；家庭内部建设能力可促进家长亲职能力的提高，进而激发子代脱贫的内生动力。^②

围绕打赢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战、确保稳定脱贫不返贫，贺立龙和张衔调研提出了亟须识别与化解的五个方面的隐性风险。第一，对农民工重视不够可能导致防疫致贫隐患，应高度警惕农民工群体疫情风险，针对这一群体建立健全可追踪、长效性的疫情监测预警机制与防疫保障体系，并将之与返贫治理结合。第二，监督“缺位”可能导致脱贫成果被侵蚀，如高山或高原贫困村安全用水隐患、空巢（失养）老人与留守（失依）儿童隐性贫困、脱贫名义下过度开发或举债形成的“烂尾”风险，等等。第三，可能出现突发密集返贫风险。如产业失败风险及救济陷阱导致的大面积返贫，应尽快制定应对预案，多渠道开展生计赋能。第四，制度执行缺陷可能导致乡村治理漏洞。如干部正向激励不足、产业政策依赖、帮扶力量失衡，脱贫地区面临2020年之

^① 戚易斌：《中国减贫经验学术研讨会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丛书”发布》，2020年11月10日，http://news.china.com.cn/2020-11/10/content_76894478.htm。

^② 傅安国等：《脱贫内生动力机制的质性探究》，《心理学报》2020年第1期。

后帮扶支持政策接续与乡村治理转型挑战，应防止2020年后出现乡村治理“断裂带”。第五，脱贫宣传策略不当可能导致的舆情风险。^①

稳定脱贫、不返贫是巩固脱贫的要义。陈永伟等研究了农村家庭脱贫时间路径及其策略选择，他们使用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农村家庭的脱贫速度及脱贫稳定性，发现脱贫存在“久期相依性”，37.2%的贫困人口“贫困持续”1年后可快速脱贫，“持续”5年后脱贫人口占比下降至8.6%；多数家庭脱贫后人均收入增长到贫困标准2倍以上，也有15%脱贫人口在3—5年后会出现返贫；外出务工或提高自有土地资产价值可提升家庭快速脱贫概率，也会提高脱贫家庭持续获取更高收入增幅的概率，但慢性病患者家庭脱贫更慢、脱贫后收入增幅更低；政府对贫困家庭提供的收入补助对帮扶脱贫、抑制返贫中的作用不显著，还会降低家庭在脱贫后赚取更高收入的概率。因此，应进一步保障农村家庭居民的健康需求，切实减轻居民医疗支出负担，适度盘活农村家庭资产推动居民增收，利用现行结对帮扶政策构建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② 围绕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蒋和胜等提出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包括稳定脱贫与乡村产业振兴衔接机制、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内生动力能力生成机制、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稳定脱贫协同机制、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脱贫政策延续保障机制。^③

（二）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及衔接过渡

2020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提出一系列指示。3月6日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4月20日在陕西考察时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接下来要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5月11日在山西调研时指出，千方百计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接下来要把乡村振兴这篇文章做好，让乡亲们生活越来越美好；5月22日下午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巩固和拓展产业就业扶贫成果，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9月中旬在湖南考察时指出，要落实“四个不摘”，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深入研究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12月底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

① 贺立龙、张衔：《决战脱贫攻坚亟需重视化解五大隐性风险》，四川社科联《重要成果专报》2020年3月。

② 陈永伟、侯升万、符大海：《中国农村家庭脱贫的时间路径及其策略选择》，《中国人口科学》2020年第1期。

③ 蒋和胜、邹涛、李小瑜：《积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光明日报》2020年9月11日。

转移，要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脱贫攻坚完成后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要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对现有帮扶政策逐项分类优化调整，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现象。做好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帮扶政策保持总体稳定，分类调整优化，留足政策过渡期。

曹立和王声啸研究了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从理论逻辑看，二者具有价值取向和实现目标的内在统一性；从实践逻辑看，二者具有行为的耦合性。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任务，乡村振兴是精准扶贫的深化。当前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面临着诸多困难：从主体维度看，存在着个体性与整体性衔接的困难；从时间维度看，存在着短期性与长期性衔接的困难；从目标维度看，存在着绝对性与相对性衔接的困难。为了统筹应对这些困难，我们要通过推进“五个振兴转变”即从产业扶贫向产业振兴转变、从尖兵扶贫向人才振兴转变、从文化扶贫向文化振兴转变、从生态扶贫向生态振兴转变、从组织建设向组织振兴转变，寻找衔接点和突破口，探索实现从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平稳过渡的路径。^②

涂圣伟从目标导向、重点领域与关键举措三方面论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他提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两大战略部署，具有理念相通性和阶段递进性，提高二者政策匹配度和实践融合度，关系到脱贫攻坚质量和乡村振兴实效。推进二者衔接，应以促进包括脱贫人口在内的全体农村居民的生计改善和全面发展为根本导向，聚焦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现代化、扶贫资产管理和高效利用、绿色减贫长效机制构建等重点领域，加快政策深化调整、工作体系转变、资源配置转型，提升脱贫效果可持续性，促进减贫治理长效化，实现乡村内生性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③

^① 鹤鸣：《习近平心中的乡村振兴什么样？》，2020年12月31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7587045630551981&wfr=spider&for=pc>。

^② 曹立、王声啸：《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③ 涂圣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目标导向、重点领域与关键举措》，《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9期。

高强从政策转移接续的视角，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行了再探讨。他认为，二者有效衔接目标应定位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缓解相对贫困、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四个主要方面；关键在于路径衔接，体现为微观政策的转移接续。他提出，依靠乡村振兴战略接续推动长效减贫、巩固脱贫成果，需把握多维扶贫、城乡扶贫、制度扶贫、社会扶贫四个重点，建立覆盖工农、城乡一体的扶贫体制，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应从政策退出、政策加强、政策转化、政策新设四个方面研究提出长效减贫的实现路径，重塑减贫政策体系；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还需明确政策过渡期限，重启新一轮扶贫改革试验，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加强扶贫领域国际合作。^①

贺立龙探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在农户和产业层面的微观实现机制，认为推动脱贫农户融入乡村产业振兴，既是农户现代化转型的内在需求，又为乡村振兴提供主体支撑。从乡村产业与脱贫农户融合共生的经济性质出发，提升农户经营能力、优化机制设计、推进不同脱贫农户经营乡村产业链的适宜环节可以切实推动高质量脱贫与乡村产业振兴的有序衔接。^②

五、2020年之后中国贫困治理转型与相对贫困问题的解决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并不意味着贫困一劳永逸地被消除，返贫风险管控、相对贫困问题解决，将成为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新命题。政治经济学界针对2020年之后中国贫困情况新变化、减贫战略与贫困治理的转型、相对贫困问题的度量及解决进行了前瞻性的研究探讨。

（一）2020年之后中国贫困性质变化与贫困治理战略转型

张琦、孔梅提出了“十四五”时期我国减贫的目标及战略重点，认为需要设置一个巩固期以实现脱贫成果的常态化和持续化，将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作为“十四五”时期的贫困治理新目标，为治理相对贫困奠定良好基础，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和现代化

^① 高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再探讨——基于政策转移接续的视角》，《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② 贺立龙：《乡村振兴的学术脉络与时代逻辑：一个经济学视角》，《农业经济研究》2020年第2期。

建设。^① 李小云等认为，中国农村贫困格局变化要求调整减贫战略与政策，2020年之后农村贫困治理要从“扶贫”转向“以防贫为主”；战略目标要从制定不同的绝对贫困标准并继而超越绝对贫困标准，转变为逐步实现城乡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缓解不平等；应梳理现行政策工具，建立以防贫为导向的减贫政策体系。^②

李迎生提出，后脱贫攻坚时代应构建一体化的反贫困制度体系，贫困治理重点转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但巩固脱贫成果任务艰巨，关键是要构建一体化的反贫困制度体系，将相对贫困治理与绝对贫困治理统筹兼顾，涉及三个层面的整合：宏观制度设计，反贫困与宏观政策统筹兼顾，提高低收入地区人群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反贫困制度（政策）的一体化，涉及扶贫开发政策与社会救助制度整合，提升贫困家庭及个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反贫困管理体制的一体化，实现宏观反贫困政策与微观反贫困制度的结合。^③ 贺立龙提出，全面小康时代应积极推动从以物质基建、要素输入为主的超常规减贫，转为以科技基建、制度供给为主的乡村振兴与相对贫困管控，实现贫困治理现代化。^④

（二）相对贫困标准的制定与相对贫困问题的解决

2020年之后农村贫困新标准特别是相对贫困标准的制定正成为关注的热点。汪晨等探讨中国减贫战略转型及其挑战指出，中国在2020年之后可能从使用绝对贫困线标准改为相对贫困标准。但比较绝对贫困发生率和相对贫困发生率适应性与优劣之后，他们认为中国采用相对贫困标准为时过早，使用相对贫困标准还可能带来一系列挑战。未来中国应通过强化对贫困家庭就业、教育、医疗和职业培训方面的支持，使其获得摆脱绝对和相对贫困的能力。^⑤ 潘文轩和阎新奇认为，全面脱贫后亟须构建新的农村贫困标准。他们根据贫困标准制定规律与演进趋势，对2020年后制定农村贫困新标准思路与措施进行探索提出，农村贫困新标准是一个以相对贫困标准方向、以多维贫困标准为核心，包含国家与地方双层标准的体系；绝对贫困标准向相对贫困标准的转变宜采用渐进方式，设立有过渡性质的一般贫困标准，坚持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相结合

① 张琦、孔梅：《“十四五”时期我国的减贫目标及战略重点》，《改革》2019年第11期。

② 李小云、苑军军、于乐荣：《论2020后农村减贫战略与政策：从“扶贫”向“防贫”的转变》，《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2期。

③ 李迎生：《后脱贫攻坚时代构建一体化的反贫困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④ 贺立龙：《中国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制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4期。

⑤ 汪晨、万广华、吴万宗：《中国减贫战略转型及其面临的挑战》，《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1期。

的原则。^① 王小林和冯贺霞探讨了 2020 年后的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指出，中国扶贫工作将由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对贫困转变，可基于可行能力理论从“贫”和“困”的视角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概念框架和政策取向。他们认为，2020 年后中国应采用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没必要与 OECD 国家相对贫困标准接轨。多维相对贫困标准要包括“贫”的经济维度、反映“困”的社会发展维度以及生态环境维度：经济维度考虑收入和就业，社会发展维度考虑教育、健康、社会保障、信息获得，新发展理念以及生态补偿脱贫实践经验要求把生态环境纳入多维贫困框架中。^②

走向共同富裕的相对贫困问题解决是学界研究的焦点。檀学文认为，中国中长期解决相对贫困应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要在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框架下设立解决相对贫困目标；为满足贫困和社会进步监测需要，可制定多元相对贫困标准体系；既坚持国际上的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三支柱”战略，又结合国情进行调适，尤其是应坚持发展支持战略与政策导向；相对贫困治理需转向常规化，对大扶贫格局进行优化，实行制度化、法制化贫困治理。^③ 蒋永穆提出，解决相对贫困是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重要组成，是人类社会追求的发展目标，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减贫的新奋斗方向；要把握贫困的动态变化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识别机制，把握贫困的多维表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保障机制，把握贫困的深层原由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动力机制。^④ 范和生和武振宇提出，新时期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的构建主要面临政策有效性、脱贫可持续性、能力贫困、人文贫困、精神贫困等五大困境，通过建立健全制度保障、产业培育、能力建设、人文发展、心理服务等五大机制，以能力建设机制为核心，贯穿带动其他机制联动，构建起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⑤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丛书”指出，“十四五”时期推动贫困治理从绝对贫困顺利转向相对贫困，可开展五个方面的基础性工作。一是建立符合国情的“三支柱”减贫战略。世界银行提出了“三支柱”减贫战略，即“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2020 年以后我国可在现有制度和政策框架基础上建立起一个针对相

① 潘文轩、阎新奇：《2020 年后制定农村贫困新标准的前瞻性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20 年第 5 期。

② 王小林、冯贺霞：《2020 年后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国际经验与政策取向》，《中国农村经济》2020 年第 3 期。

③ 檀学文：《走向共同富裕的解决相对贫困思路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20 年第 6 期。

④ 蒋永穆：《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 年第 2 期。

⑤ 范和生、武振宇：《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构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 年第 1 期。

对贫困人口、更加符合国情的新型“三支柱”减贫战略，可考虑由包容性增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护构成。二是推动农村反贫困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将以精准扶贫为目的的区域开发、产业扶贫、易地搬迁、转移就业等接续性工作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中。三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多元贫困标准和监测体系。可考虑兜底型贫困标准、数值型相对贫困标准、比例型相对贫困标准、多维贫困标准以及共享繁荣指标等，对多元贫困标准进行探索，比较不同贫困标准，更好地选择指标、阈值以及对应的政策设计。四是探索基于新的技术手段以及适应相对贫困治理需要的识别、登记和管理信息系统。五是稳妥推动扶贫工作体制转型。相对贫困属性决定其不再适用超常规治理，而是需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相对贫困治理常态化和现代化。未来的贫困治理必须追求制度化、法制化，对政府、贫困家庭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规定和约束。增强基层社会服务能力，培育相对贫困发现和干预的响应性与集成性能力。^①

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与实践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论述及其解读

《求是》2020年第11期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一文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进展，“基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成效比当初预期的还要好。作出这个重要判断，是有充分依据的”。党的十八大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这就是我们的衡量标准。要把握好整体目标和个体目标的关系、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的关系、定量分析和定性判断的关系。正确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短板问题，从人群看主要是老弱病残贫困人口；从区域看主要是深度贫困地区；从领域看主要是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短板明显。下一步要解决好重点地区环境污染突出问题、加快民生领域工作推进、健全社保兜底机制。^②

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① 戚易斌：《中国减贫经验学术研讨会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丛书”发布》，2020年11月10日，http://news.china.com.cn/2020-11/10/content_76894478.htm。

^②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求是》2020年第11期。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谈到了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完成情况和宣布时机。他提出，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是我们党进入新世纪后，在基本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提出的奋斗目标，是对人民的庄严承诺。考虑到目前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时，建议稿表述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明年上半年党中央将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系统评估和总结，然后正式宣布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强调要“对标对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强化举措、狠抓落实，集中力量完成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两大重点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在“三农”。农村基础设施不足、公共服务落后是农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民生问题，也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最直观的体现。^②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论述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意见精神，国内学者进行了解读。齐卫平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论述思想鲜明、理论深刻，具有人民性、实践性、创新性、时代性特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指导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创新实践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③ 王晓毅提出，农业农村问题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不平衡依然是未来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农业农村更是中国发展的短板；在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发展的差距和新出现的问题使农业农村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而且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都需要长期关注。农业农村问题比较突出地体现在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还存在短板、农业生产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乡村治理还需要进一步强化上，补短板一是补齐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两个突出短板，二是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和提高农民收入，三是加强农村基层治理。^④

①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2020年11月3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2337707788200370&wfr=spider&for=pc>。

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

③ 齐卫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论述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

④ 王晓毅：《补齐“三农”短板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论坛》2020年第8期。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意义、原因和启示

一些学者总结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成果与世界意义。谢伏瞻提出，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实现温饱”到进入“小康生活”，到“全面建设”，再到“全面建成”，建设小康社会思想不断发展。建设小康社会思想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实际变化，符合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和远见卓识，反映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深邃认识和准确把握，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就表现在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制度体系更加成熟定型、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民族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① 陈晋总结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意义和当代启示，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设立的一个阶段性目标，拓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途径和布局；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促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是中国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耀眼光标。^② 夏锦文、吕永刚分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原创性贡献。他们认为，小康社会是中国现代化特定阶段的睿智表达，全面小康是小康构想的延续与升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在为一种新型现代化开辟道路，在世界现代化史上具有原创价值，在模式层面是跳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在思想层面是形成具有开创性的小康理论谱系，在文明层面是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制度层面是在改革深化中筑牢全面小康的制度之基，在路径层面是在“时空压缩”中形成“新四化”路径，在策略层面是把握现代化节奏善用现代化辩证法，在价值层面是以共富导向超越资本逻辑的局限。^③

一些学者阐释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成因与优势。张占斌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了一系列思想、战略、政策、制度创新，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即党的全面领导、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集中

① 谢伏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

② 陈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意义和当代启示》，《红旗文稿》2020年第22期。

③ 夏锦文、吕永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原创性贡献研究》，《现代经济探讨》2020年第12期。

力量办大事、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带来的世界启示是，找到自身特色道路至关重要，执政党要长期不懈地致力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汲取人类文明成果，集中资源和力量扶贫脱贫，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① 郭广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发挥了根本性作用，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强大的动力支持和有力的制度保障，其中，制度改革始终坚持了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的统一、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统一、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的统一、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的改革逻辑，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为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国必须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完善与定型，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② 田鹏颖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撑和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根本领导制度以及效能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支撑和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依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后，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③

一些学者对全面小康社会的原理、规律进行了探讨。钱智勇和刘思远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跨越了《资本论》中资本主义财富生产方式的异化，实现了人民的劳动自由和劳动权利；跨越了《资本论》中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目的的异化，实现了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生产目的；跨越了《资本论》中资本主义财富价值分配方式的异化，实现了人民的共同富裕。^④ 孙贺以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交互作用为视角，探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演进规律，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经济发展为物质支撑，以民生改善为目标抓手和目的导向，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共同构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内容；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交互循环，协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按照预设目标有序推进，成为贯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演进的一条主线。其中，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抓民生也是抓发展构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需动力。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交互作用构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推进机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经济发展与民生

① 张占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优势与世界意义》，《前线》2020年第12期。

② 郭广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之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4期。

③ 田鹏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制度”解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0年第3期。

④ 钱智勇、刘思远：《跨越〈资本论〉中财富异化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第9期。

改善循环进阶过程中渐进达成。^① 李曦辉和黄基鑫则探讨了区域协调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系，认为二者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两种发展视角。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同时期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着我国小康概念从无到有、小康水平从低到高、小康社会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反过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促进着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作为目标指引和政策评价，促进经济总量及基本格局向区域协调发展转变，推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及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②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系列关键问题探讨及展望

徐阳认为，全面崛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代背景对中部崛起的内在要求。中部崛起应以经济发展、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平衡发展以及政府内部管理等领域“全面崛起”作为现实目标。他基于对中部地区6省81个地市级政府的绩效考察，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中部地区“全面崛起”进行实证检验。综合绩效评估和分职能领域绩效评估结果表明，中部地区政府综合绩效整体水平相比其他地区有所下滑，但在市场监管等分职能领域颇具亮点。无论是综合绩效还是分职能领域绩效，中部地区都尚未实现“全面”的“崛起”。社会管理是中部地区地市级政府综合绩效下滑的关键原因。中部崛起是一项需要长期规划稳步推进的重大工程，加强社会管理推动“适度”的单极发展，将成为中部地区实现“全面崛起”的重要抓手。^③

民生保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考量。韩喜平、柳笛提出，丰衣足食是中国老百姓最朴素的追求和愿望，民生改善是衡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重要指标，因此必须通过补齐民生短板、打赢脱贫攻坚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深化体制改革、完善民生制度等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民生改善。^④ 方世南研究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野下生态健康与人民健康的同构关系。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众多生态灾难的频繁发生，突出了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生态健康与人民健康相互依存和协调并进的地位，彰显了推进生态健康与人民健康同构关系的价值。人民健康作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主体内容和核心价值目标，必须以人与自然达到和谐共生共存共荣状态的生态健

^① 孙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演进规律——以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交互作用为分析视角》，《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7期。

^② Xihui Li, Jixin Huang,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Regional Coordination”, *China Economist*, vol. 15, no. 1, Jan/Feb 2020, pp. 72–107.

^③ 徐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中部地区“全面崛起”的实证检验——基于中部地区6省81个地市级政府的绩效考察》，《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④ 韩喜平、柳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0年第3期。

康作为前提条件和坚实基础。把握全面小康视野下生态健康与人民健康的同构关系，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以及走向健康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①

互联网扶贫、物流建设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乡村发展与农民富裕。陈联俊、程京武提出，互联网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扶贫事业有巨大价值，表现在为贫困地区带来发展经济的可能性，活跃了贫困群众的精神思维，延伸了社会交往关系，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为此，应实现互联网扶贫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技术治理普及网络技术应用、协调网络技术机制、满足网络技术权益、强化网络技术保障；通过制度治理明确网络扶贫多赢理念、改善政府网络扶贫效能、发挥企业网络扶贫价值、激发个体网络扶贫动力；通过文化治理突出网络文化引领、发掘网络文化需求、规制网络文化冲突、优化网络文化生态，充分体现互联网扶贫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作用。^②王静论证了中国特色物流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系，提出物流与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质量和成效。他基于2015—2018年中国物流与经济社会的年度数据，运用SVAR模型、脉冲响应方法进行物流贡献度与政策影响度的经验事实分析，对经济下行压力与疫情冲击力的显性问题进行研判，主张建立中国特色物流发展的“一朵云、二条链、三联动”创新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对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程度进行了综合评价，剖析了在农村环境、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和政治民主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及弱项，以及后小康时期实现乡村振兴需要持续加强的关键性领域，进而围绕紧抓一个核心、补齐两大短板、强化三个弱项提出了农村决战决胜全面小康的基本策略，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路径选择。^③唐忠、钟晓萍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表现为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有差距，地区之间发展还不平衡。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更加注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节力度，持续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和区

① 方世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野下生态健康与人民健康同构关系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4期。

② 陈联俊、程京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阈中的互联网扶贫》，《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后小康时期乡村振兴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20年第9期。

域差距，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努力奋斗。^①孔祥智认为，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他从三个方面提出补齐小康短板的政策建议：要强化“融合”理念，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全面供给；从投入、人才、改革等方面补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短板”；把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放在公共服务的突出位置。^②

七、总结与展望

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克服疫情严重冲击，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交出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彰显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这是人类发展减贫与福祉创造的里程碑，也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标志性成果。

2020年政治经济学界聚焦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与全面小康这一重大现实主题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 就疫情突发对脱贫进程的不利影响开展应急研究，围绕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一系列学术成果与对策建议。2. 对中国特色的精准扶贫方略、路径、政策及其成效进行了理论与实证探讨，丰富了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研究。3. 阐释了脱贫攻坚的历史意义、时代价值和国际贡献。4. 深入分析了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5. 研判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贫困性质的变化与贫困治理转型的方向，讨论了相对贫困度量与解决。6. 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以及补短板、强弱项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学术探讨。

脱贫摘帽、全面小康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巩固提升脱贫奔康成果，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任重道远。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随着全面小康建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进入2021年，政治经济学界应肩负起新的研究使命，瞄准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亟需，在理论和政策创新上做出更大学术贡献。

^① 唐忠、钟晓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发展成就与主要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② 孔祥智：《全面小康视域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冯鹏程 杨虎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分配制度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系中，强调增加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将土地和数据增列为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强调建立健全由市场评价生产要素的贡献以及按生产要素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并首次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大力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等新观点。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分配制度的阐述，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2020年，国内经济学界围绕着不同因素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分配制度创新如何解决我国的社会现实问题、如何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问题等开展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对于理解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分配制度的理论创新，而且对于研判“十四五”时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趋势，以及调整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重点方向与任务，具有重要意义。在众多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中，本文按土地制度、城乡和地区差异、金融发展和普惠金融以及技术进步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了分类梳理和评述。

一、土地制度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一）土地改革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农地产权制度作为我国农村最主要的资源配置制度，经历了从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制度演

* 冯鹏程，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杨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

变历程。改革开放之初，为解决温饱问题，中国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激发了农村发展活力，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为顺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和农户保留土地承包权、转让土地经营权的意愿，党中央着眼于全局，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改革，提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理论，并将“三权分置”制度确定为我国土地改革的基本方向。^①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刘焕鑫指出，“十三五”期间，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基本完成，6亿多农民的集体成员身份得到确认。^② 丰雷等人的研究肯定了“三权分置”改革的成效：产权明晰促进了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土地改革红利用于纯公共利益的征地比例有所提高，为村集体和农民带来了巨大收益。^③

农村土地改革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引致和遗留了诸多问题：第一，农地产权制度的演变引致农地资源的部分转移以及农村劳动力的流失；^④ 第二，改革中仍存在土地测量不准确、不到位和征地环节不合规等程序问题，以及征地补偿、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等问题；^⑤ 第三，目前我国农村并未构建起清晰的农地产权结构，因此农地产权改革能否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还是未知数；^⑥ 第四，“三权分置”制度设计虽规避了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市场、产权失灵问题，但又引发新的市场、产权失灵问题。^⑦

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就必须继续深化农村土地改革。第一，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是消除农村贫困、提高农民收入的基本制度保障，必须坚持和完善

① 李涛、张鹏：《农地产权、要素配置与农户收入增长》，《经济问题探索》2020年第12期。

② 农业农村部：《国新办举行“十三五”时期农业农村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网站，2020年10月27日，http://www.moa.gov.cn/hd/zfbt_news/sswsqnyncfzqk/。

③ 丰雷、胡依洁、蒋妍、李怡忻：《中国农村土地转让权改革的深化与突破——基于2018年“千人百村”调查的分析和建议》，《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12期。

④ 李涛、张鹏：《农地产权、要素配置与农户收入增长》，《经济问题探索》2020年第12期。

⑤ 丰雷、胡依洁、蒋妍、李怡忻：《中国农村土地转让权改革的深化与突破——基于2018年“千人百村”调查的分析和建议》，《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12期。

⑥ 李涛、张鹏：《农地产权、要素配置与农户收入增长》，《经济问题探索》2020年第12期。

⑦ 各级政府输入村庄的各类惠农、利农、强农项目资源，几乎都是为村集体和市场主体“量身定制”，而把单个小农排斥在外，这样就“侵蚀”和弱化了普通农户的承包权能实现处境。土地流转尤其是长期化流转场域中，土地的实际控制权主要由所有权主体和经营权主体掌控，他们在土地经营中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详见：朱冬亮：《农民与土地渐行渐远——土地流转与“三权分置”制度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好这一制度。第二，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同时，建立健全防止农民返贫的社会保障机制，巩固反贫成果。第三，积极落实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依法保障土地各项权利所有者的合法权益，重点保障农民财产性收入。^{①②} 第四，建立和完善各类产权机构，为农地流转和乡村振兴提供制度保障。^③ 第五，引入现代市场运行机制，吸纳各类生产要素投入。^④

（二）土地改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作为联结城乡的重要纽带和关键要素，土地的市场化改革无疑会影响到农民增收和城乡收入分配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着眼点也从农村内部扩展到城乡关系层面，推动城乡融合和协调发展，调整城乡收入分配结构。

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土地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权关系，形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产出和农业剩余；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则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对农民增收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积极作用；数据显示，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57下降至1984年的1.82。接下来的城市改革则通过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成为最先也是享受开放成果最多、最集中的地区，先富了起来；相比之下，农村地区整体发展相对落后，农业回报率相对较低，并缺少对外开放的政策支持，导致农民收入难以实现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协同增长，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有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84年的1.82上升到2002年的2.89。^⑤

2002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党中央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和城乡融合。党的十六大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部署，意味着农村经济发展被纳入社会经济整体发展中来；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并把统筹城乡发展放在首

① 朱方明、刘丸源：《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保障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11期。

② 伍旭中、杨鑫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兼论“三权分置”改革的去路》，《政治经济学报》2020年第2期。

③ 简新华、王懂礼：《农地流转、农业规模经营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

④ 朱冬亮：《农民与土地渐行渐远——土地流转与“三权分置”制度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⑤ 何爱平、李清华：《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历史变迁与未来展望》，《经济纵横》2019年第10期。

位；与此同时，城乡二元结构持续解冻，第二、三产业占比稳步增加，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发挥了积极作用。十八大提出，加快完善城乡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均衡配置。2020年，《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积极推进土地改革，优化资源配置。^① 相关政策的相继出台，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城乡收入差距显著缩小。2003—2019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2%，比城镇居民家庭高0.3个百分点；特别是，2010—2019年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达到8.6%，高于城镇居民家庭1.8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2年的2.89缩小到2019年的2.64。^②

目前，我国土地制度依旧存在一系列突出问题：第一，土地所有制处于“二元”分离状态，仍然没能实现“权利随人走”的制度安排，农村土地流转基本停滞，从而对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在空间的优化配置构成制约；第二，市场权力不对等、城市建设用地价格和房价的持续上涨，导致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均衡的现象较为普遍；^③ 第三，巧立名目违规占地，从事高档会所等非农建设、通过非法集资谋求暴利的情况依旧存在。^④

为此，要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处理好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必须处理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关系，加快构建适合国情并兼顾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土地增收分配体系，建立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在国家与集体之间、集体内部的分配制度，因地制宜设置合理增值收益比例；^⑤ 第二，必须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通过转移支付和再分配等手段提高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民收入水平，调节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如征收房产税等；^⑥ 第三，必须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第四，必须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⑦ 构建以工补农、以

①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国政府网，2020年4月9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0-04/09/content_5500622.htm。

② 农业农村部：《国新办举行“十三五”时期农业农村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网站，2020年10月27日，http://www.moa.gov.cn/hd/zfbt_news/sswsqnyncfzqk/。

③ 许坤、卢倩倩、许光建：《土地财政、房地产价格与财产性收入差距》，《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④ 张广辉、陈鑫泓：《乡村振兴视角下城乡要素流动困境与突破》，《经济体制改革》2020年第3期。

⑤ 刘晓萍：《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谋求共赢》，《经济日报》2020年9月7日。

⑥ 梁美健、马亚琨：《我国房产税影响房价及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会计之友》2020年第9期。

⑦ 朱方明、刘丸源：《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保障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11期。

城带乡、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的新型城乡关系；第五，打通城乡要素流动特别是城市要素回流农村的通道，引导城市人才、技术、产业、资本等要素向农村转移，全面提升城乡各类要素尤其是农村劳动生产率及劳动报酬。

二、城乡和区域差距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一）城乡二元经济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效仿苏联推行计件工资制度，并将其作为统一全国工资制度的重要步骤之一，提高了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①但也一定程度上导致工人的碎片化、原子化和个人主义，使得共同利益在现实中难以形成。改革开放之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就是证明。^②城乡二元制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③1978—2008年持续长达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离不开城乡二元制度的贡献；^④但是，城乡二元制度下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农民不得不将农产品、土地等生产要素以“剪刀差”的形式供给城市，^⑤也就决定了农民收入的停滞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农村贫困程度得到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变化足以说明这一点：在农民非农化背景下，农民对经营性收入特别是农业经营性收入的依赖越来越小，而越来越依靠工资性收入。1983—2013年，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经营性收入占比从73.50%降至42.64%，工资性收入占比则从18.56%增至45.25%；2013—2019年，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从38.73%增至41.09%，经营净收入占比则从41.73%降到35.97%，工资净收入已成为农民人均可

① 林盼：《收入分配制度的实践差异——对中苏计划经济时期计件工资制的比较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20年第11期。

② 姬旭辉：《从“共同富裕”到“全面小康”——中国共产党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演进与实践历程》，《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9期。

③ 高帆：《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三重内涵及其政治经济学阐释》，《经济纵横》2020年第4期。

④ 黄祖辉、马彦丽：《再论以城市化带动乡村振兴》，《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9期。

⑤ 刘守英、颜嘉楠：《“摘帽”后的贫困问题与解决之策》，《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支配收入的首要来源。^① 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对城市和农村贫困变化的影响力度是不同的，其对农村贫困指数的降低作用更为显著，说明城市发展确实是减轻农村贫困的一个重要途径。但人口流动对农村贫困程度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因此，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实施非常必要且及时，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引导农民留在农村、建设农村、发展农业，有效提升了乡村价值、提高了农民收入。^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不断扩大，直至2008年后开始出现下降趋势。李实认为，这一下降趋势是由城乡间收入差距的缩小主导的，而城镇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持续扩大，即使在短期内收入差距缩小，也很难形成一个长期的下降趋势。^③ 虽然近年来农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在快速市场化经济发展浪潮中，城市居民收入水平依旧远高于农民。^④ 数据显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5年的11421.71元涨至2019年的16021.0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8843.85元涨至39250.84元。无论是从增速还是从增量看，两者差距依旧明显。与此同时，“穷人消费无力”和“富人低消费”的双向错位，导致社会消费需求严重不足，^⑤ 经济循环和发展受阻，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根本原因依旧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具体表现为：第一，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结构特征，不仅固化了农民工与城市户籍人口存在的权利差异，还阻滞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向非农产业的持续收敛，扩大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⑥ 第二，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缺少平等参与产业化、城市化的权利，城乡间要素双向流动通道准确地说城市要素流向乡村的通道被阻塞；^⑦ 第三，随着就业扩大、收入增长与生产率提高同步发生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缩小，劳动力市场的初次分配功能不足以解

① 高帆：《疫后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新命题与新趋向》，《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0期。

② 罗良清、平卫英：《中国贫困动态变化分解：1991—2015年》，《管理世界》2020年第2期。

③ 李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问题》，《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1期。

④ 张蓉：《城乡二元结构下居民收入变迁及其消费市场作用机理研究》，《商业经济研究》2020年第23期。

⑤ 高帆：《城乡二元结构转化视域下的中国减贫“奇迹”》，《学术月刊》2020年第9期。

⑥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0.6%，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4.38%。这就意味着依旧有16.22%的城镇常住人口仅仅是转变了职业而没有转变身份。详见：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年2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

⑦ 刘守英、颜嘉楠：《“摘帽”后的贫困问题与解决之策》，《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决好城乡收入分配问题，比较市场收入基尼系数和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可以发现，我国的再分配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第四，现有财政分权引起地方政府投资，带动了社会投资增加进而挤占了劳动收入，从而引起经济结构失衡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① 加上，在城乡收入差距和社会保障差距等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不管是在短期还是长期都会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深远影响，疫情期间，农民工就业和人均工资收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足以说明这一点。^②

为此，应扭转城乡二元结构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第一，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降低农民进城落户门槛，保障农民工获得更多普惠性的城市社会保障。^③ 第二，扭转城市偏向的公共政策，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是调控城乡收入差距和促进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条件。^④ 同时，应确立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制度，包括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减税降费、工资集体协商等制度，为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创造空间。^⑤ 第三，将持续减贫纳入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战略当中来，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增加乡村农民发展机会。^⑥ 继续完善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互联网+”助推城乡产业融合，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此外，应优化财政金融政策扶持体系，助推贫困地区主导产业实现市场化、规模化、可持续发展，实现产业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内生融合。^⑦ 第四，要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关键是要想方设法强化内生发展动力，突破农村发展能力不足的瓶颈。^⑧ 第五，促使地方政府由投资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努力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⑨ 第六，针对疫情造成的影响，应精准围堵可能导致疫情反弹的防疫漏

① 王文甫、王召卿、郭伶俐：《财政分权与经济结构失衡》，《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

② 叶兴庆、程郁、周群力、殷浩栋：《新冠肺炎疫情对2020年农业农村发展的影响评估与应对建议》，《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3期。

③ 高帆：《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三重内涵及其政治经济学阐释》，《经济纵横》2020年第4期。

④ 王一鸣：《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管理世界》2020年第12期。

⑤ 陈斌开、李银银：《再分配政策对农村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税费体制改革的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⑥ 刘守英、颜嘉楠：《“摘帽”后的贫困问题与解决之策》，《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⑦ 胡乐明：《坚持精准施策 全力脱贫攻坚》，《经济日报》2020年6月23日。

⑧ 郭晓鸣、王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相对贫困：特征、优势与作用机制》，《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2期。

⑨ 谢伏瞻、蔡昉、江小涓、李实、黄群慧：《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笔谈》，《经济研究》2020年第1期。

洞，瞄准疫情影响脱贫的关键渠道，识别因疫返贫、因疫致贫风险人群，并给予分类帮扶。^①

（二）地区差异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与内陆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进入 21 世纪，我国开始注意区域均衡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开始改善。^② 1999 年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快于东部，东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显著缩小。另外，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成为东西部差距收敛的推动力，也激活了西部自身的发展潜能。^③ 盖凯程、周永昇研究指出，我国以“区域政策统筹+市场空间外溢+区际利益共享”为框架的“反梯度、跨越式”涓滴机制，有效遏制了区域发展失衡问题；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05—2019 年间，东西部生产总值差距在过去十四年间下降了 24%；从地区居民收入来看，东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 2006 年开始持续 13 年下降，同样减少了近 24%。^④

东西部劳动收入差距虽有所缩小，但差距依旧明显。2020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31 个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20 年只有 9 个省份超过全国平均线（32 189 元），中西部无一省份入列。虽然 31 个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2020 年全面跨过 2 万元大关，但其中“2 万+”梯队有 20 名成员；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看，以 43 834 元的全国城镇居民收入平均水平作参照，仅有 7 个省份达到这一水平；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看，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7 131 元，仅有 9 个省份达到这一水平。^⑤

地区差距，除了受到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差异的影响外，主要还受到人力资本差异和公共服务水平差异的影响。因此，欲进一步优化东西部收入分配格局，就要充分发挥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攻坚作用，巩固扶贫取得的成果，深化有效帮扶机制，激发低

^① 贺立龙：《中国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制度分析——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 年第 5 期。

^② 李怡乐：《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财经科学》2020 年第 10 期。

^③ 薛志伟：《适时推动东西部地区转向现代化协作》，《经济日报》2020 年 12 月 25 日。

^④ 盖凯程、周永昇：《所有制、涓滴效应与共享发展：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 年第 6 期。

^⑤ 《2020 年居民收入榜来了，哪些地区城乡差距更大？》，新浪财经，2021 年 1 月 25 日，<http://finance.sina.com.cn/tech/2021-01-25/doc-ikftssap0566134.shtml>。

收入人群发展的内生动力，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① 产业上，加强产业协作，注重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西部产业的现代化；民生上，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教育等方面的帮扶力度，实现公共服务现代化；就业上，持续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定期开展技能培训，推动人力资源现代化。^②

同时，要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区域合作互助等机制，更好地促进东西部地区共同发展。具体应做好以下几点：第一，以西部地区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积极推动东西部地区企业、科研院校之间开展科技资源供需对接；第二，共同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园区，把东西部地区科技合作作为吸引创新资源和人才、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建立东西部地区科技合作长效机制；^③ 第三，各地区应认清我国目前经济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在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促进产业结构均衡的同时，充分发挥地域优势，推动特色产业繁荣，提高经济共享程度。^④

三、金融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金融可以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也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的间接机制和提供金融服务的直接机制解决贫困问题。2020年，学界关于金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研究，主要围绕金融发展和普惠金融展开。

（一）金融发展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金融发展是资金要素配置的一个重要渠道，对资源和财富的分配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经济发展初期，对微观企业或个体来说，金融市场充斥着诸如准入门槛高、交易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导致只有有限的高收入群体才能享受金融服务带来的收益，这无疑只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随着金融市场日臻完善，金融服务能力不断提升、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门槛不断降低，改善了收入分配格局。

现阶段，受新经济的冲击、经济金融化趋势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金融企业盈利能

① 王双：《充分发挥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作用》，《经济日报》2020年6月5日。

② 薛志伟：《适时推动东西部地区转向现代化协作》，《经济日报》2020年12月25日。

③ 拓兆兵：《下好东西部地区协同创新这盘棋》，《经济日报》2020年12月28日。

④ 程翔、杨小娟、张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科技金融政策的协调度研究》，《中国软科学》2020年第1期。

力与经营规模“双升”。^① 从而对国民收入分配可能产生三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资金在金融部门的空转导致经济虚假繁荣，不仅推高了资金使用成本，还进一步挤压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导致实体经济面临更高的融资成本和经营风险，从而影响居民就业和收入；同时，金融机构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快、过高增长，进一步压缩国家通过再分配手段调节收入分配格局的空间。二是大量游离出来的资本过度流入房地产、股市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预期，压缩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空间。三是影响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不利于收入分配格局优化调整，更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②

金融发展并非只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准确地说，金融发展对收入贫困存在非线性的倒 U 型影响，也就是说只有金融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会起到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而且分地区来看，在包含国家级贫困县的省份，金融发展对收入贫困影响的倒 U 型趋势更为明显。^③ 原因在于，金融发展通过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两个渠道改善了收入贫困，而金融资源向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非贫困地区和非农部门的集聚可能“挤出”贫困人口的资金供给，不利于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④

因此，要切实利用金融发展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第一，必须加大金融机构产品创新力度，提升金融服务水平，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和实体企业融资成本；第二，加强金融监管力度，防范金融风险，优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环境；第三，加大金融供给，降低金融服务的边际成本，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⑤ 第四，降低金融准入门槛，将非正规金融组织纳入监管范围，促使非正规金融规范化发展；^⑥ 第五，加大金融科技创新，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如定向降准等），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推动资金脱虚向实，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⑦

^① 金融机构部门收入占比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从 2000 年的 0.9% 上升到 2017 年的 12.4%，累计上升 11.5 个百分点。详见：杨巨、方恬：《中国资本收入主体分配格局的演变与原因研究》，《教学与研究》2020 年第 6 期。

^② 姜雪：《“十四五”时期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20 年第 12 期。

^③ 张应良、徐亚东：《金融发展、劳动收入分配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改革》2020 年第 11 期。

^④ 王爱萍、胡海峰、张昭：《金融发展对收入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再检验——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农业技术经济》2020 年第 3 期。

^⑤ 姜雪：《“十四五”时期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20 年第 12 期。

^⑥ 张应良、徐亚东：《金融发展、劳动收入分配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改革》2020 年第 11 期。

^⑦ 薛莹、胡坚：《金融科技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实践基础与路径选择》，《改革》2020 年第 3 期。

（二）普惠金融发展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金融排斥是低收入群体增收的主要障碍。金融排斥会扩大收入水平的地理差异；在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排斥现象尤其严重，农村地区也由此成为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最为集中的地区，导致城乡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明显。相比之下，普惠金融是我国解决收入贫困问题、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举措：普惠金融主要关注金融的包容性，旨在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人群（特别是贫困、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①

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体现在两个层面。直接层面，金融机构直接对中小微企业、弱势群体、农民提供信贷，进行资源再分配。间接层面，一是利用普惠金融的“涓滴效应”使贫困人群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同时带动周边地区减贫；二是通过向以解决贫困为目标的产业项目提供信贷支持，进行产业扶贫。^② 有研究证明，普惠金融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城乡收入差距，还对减缓农户贫困具有明显效果，^③ 并能够显著降低我国家庭贫困发生率，尤其是对农村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来说；普惠金融对于未得到政府扶贫支持的贫困家庭来说作用更大，并可作为共同保险机制的补充，帮助家庭应对社区协同性冲击导致的脆弱性。^④

普惠金融与新技术的融合发展也增强了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比如，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得以增强，且对周边城市也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再比如，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融合，为经济落后地区实现普惠金融赶超提供可能，并为低收入者、农民等弱势群体获得覆盖范围更广、使用深度更大的金融服务奠定基础，有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⑤ 与此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还有利于满足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缩小居民收入差距。^⑥

但是，由于地缘特征、资源配置效率、贫困人群资源利用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普惠金融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不同。石京民等人测算“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状况

① 余春苗、任常青：《金融包容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农村经济》2020年第3期。

② 傅巧灵、杨泽云、武建辉：《互联网环境下京津冀地区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研究》，《中国软科学》2020年第1期。

③ 李建军、彭俞超、马思超：《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发展：多维度内涵与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20年第4期。

④ 尹志超、张栋浩：《金融普惠、家庭贫困及脆弱性》，《经济学》（季刊）2020年第5期。

⑤ 李牧辰、封思贤：《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文献的分析》，《当代经济管理》2020年第10期。

⑥ 赵丙奇：《中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1期。

得出：第一，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处于低水平、缓增长的成长阶段，整体呈现出“金字塔”形分布，极核增长与低水平均衡并存；第二，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梯度分布格局，且东西差距显著高于南北差距；^① 第三，普惠金融更有利于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和优化西部地区收入分配结构。^②

我国普惠金融整体发展呈现良好态势，但在市场主体、产品与服务以及外部环境建设等方面仍存在改进空间。第一，对普惠金融存在概念界定、关注要点和推进方式等多方面的误区，需继续纠偏和优化金融包容的定位和目标。^③ 第二，对数字技术的过度依赖，形成“数字鸿沟”，导致一些特殊群体（如老年人等）无法享受普惠金融带来的实惠，需打破数据垄断，强化基础设施和普惠金融制度建设，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④ 第三，还存在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号做着“不普惠”的事的情况，^⑤ 需在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强化金融监管。第四，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要考虑地区差异、因地制宜，从而更好地兼顾公平与效率，最终建立起实质重于形式的包容性金融发展长效机制，逐步实现让每个人都享受到普惠金融带来的好处。

四、技术进步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一）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直接关系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偏向性反映并决定了各要素对应的边际产出，以及要素需求和要素配置的不同比例变化，相对应的要素所有者报酬也就存在差异性。^⑥ 以自动化为例，一方面，自动化水平的提

① 石京民、王万君、李健：《基于深度学习的“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经济问题探索》2020年第12期。

② 李建军、彭俞超、马思超：《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发展：多维度内涵与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20年第4期。

③ 李政、周科：《国内大循环视角下普惠金融的发展误区和政策纠偏》，《人文杂志》2020年第12期。

④ 孙少岩、张景星：《普惠金融视角下农户融资方式选择特征研究——基于“粮食直补资金”担保贷款的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10期。

⑤ 陆敏：《不能让普惠金融变了味》，《经济日报》2020年11月30日。

⑥ 张兴祥、范明宗：《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与要素的收入分配——基于CES生产函数的建模与理论解释》，《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高会增加对资本的需求；另一方面，自动化水平与均衡资本利率正相关。相比之下，对于劳动者而言，因为自动化对就业尤其对低技能劳动就业的不断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就业竞争的加剧，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① 陈勇、柏喆的研究就证明了这一结论：技术进步偏向通过不同程度地作用于各省份资本与劳动的相对边际产出，影响要素收入份额变动。^②

中国的技术进步整体上呈现资本偏向性。匡国静、王少国对中国281个地级市进行研究得出结论：中国城市技术进步总体上偏向于资本，同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从而促进东部和中部城市结构红利的释放，但很难对西部地区产生积极作用。^③ 不同形式的技术进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性：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趋于提高资本收入份额，模仿创新则趋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④ 除此之外，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与技术进步偏向正相关，并且发展早期阶段的劳动力市场化还趋向于强化这种正相关关系，因为二元经济结构会弱化价格效应。^⑤

近年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进步导致经济的数字化、智能化，使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地位相对下降的同时，^⑥ 进一步深化了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性。其中，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对资本—劳动收入差距的影响备受关注。从作用机理上看，一方面，人工智能的资本偏向性通过用资本替代劳动，降低劳动收入份额，扩大资本与劳动收入差距；^⑦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影响全局的通用目的技术，人工智能的应用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催生“赢者通吃”的市场和“超级明星企业”，从而通过不断调整劳动力在异质性企业之间的再分配，深化资本与劳动收入差距。除此之外，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不仅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参与到生产过程中，^⑧ 还以资本的形式参与收入分配。因此，短期内人工智能的偏向性会

① 郭继强、蒋娇燕、林平：《技术进步类型与要素收入份额变化研究的理论梳理》，《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6期。

② 陈勇、柏喆：《技术进步偏向、产业结构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上海经济研究》2020年第6期。

③ 孙学涛、张广胜：《技术进步偏向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结构红利的视角》，《管理科学》2020年第6期。

④ 匡国静、王少国：《技术进步偏向及其形式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审计与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

⑤ 蔡晓陈、赖娅莉：《二元经济结构与技术进步偏向》，《财经科学》2020年第7期。

⑥ 姜雪：《“十四五”时期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20年第12期。

⑦ 张刚、孙婉璐：《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一个文献综述》，《管理现代化》2020年第1期。

⑧ 李政、周希慎：《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1期。

使资本特别是数字资本优先受益。^{①②③}

因此,为应对和化解新技术对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冲击,首先,要重点关注技术进步偏向性引发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充分发挥技术进步向劳动偏向的趋势,积极引导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朝人一机协作、就业扩张和收入平等方向发展;^{④⑤}其次,政府应健全就业培训和失业保障制度,提高就业效率以及劳动者质量;^⑥最后,应尽快完善新的生产要素如技术、数据等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以促进技术进步朝着惠及大多数劳动者的方向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⑦⑧}

(二) 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性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研究发现,技术进步趋向于提高高技能劳动相对生产率,增加高技能劳动需求,提高技能溢价,并称此类技术进步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国内学者也研究并证明了我国技术进步同样存在技能偏向性。

近年来,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进步表现出的技能偏向性,对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因为新技术倾向于取代那些常规性的、可编码的工作,而更青睐于难以编码的非常规性劳动,并导致就业极化和技能溢价的提高,从而扩大了技能异质性劳动之间的收入差距。雷钦礼、李粤麟的研究证明,1991—2016年间全国技术进步整体偏向于技能,并将原因归结于两点:一是资本—技能互补效应引导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偏向于技能,二是资本深化通过资本—技能互补效应间接引导技术进步偏向于技能,^⑨从而导致就业结构的两极分化和收入差距扩大。^⑩王林辉、胡晟明、董直庆结合中国2001—2016年全国及省级层面数据,研究人

① 朱琪、刘红英:《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前沿进展与综述》,《中国人口科学》2020年第2期。

② 惠炜、姜伟:《人工智能、劳动力就业与收入分配:回顾与展望》,《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③ 杨伟国、邱子童:《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劳动者发展机制与政策变革》,《中国人口科学》2020年第5期。

④ 王林辉、胡晟明、董直庆:《人工智能技术会诱致劳动收入不平等吗——模型推演与分类评估》,《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4期。

⑤ 杨飞、范从来:《产业智能化是否有利于中国益贫式发展?》,《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

⑥ 陈勇、柏喆:《技术进步偏向、产业结构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上海经济研究》2020年第6期。

⑦ 匡国静、王少国:《技术进步偏向及其形式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审计与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

⑧ 李政、周希慎:《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1期。

⑨ 雷钦礼、李粤麟:《资本技能互补与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决定》,《统计研究》2020年第3期。

⑩ 李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问题》,《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1期。

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人工智能技术对不同技术部门生产率影响的非对称性，导致高、低技术部门劳动收入差距年均扩大0.75%；第二，人工智能倾向于通过替代低技能劳动、增加高技能劳动需求的方式，扩大高、低技能劳动收入分配差距。^①

新技术对劳动收入分配也存在积极影响。比如，产业智能化对我国低技能劳动具有显著的益贫效应，^②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人工智能能够通过将更多的任务“拆分”和“重构”，塑造一种灵活的工作组织和流动性强的劳动就业模式，增加了女性就业与收入，从而缩小性别收入差距。^③再比如，作为数字经济的一部分，互联网贸易凭借其低成本、高效率、客户量大等优势，成为实施精准扶贫、加快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④单德明等人就证实了互联网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具有显著的阻滞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对低学历、中年、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尤为突出。^⑤

虽说新技术推动了零工经济的繁荣，对低技能劳动、女性和贫困人口增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零工经济越繁荣，就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临时工、自由职业者，他们不停转换自己的职业角色，每周甚至每天的收入和工作安排都不同。因此，短期来看，收入的不稳定和社会保障的缺乏，^⑥显然只会降低此类人群抵御风险的能力，尤其是在疫情的笼罩下，有些人的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而且，长期来看，经济中不断调整的职业结构，显然只会朝向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从而助长收入不均趋势。刘欢的研究就指出，工业智能化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⑦

因此，要调节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性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第一，必须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和教育制度改革。历次技术变革导致的结构性失业，原因在于：其一，将劳动力从现有的工作和任务重新分配到新的工作和任务很困难；其二，对新的劳动

① 王林辉、胡晟明、董直庆：《人工智能技术会诱致劳动收入不平等吗——模型推演与分类评估》，《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4期。

② 杨飞、范从来：《产业智能化是否有利于中国益贫式发展？》，《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

③ 朱琪、刘红英：《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前沿进展与综述》，《中国人口科学》2020年第2期。

④ 陈联俊、程京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阈中的互联网扶贫》，《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

⑤ 单德朋、张永奇、马梦迪：《互联网使用能否改善收入分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新疆财经》2020年第6期。

⑥ 肖斌、李旭娇：《劳动形态对工资形态的影响及其对零工经济剥削研究的价值——基于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文本的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

⑦ 刘欢：《工业智能化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来自农业转移劳动力就业视角的解释》，《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5期。

需求的耗时搜索和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更重要的是，新任务需要新的技能，特别是当教育没有跟上新技能的需求时，技能和技术之间的不匹配必然会使调整过程复杂化；更何况，这种不匹配还会阻碍就业和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知识随着技术的进步而积累，那么连续几代的劳动者可能会面临越来越重的教育负担，因此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教育体制改革（如提供免费公共教育），减轻劳动者再教育负担，以满足新的职业需求、丰富劳动者技能和增加再就业机会，才可能缩小劳动收入差距。^① 第二，制定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和收入保障制度。要解决技术进步带来的工资差距的扩大以及资本与劳动间收入的不平等问题，政府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和收入保障机制，从而提高低技能劳动者和弱势就业群体抵御风险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三，通过技术治理普及网络技术应用、协调网络技术机制、强化网络技术保障，实现互联网扶贫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制度治理明确技术扶贫多赢理念、改善政府技术扶贫效能。^②

五、结语与展望

收入分配问题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界长期以来非常重视和关注的问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收入分配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对于诠释中国道路、创新中国经济理论更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020年，学者们紧密结合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立足中国现实，从多方面探讨了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因素，对中国收入分配的现存问题及其成因、政策措施评估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些研究对于评估现有政策的作用和效果、理解不同政策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优化、补充政策及调整政策着力点以发挥政策的总体功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到二〇三五年，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等。就收入分配问

^① 王林辉、胡晟明、董直庆：《人工智能技术会诱致劳动收入不平等吗——模型推演与分类评估》，《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4期。

^② 陈联俊、程京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阈中的互联网扶贫》，《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

题，明确提出“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等”，继续秉承了长期以来的“提低、扩中、调高、除非”的收入分配调整原则。从以往的实施成效看，“提低、扩中、调高、除非”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特别在“提低”方面，减贫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方面也有不小的进展；但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依然很大，财产分配差距变得越来越大，且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而过大的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不利于经济增长，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高质量发展会带来一定的挑战。因此，缩小收入差距，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一方面必须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把构建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政策体系作为重中之重任务，通过市场作用、政府职能、社会力量和技术手段的全面转型促进收入分配制度的现代化转型，真正构建起长久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体系，让全体人民真正合理分享到国家发展的成果，使之成为国家持续发展的新引擎；另一方面，对于既有政策的长短期效果、新兴技术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也需要给予长期、持久的关注。

国际经济格局新变化 与中国开放型经济体制构建研究

卢 江 郭采宜*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了重大影响。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不仅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疫情防控成效，而且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一枝独秀，成为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特别地，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加，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全球经济本来就因为个别国家肆意掀起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而遭受挫折，现在因为疫情防控需要，人员、资金、技术、产品的往来被割裂得更加严重，全球经济大衰退趋势更加明显。中国共产党科学研判国际经济形势，迅速作出新的战略安排，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行稳致远。

如何把握国际经济格局的新变化？一方面，逆全球化思潮依旧高涨，美国等国内主张经济科技脱钩的声音越来越强硬；另一方面，寻求合作、追求共赢仍然是世界的主潮流，多边化经济关系在曲折中发展。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能不能进行下去、又该怎么进行改革？经济开放会不会导致外部经济风险输入？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如何实现中国自身与外国共享发展？针对上述问题，政治经济学学者在2020年作了深入研究，我们对这些富有洞见的文献进行梳理，并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以期引发读者的进一步讨论，共同推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 卢江，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郭采宜，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

一、在冲突中寻求合作：国际经济格局新变化

世界经济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活动相互交织的结果，维护提升本方利益是开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主要宗旨，这就决定了世界经济必然具有竞争的特点。在理想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竞争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之一，是确保整个经济系统健康持续运行的润滑剂。世界经济关系除了竞争外还有合作的一面，对外经济关系表现为科技、产品、人员、资金等生产要素和最终产出的相互交换，互通有无本身就是合作的一种表现。另外，随着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各个国家和地区利用自身优势寻求占据全球产业竞争链条的有利位置，这在客观上又更加有力地推动了合作性的经济关系的形成——在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中，没有合作，想要更好更快地提升国家利益就无从谈起。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全球经济合作遭受严重挫折，疫情防控的客观需要按下了全球经济的暂停键，加之国外一些政客的疫情政治化操作，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冲突，国际经济格局巨变，人们对未来经济的信心和预期普遍低迷。

（一）疫情加剧逆经济全球化思潮

1. 疫情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极大推动了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往来，全球化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步发展的。回顾历史，总的来看，人类的经济活动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逐步融为一体，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①然而，在各国和地区经济加速往来的过程中，冲突性的一面也表现得愈加频繁和严重。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2008年金融危机、英国脱欧、美国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美贸易摩擦等事件，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前景。^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使得本就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全球主要经济体为应对疫情采取的禁航禁运措施导致全球产业链处于断

^① 李志军、李琦：《经济全球化大势不可逆转》，《前线》2020年第9期。

^② 徐康宁：《当代世界经济重大变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

裂边缘，这不仅给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借口，也为逆全球化思潮提供了温床。^① 有学者认为，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影响可以分为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短期来看，一是进口产品受阻影响国内产业链，尤其是美欧日韩疫情将影响中国中间产品进口；二是外部市场萎缩，出口受阻，主要是受疫情影响严重的美欧市场；三是全球产业链在疫情中和疫情后的重组变化。长期来看，首先，疫情破坏了产品内分工的协调机制，大面积的疫情冲击很有可能导致协调机制的崩溃；其次，疫情破坏了整个供应链中及时交货系统的存在基础，在这次疫情中，全球各地因断航、封城、封国而导致物流的严重堵塞，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关键医用物资、粮食等供给短缺现象；再次，疫情进一步动摇了一些国家的政府支持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基础和政治基础，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各国对经济全球化的怀疑态度和倾向，封闭取向、种族歧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兴起，加上这些年贸易摩擦和冲突不断，逆全球化浪潮选择民族孤立而非全球团结，动摇了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基础。^②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导致全球经济和贸易陷入泥沼，进一步为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提供了借口，全球经济贸易的下滑也滋养了逆全球化思潮。^③ 当前，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世界各国应该积极思考如何尽快恢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否则世界经济将很有可能陷入较长时间的停滞，经济纠纷、矛盾有不断激化的风险，从而引发全球经济格局的不稳定，这反过来也不利于各经济体的平稳有序发展。

2. 逆经济全球化问题

疫情冲击下的逆经济全球化思潮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思考，对逆经济全球化原因的研究日渐深入。有观点认为，归根到底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最开始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完全依循资本增殖的内在逻辑；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开展，资本逐利本性日益凸显。^④ 也有研究指出，单边主义加剧，经济失衡现象愈发严重，同时原先奉行自由贸易的国家由于国际竞争力下降，为了维护本国利益，重新回归贸易保护主义，对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国际流动设置各种制度性障碍。^⑤ 还有学者强调逆全球化行为的深层原因在于全球区域非均衡增长、发达国家实体经济衰落、金融泡沫化发展以及各

① 李杨、车丽波：《后疫情时期经济全球化变局与中国应对》，《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② 刘志彪、陈柳：《疫情冲击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重组与中国的应对策略》，《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③ 李杨、车丽波：《后疫情时期经济全球化变局与中国应对》，《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④ 刘海军、王峰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角色及其历史依据》，《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10期。

⑤ 舒展、郑丛璟：《西方国家“逆全球化”实质与合作共赢的新型全球化方案》，《理论与评论》2020年第2期。

阶层收入差距扩大；^①也有学者强调逆全球化本质上是国家能力长期不断下降以致无法适应全球化步伐的结果。当全球经济一体化带给各经济体的负面冲击大于收益时，由于发展机会开始变得不均等，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继续扩大，逆全球化思潮开始泛滥。^②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逆经济全球化现象，但都还没有触及本质原因。作为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程度的产物，逆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有其根本原因，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不断激化。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其统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总和还要大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冲破了各个封闭落后的民族和地区的藩篱，然而资本最大程度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导致西方国家一旦在全球经济中无利可图或者利益受到损害，就会想方设法地改变原来的经济秩序——哪怕是它们自身主导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因此，逆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弊端在世界市场的长期发展中积累爆发的必然表现。^③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已经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资本在积累过程中总是想方设法地谋求最简单粗暴获得收益方法，比如建立一套有利于自己的规则体系，一旦形势发生逆转，西方国家要么采用双重标准，要么直接否定原有的规则体系，重新提出适合自己的方案。从人类历史来看，经济全球化最早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它们在早期工业体系和实力强大的时候，要求包括落后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实行自由贸易，实则是为自己掠夺资源、抢占市场铺路；而当它们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或者垄断受到威胁时，它们便撕毁自由贸易的面纱，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从根本上来说，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弊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不适应社会现实而演化的结果。

3. 逆经济全球化不会改变人类历史发展趋势

回顾世界历史，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逆经济全球化一直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行，并且时常会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发展而泛滥，但是它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一方面，逆经济全球化行为只会使经济全球化的总体发展方向出现一定程度的偏离，不会从根本上真的逆转经济全球化大趋势。尽管来自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代表人物或政党领袖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和国际地位，不惜随意破坏原

① 袁志刚：《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深层矛盾和基本走势——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新视角》，《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7期。

② 胡鞍钢、谢宜泽：《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战——基于国家能力和经济全球化的双维视角》，《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③ 黄惠：《贸易摩擦、逆全球化发生的深层机理与应对方略——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20年第4期。

本的全球化秩序，公开反对贸易自由，并限制国际市场开放，^①但是只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全球化就是不可逆转的方向。^②另一方面，困扰西方发达国家的内部债务危机加重、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并不是全球化造成的，把这些问题简单归咎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解决问题，其本质在于发达国家国内经济结构的矛盾与国际经济结构的矛盾。^③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较大冲击，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破坏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相反，疫情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的全球现行经济秩序中的不足充分揭示了出来，给各个国家敲响了警钟，对在未来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提出了极其深刻的警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新形势下，重塑经济全球化秩序规则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问题。^④发展市场经济是保障经济全球化不会被逆转的重要途径，要看到市场经济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人类现代化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市场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的主流。从目前的理论研究和社会舆论来看，存在着两种比较偏激的认知：一种是市场万能论，这种观点要求政府不干预经济，认为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达到出清状态；另一种是市场罪恶论，这种观点强调市场经济中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破坏了社会秩序，致使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现象。我们认为，要看到很多问题不是市场本身造成的，如何看待并解决现存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去理解市场经济、怎么去驾驭市场经济。坚持市场经济道路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这点毋庸置疑。“逆全球化”只是全球化规则博弈中的插曲，不会颠覆国际市场秩序，更不会改变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和信心，从而也就不可能改变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二）大国经济博弈形势复杂多变

1. 技术脱钩风险加剧

科学技术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大国经济博弈的关键内容，随着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美国对华策略日益强硬。从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开始，中美科技领域的矛盾已开始显现，尤其是中美网络安全问题以及美国在部分高科技产业领域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问题，一度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敏感问题。^⑤特朗普执政后，

① 刘海军、王峰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角色及其历史依据》，《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10期。

② 金碚：《世界大变局下中国改革开放新格局》，《经济体制改革》2020年第5期。

③ 李志军、李琦：《经济全球化大势不可逆转》，《前线》2020年第9期。

④ 金碚：《世界大变局下中国改革开放新格局》，《经济体制改革》2020年第5期。

⑤ 李峥：《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深层动因及长期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期。

美国对我国的战略遏制日趋强化，单方面挑起经贸摩擦、科技脱钩、金融施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后，美国更是对华采取变本加厉的打压，从扩大出口限制，把更多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到针对“Tik Tok”和微信的禁令，再到实施“清洁网络”计划，竭力推动与中国脱钩，试图在中美之间“拉起吊桥”，进一步恶化了本就紧张的中美关系。^① 对于美国采取这些做法的战略意图和原因有多种解读，其中被广泛讨论的一种是美国寻求借助上述措施促使中美关系脱钩。^② 有学者指出，中美经济脱钩具体表现在科技、金融和经济增长三方面。科技方面，高科技脱钩是美国政府着力推进的重点领域，为了限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弯道超车”，美方尽可能切断与中国的科技产业联系，并对中方实施越来越严厉的高科技管制。金融方面，中美脱钩目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领域：一是两国货币联系程度降低；二是中美相互投资增量减少，依存度下降；三是货币政策传导性降低；四是美国对中国全球融资的重要性相对降低。经济增长方面，由于近年来的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强制切断大量与中方的产业联系，这客观上导致中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降低，中美各自经济增长情况对另一方的经济影响相对减少。^③ 也有学者从技术、数据、资金、市场、人才的自由流动五个方面探讨了中美经济脱钩。一是在技术方面，美国逐步收紧针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管制，意图对中国实施前沿科技封锁。二是在数据方面，美国试图将个人数据赋予“国家安全”内涵，阻止中国企业获取美国的数据。三是在资金方面，美国出台法案阻碍中国对美高科技领域投资和并购，切断中国资金进入硅谷的渠道。四是在市场方面，美国试图阻断中美科技产业链合作，迫使双方改变产业链相互依赖模式。五是在科技人才交流方面，美国加强对中国科研人员的执法调查和对中国留学生的盘查，严重破坏两国科技交流氛围。^④

2. 追求垄断利润是技术脱钩的根本原因

美国主动挑起对华脱钩具有深刻的内在原因和背景。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比如，傅梦孜和付宇从四个方面作了总结。第一，中美力量对比已然生变。中国经过数十年快速发展，国家实力日益壮大、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几乎逼近美西方心理承受“底线”。加之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以后，中西方国家在国际力量上“东升西降”的态势越来越凸显，不少美国学者认为脱钩能尽快遏制中国的快速发展势头。第二，

① 王一鸣：《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管理世界》2020年第12期。

② 李峥：《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深层动因及长期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期。

③ 宋国友：《中美经贸关系：再融合、强竞争、弱脱钩》，《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④ 李峥：《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深层动因及长期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期。

美国国内民粹思潮泛滥，也为中美“脱钩”论提供了土壤。第三，美西方冷战后的既有对华战略共识正在发生深刻改变。从政治上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宣示“四个自信”，公布至2050年的“两步走”国家复兴路线图，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与西方对中国改革开放后会逐步融入其主导的“民主体系”的预测截然不同。第四，美西方长期对中国发展和社会政治制度心存偏见，由于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历史经验、既得利益等方面因素，西方长期将中国看成现行国际秩序中的“异类”，内心并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快速崛起。^①又如，李文增强调了五点原因：第一，历史上的美国金融危机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第二，美国近些年的经济发展日益走下坡路；第三，美国错误地估计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第四，美国近些年惧怕中国的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第五，美国政客的某些邪恶心理。^②再如，王达和李征指出，美国加速对华“脱钩”的直接原因是特朗普政府急于转移国内矛盾和施政压力；而中国崛起与美国基于单极思维的国家安全战略发生内在冲突，是美国急于通过“脱钩”打压和遏制中国的根本原因。^③美国试图强行与中国“脱钩”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大部分文献都认为美国意在维持自身的国际垄断地位。金碚强调，美国“脱钩”试图在自由贸易规则的安排中持强要价，力争争取更有利的地位。^④季志业认为，美国不可能将中国割裂在全球化进程之外，只想把中国阻滞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既为美国提供廉价的生活日用品，又为美国的农产品和高端产品提供消费市场。特朗普政府的举措是要重构以美国为中心、确保美国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全球化规则。^⑤黄宁、盖新哲指出，美国希望利用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现有优势地位，阻止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未来优势地位，因此中美技术“脱钩”的实质是全球价值链位势之争。^⑥如果说一个国家在经济落后时期实行保护主义是为了阻止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外来冲击，那么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实行与他国“脱钩”又是何为呢？其实这一现象并不难解，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护本国的国际垄断地位。为了源源不断地获得垄断利润，垄断资本家想方设法地遏制其他国家发展，人为切断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和人员流，关税保护主义再次粉墨登场；这种保护手法并不高明，实质是贸易霸凌主义。人们已经看到，当前美国掀起

① 傅梦孜、付宇：《对当前中美“脱钩论”的观察与思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7期。

② 李文增：《对美中两国产业脱钩论之辨析》，《世界文化》2020年第7期。

③ 王达、李征：《全球疫情冲击背景下美国对华“脱钩”战略与应对》，《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5期。

④ 金碚：《世界大变局下中国改革开放新格局》，《经济体制改革》2020年第5期。

⑤ 季志业：《经济全球化的过去、趋势及应对》，《中国政协》2020年第18期。

⑥ 黄宁、盖新哲：《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美“技术脱钩”：成因、趋势及对策》，《科技中国》2020年第9期。

的贸易保护主义斗争越激烈，其追求国际垄断利润的真实目的暴露越彻底，就越必然遭到追求贸易公正的国家的一致反对。

3. 合作共赢是大国经济博弈的正确方面

虽然美国一再试图与中国“脱钩”，但包括美国不少学者都意识到，美国之举损人不利己，这是中美两国经济关系和全球经济发展客观趋势所决定的。有学者认为，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巨大存量以及在中美经济联系中获益的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共同决定了短时间内的快速“脱钩”、巨大规模的广泛“脱钩”会给中美两国带来严重冲击，其代价远大于“脱钩”可能带来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因此中美经贸“脱钩”正在以弱势缓慢发生。^①同时，全球产业链已经高度互嵌，出于利润最大化的商业原则考虑，美国政府的政治打压不可能使中美经济完全“脱钩”。^②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中心”则在其发表的报告《“半脱钩”：美国与中国经济竞争的新策略》中表示，由于中美全面“脱钩”的成本和代价太高，可采用“部分脱钩”的策略影响中国的发展。其实这些观点不但目光短浅而且有害，不符合历史大势。对于全球经济格局而言，全球化是常态，“脱钩”难度极大且会酿成严重后果。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全球已经形成复杂而又广泛的经济关系，全球产业链高度互嵌，贸易与投资相互交织，生产要素大规模跨境流动，形成了环环相扣、不可分割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③全球化背后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基于比较优势分工和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发展规律，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挂钩”、全球产业链的国际分工都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而产生的结果，^④也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⑤美方如果强制与中国“脱钩”，那么就是与全球化“脱钩”，与世界“脱钩”，与未来和机遇“脱钩”。^⑥对于主动挑起“脱钩”的美方而言，为之需要付出的成本难以估量。第一，“脱钩”本身难度巨大。作为制造业在经济全球化当中分布最广且最重要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实力已不容小觑，中国是当下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各国产业链已经很难绕开中国。^⑦同时，美国在“脱钩”一事上并不具有完全优势。第二，即使美国强制与中国“脱钩”成功，将损失的经济政治利益也是巨大的。美国经济与中国“挂钩”已逾40年，程度之深史

① 宋国友：《中美经贸关系：再融合、强竞争、弱脱钩》，《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② 郑宇：《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造造成中美脱钩》，《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③ 李志军、李琦：《经济全球化大势不可逆转》，《前线》2020年第9期。

④ 王栋、王怡旺：《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逆全球化？再全球化？》，《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⑤ 马小军：《选边为难，脱钩不易：地缘政经格局的深度蜕变》，《世界知识》2020年第17期。

⑥ 刁大明、王丽：《中美关系中的“脱钩”：概念、影响与前景》，《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7期。

⑦ 楼春豪：《美日印澳对华“经济脱钩”能成吗》，《世界知识》2020年第22期。

所未见，脱钩的结果必然是美国将彻底失去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最有生机活力的市场，而中国经贸却绝不会倒下。^① 最重要的是，美国国内对“脱钩”仍有不同的声音，并存在明确反对立场，^② “退群”“脱钩”并不符合大多数美国人的意愿。^③

综上所述，美国强行与中国“脱钩”的唯一结局就是损人不利己，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不会成功。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震荡，只有以负责任的态度加强合作，才是符合中美利益的唯一选择，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期盼。^④ 我们认为，大国经济博弈不仅直接改变相关涉事国利益，而且会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以零和博弈的旧思维看待世界发展只会一步步把自己孤立起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追求合作共赢才是大国经济博弈的正确方向，也才能给他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积极效应。

（三）多边经济关系在曲折中发展

1. 多边主义遭遇挑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兴起，使得多边机制功能失灵、治理失效，多边主义这一长期支撑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⑤ 尤其是美国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影响WTO的正常运行，并不断从世界各多边组织“退群”，对以WTO为核心的自由开放多边贸易体系形成巨大冲击，^⑥ 多边主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一方面，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步履维艰，难以真实地反映国际政治和经济权力此消彼长的变化；另一方面，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崛起极大动摇了多边治理体系的根基。^⑦ 以WTO为例。WTO的日渐式微表现在美国架空WTO、部分成员对WTO信心下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WTO协调作用缺失三个方面。^⑧ 周佰成、曹启指出，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机制和执行机制久受诟病，2019年更面临上诉机构瘫痪的风险；另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内部

① 李文增：《对美中两国产业脱钩论之辨析》，《世界文化》2020年第7期。

② 刁大明、王丽：《中美关系中的“脱钩”：概念、影响与前景》，《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7期。

③ 李仲周：《全球化和多边主义仍应是世界经济主旋律》，《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0年第8期。

④ 李志军、李琦：《经济全球化大势不可逆转》，《前线》2020年第9期。

⑤ 丁一凡：《国际对华脱钩能否行得通》，《现代国企研究》2020年第10期。

⑥ 姜跃春、张玉环：《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与多边贸易体系前景》，《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4期。

⑦ 刘洪钟、杨攻研：《国际秩序转型、全球化反思与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外部约束》，《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5期。

⑧ 解钢：《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逆全球化”：成因剖析与应对之策》，《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也存在各国间的利益分歧，导致关键议题难以达成一致。^①以 WTO 为主体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后，一直停滞不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收效甚微，国际经济治理亟需稳定的和可持续的多边机制予以支撑和维系。^②当前区域贸易协定不断升级，多边贸易体系日渐边缘化。多哈回合谈判受阻就是因为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农业、市场准入条件等方面存在根本分歧。如今区域贸易协定兴起，WTO 构筑的多边制度红利日渐丧失，必然进一步削弱多边贸易体系的内驱力。^③WTO 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弱化趋势或将持续下去：一方面，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失衡难题，美国特朗普政府借助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挑起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战，直接违背了 WTO 的互惠互利原则，正在摧毁 WTO 所捍卫的自由贸易根基，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另一方面，WTO 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瘫痪，虽然其协商和专家组仍然可以运行，但日益增长的贸易纠纷将持续为资源有限的 WTO 带来压力。^④多边贸易体制改革是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变革的反映，也是对多边贸易涉及的各利益相关方的重新协调，并进行制度规范与约束，从而实现多边贸易体制的良性、持续发展，本质上是对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分配协调。^⑤多边主义之所以遭受挑战实际上是因为这种发展格局威胁到了一些国家的利益，尤其是全球治理秩序中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们希望维持原有的治理法则，从而通过各种不公正不平等的条款来抢夺他国财富，而多边主义发展模式则可以绕过这些弊端，寻找到新的合作空间，最大限度地提升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2. 多边主义在治理秩序重塑中前进

多边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治理秩序不合理，难以应对全球性威胁、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许多国家兴起的严峻形势，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对自由贸易的批判和反思。丁一凡把“既不是完全以协调和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多边主义，也非完全放弃合作的单边主义”称为“竞争导向的务实多边主义”。他认为，竞争性多边主义在管控大国战略竞争和权力转移方面收到了明显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之间对相互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诉求，同时还反映了各国对国际规则和规范改革方向的各自立场，具有维持现状、保持沟通、避免冲突升级的功能。竞争性多边主义有助于相关国

-
- ① 周佰成、曹启：《世界贸易格局的变迁：从多边强式竞争到联盟弱式垄断》，《求是学刊》2020 年第 4 期。
② 丁一凡：《国际对华脱钩能否行得通》，《现代国企研究》2020 年第 10 期。
③ 吴雪：《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贸治理体系改革及我国的应对策略》，《宏观经济管理》2020 年第 6 期。
④ 姜跃春、张玉环：《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与多边贸易体系前景》，《太平洋学报》2020 年第 4 期。
⑤ 李计广、郑育礼：《多边贸易体制改革：背景、性质及中国方略》，《国际经济评论》2020 年第 5 期。

家推动现有的制度改革朝着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向转变，并通过机制替代或机制创建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外部支持和相对优势。^①展望未来，多边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区域经济合作仍然是各方经济合作的重要途径。郑宇认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集体意愿成为多边主义的核心动力来源，区域性组织迅速发展，成为多边主义的基本制度安排。^②赵英臣强调，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国际分工和经济循环受到威胁，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区域化、碎片化趋势愈加显现，故未来全球化将与区域化平行发展，互相促进。^③丁一凡认为，竞争性多边主义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是国际经贸领域的常态化现象，从理论看，多边秩序的形成依赖大国战略竞争相对和缓的环境。从现实看，美国以多边机制为平台进行地缘政治竞争的战略诉求将使国家间制度竞争和制衡的现象继续存在和加剧。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变迁仍会以规则为基础，但在短期内将以国际规则的谈判和重建为主要特征。^④

综上所述，2020年国际经济格局出现的最大和最新变化就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受此影响，全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都呈现下滑态势，而中国是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更加剧了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家整体实力崛起的忌惮。全球经济中对抗性的一面越来越明显，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加。与此同时，发展依然是世界的主要潮流，而在当前全球科学技术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关起门来搞建设实属天方夜谭，寻求与外国合作才是正道。可以看到，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全球经济总的来说会呈现在对抗中寻求合作的状态，但与之相伴的必然是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反思、调整与重塑。

二、全球经济面临大转型：国际经济秩序调整与重塑

在遭受经济危机冲击后，如何有效推动全球经济复苏成了学者们研究的焦点。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鲜明提出了必须变革国际秩序的要求，全球经济格局面临大转型。

① 丁一凡：《国际对华脱钩能否行得通》，《现代国企研究》2020年第10期。

② 郑宇：《21世纪多边主义的危机与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8期。

③ 赵英臣：《疫情后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构建》，《人文杂志》2020年第11期。

④ 丁一凡：《国际对华脱钩能否行得通》，《现代国企研究》2020年第10期。

（一）全球经济萎缩失衡明显

1. 美国经济下行风险有增无减

有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的比较优势转移到金融业、高科技与高端服务业，美国仍然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拥有最完备的知识体系和人才队伍。但是长期来看美国衰落是必然的，美元国际货币体系蕴含着使美国衰落的内在因子，即极有可能导致资产泡沫的虚拟经济和投机活动。^①也有学者指出，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诸多自由主义国家频繁建制、退群等，对现有多边合作机制的运行造成冲击，使得作为自由主义秩序基本原则的多边主义遭遇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国以多边机制为平台进行地缘政治竞争的战略诉求将使国家间制度竞争和制衡的现象继续存在并加剧。^②从美国的经济结构来看，美国政府试图以制造业复兴来实现美国经济再次繁荣的梦想一再落空。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大萧条发生后，罗斯福政府积极实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调整产业结构，不仅让美国产生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家庭，也显著提升了美国的经济实力。然而在滞胀危机后，美国政府大改发展策略，大量制造业往外转移，国内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保险、租赁、证券、房地产、银行等虚拟经济，产业结构空心化不仅使美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依靠制造业作为支撑的中产阶级群体迅速没落，社会两极分化日趋明显，这反过来又明显制约了美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而且使美国经济的发展质量不断下降——脱实向虚导致危机频频出现。总的来说，尽管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付出了不少努力，但美国现行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经济下行风险有增无减。

2. 全球经济新老问题集中爆发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老问题依然存在，新风险新挑战显著增多。有学者认为疫情大流行造成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经济复苏中枢后移带来全球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将引发全球结构性问题持续演化和趋势性变化，世界将进入动荡变革期。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创伤，全球经济深度衰退，收缩幅度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上升。随着部分国家疫情的二次暴发，全球经

^① 袁志刚：《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深层矛盾和基本走势——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新视角》，《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7期。

^② 杨慧：《国际经济机制变迁的竞争性多边主义趋向》，《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期。

济复苏出现结构性分化，加剧了原有的深层次问题。同时，疫情后经济复苏分化加剧。发展中经济体因财力和医疗条件限制，受疫情冲击更大，而且随着感染人数快速增加，经济前景可能进一步恶化。疫情后的“K型复苏”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有可能强化本已上升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倾向。全球债务水平攀升增大风险隐患。全球利率维持在低水平，各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张，资产价格大幅上扬，进一步增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全球经济将难以摆脱“低利率、高负债、高风险”局面。^①有学者认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或将出现大幅度萎缩，加剧全球贫困问题，将至少导致7 100万人在2020年陷入绝对贫困中。实现全面消除贫困目标的希望不大，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急需重新定位。^②张嘉明指出，到21世纪初，国际美元体系已呈现出以下局面：以美元为主要外汇储备的国家努力保持对美国投资收支赤字，为美国的经常收支赤字提供持续的融资，确保美元充分回流，使美国市场过剩的消费需求得以满足——美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借款人。因此，当今美国的“脱钩”行动使之对美元体系的依赖性不断降低，而美国的融资国在此方面的脆弱性并未因此发生显著改善，其最终后果将是：在美元体系“金融恐怖平衡”格局的一端，美国面临的风险大大减轻，其行动能够更少受到体系的约束；而居于另一端的融资国为美元体系承担的代价没有改变，将因美国更加灵活自主的行动而支付更多调整成本，被动地维持体系稳定，即“金融恐怖”的天平朝着有利于美国、不利于融资国的“失衡”方向倾斜。^③众多研究表明，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缓慢增长的长周期，有学者认为，尽管当前世界经济有一些积极的复苏迹象，但从长周期看，世界经济很难出现像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那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显著增长。世界经济长期增长乏力，预示着必然存在重大结构性矛盾。^④

（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国际秩序正在进入新的大转型时代，诸多领域的变化将对国际秩序的变迁产生深远影响。新的全球经贸格局的调整以及美国对全球经济贸易逐渐丧失的领导意愿和能力，导致后疫情时期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将持续淡化，再加上疫情时期高速发展的数字经济、跨境数字贸易、国际医疗合作，疫情后的经济全球化

① 李仲周：《RCEP与多边贸易体系相辅相成》，《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0年第12期。

② 郑宇：《21世纪多边主义的危机与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8期。

③ 张嘉明：《“金融恐怖失衡”：美国对外“脱钩”的货币后果》，《理论探讨》2020年第6期。

④ 徐康宁：《当代世界经济重大变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

将迎来新的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更加深刻地注入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① 由于全球秩序已经遭到系统性破坏，重构之路无疑会异常艰难。^② 此时更需要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维护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并坚持经济全球化。首先，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人类文明发展史充分表明，一种文明只有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中才能取长补短、保持旺盛生命力。其次，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开放型世界经济是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各国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构建，将为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流动和配置以及各国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升高，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最后，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是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现实要求：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由此可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是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大道”。^③

疫情将对经济全球化产生深远影响，全球供应链也将有所调整与改变或将呈现短链化、分散化、近岸化的新趋势，但很难被颠覆。从企业层面来看，跨国公司出于安全考虑，会对供应链进行一些调整，但并不意味着企业愿意并有能力丢弃现有的全球供应链而重构一条全新且完整的供应链。从民族国家层面来看，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疾病传播或许会进一步加剧保护主义，但是大多数国家既没有足够的资源，也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更不存在低成本生产所有商品的可能性，因此，实现所有商品与服务自给自足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其次，因系统性风险上升而引发的全球化不满，在人类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出现，但闭关锁国不是出路。疫情引发的供应链风险、系统性风险担忧，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挑战，但并非所谓全球化终结的理由。只要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未变，疫情就不可能逆转更不可能终止经济全球化。^④

① 李杨、车丽波：《后疫情时期经济全球化变局与中国应对》，《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② 刘洪钟、杨攻研：《国际秩序转型、全球化反思与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外部约束》，《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5期。

③ 王德蓉：《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学习习近平关于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论述》，《党的文献》2020年第3期。

④ 唐珏岚：《新冠肺炎疫情将逆转经济全球化吗》，《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力不断下降。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更是加速了国际权力结构转型，原有的等级化多边主义架构发生变化。在新的多边主义架构中，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主要动力来源，区域性国际组织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发展合作关系成为主要扩散机制。^① 预计到 2035 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所占比重将接近 60%。^② 基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尚有较大发展空间，并且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增长将形成旺盛的市场需求，有学者相信未来 30—40 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有望继续保持较发达经济体更高的经济增速，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进一步上升。^③

总的来说，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大一次历史变局，一是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经济发展的重心迅速转移，增长版图正在重塑，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经济不再单独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世界经济多极化时代正在真正到来，这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二是全球科技创新步伐加快与世界经济低速增长并存，增长动能结构存在严重障碍，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正在遭遇旧的结构挑战。三是世界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新兴经济体，而全球的市场需求过分依赖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不景气致使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难以持续。四是全球价值链呈现新变化，在提高国际分工效率的同时，全球价值链也正由于自身的脆弱而面临解构的风险，全球价值链正经历重塑和再造。五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国家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反全球化势头明显上升，经济全球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逆转和曲折。六是国际各方经济利益的融合和矛盾反复交织，全球经济治理关系日益复杂，国际地缘因素更加凸显，整体格局正处于演化之中，新的平衡关系有待建立。^④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明，面对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独善其身。在多边框架下加强团结、协调、合作，是国际社会携手应对疫情挑战的唯一正解，也是人类应对全球经济挑战的唯一正解。^⑤

① 郑宇：《21 世纪多边主义的危机与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8 期。

② 李仲周：《RCEP 与多边贸易体系相辅相成》，《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0 年第 12 期。

③ 王一鸣：《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管理世界》2020 年第 12 期。

④ 徐康宁：《当代世界经济重大变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江海学刊》2020 年第 1 期。

⑤ 李志军、李琦：《经济全球化大势不可逆转》，《前线》2020 年第 9 期。

我们认为，全球经济大转型是必然的，这从根本上是由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水平发展决定的。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建立的，代表了旧有的国际力量对比试图维持原有方案的西方发达国家保守思想顽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严重缺失。如果再不对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变革，那么世界各国的合作空间和信心就会受到打击，人类现代化事业和各国人民福祉都将受到损害。

三、中国开放型经济体制

面对着国际经济形势的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顺势而为，提出新发展格局战略，努力维护和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决心没有变，中国正在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通过切实行动向世界展示走新型经济全球化道路，以促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升中国人民的幸福感和全人类福祉。

（一）中国开放型经济体制建构的挑战和必要性

1. 开放型经济体制构建面临的现实挑战

开放型经济指的是一种基于全新发展模式的经济形态。一般认为，开放型经济主张通过加强外部联系发展经济，比如鼓励出口，促使生产要素、商品和服务等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自由流动。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下，开放型经济开始越来越多地依靠全球市场、开发虚拟经济潜力、“搭乘”网络革命的“便车”。在实施全面开放战略的过程中，开放型经济需要一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体系内与其他经济体进行良性互动和健康融合，这种经济形态与传统的外向型经济不同，也非单纯的改革开放或者被动接受他国的商品交易，而是在强调出口的同时也注重进口，在确定主要矛盾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和处理次要矛盾，既要求强化市场的主导和政府的协作，也要求建立完全竞争要素市场，最大限度发挥一国、地区的比较优势。^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相比而言开放的要求更高、层次更高，意味着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为实现这一目

^① 余雷：《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路径》，《河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标，我们要通过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推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高水平开放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①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构建面临着一系列现实挑战。第一，基于开放型经济的国际竞争方式发生改变。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格局的过程中，政府、市场、民间组织等都要为外商投资企业、本国企业打造公平、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模式变革和组织方式变革。第二，新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升级。第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抬升。在全球经济体系、贸易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大对本国企业的扶植力度，甚至通过政治或者行政手段要求美国在华企业撤出中国，以对中国开放型经济格局的构建施压。同时，部分国家不断抬高他国紧扣本国产品的关税额度，这将对目前我国出口依赖性较大的企业带来一定不利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金砖国家或者新钻国家，应在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团结一致，通过包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等多种形式持续开拓新市场和分散新风险，以降低生产要素成本、实现各国资源的优化配置。第四，传统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第五，开放型经济格局建设出现“短板”。^②

2. 开放型经济体制构建的必要性

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中强调，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的核心要义就是在尊重各方意愿的前提下，构建以更加公平、合理和合法的规则为导向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这一方面要求通过“开放倒逼改革”，即在国际经济往来的过程中，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一致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国内制度安排要对标国际标准，进而可以实现国内制度输出，转变为国际规则体系。^③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开放型经济体制构建的必要性。首先，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开放是适应我国新发展阶段的要求。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此形势下，需要继续吸引全球优质商品和要素，成为推动国内供需平衡和国民经济畅通的必然路径。再者，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开放是适应国际环境复杂深刻变化的必然要求。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同时，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势不会改变，而且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下和新冠疫情影响下，呈现出一系列新特

① 任保平：《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红旗文稿》2020年第4期。

② 余雷：《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路径》，《河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③ 王宝珠、王琳、王利云：《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理论逻辑与中国贡献》，《经济学家》2020年第4期。

征。在此形势下，我国需要加大开放力度，才能顶住经济全球化的逆风和回头浪，守住来之不易的国际市场渠道、经贸合作关系和对外开放信誉，也才能在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最后，在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开放是我国比较优势升级的必然要求。我国传统要素成本优势已经弱化，但广阔的国内市场、产业配套能力、人力资源队伍等新优势正在形成和巩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不断涌现。同时，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等新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新要求。要通过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为新发展格局形成提供强大动能。另一方面，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扩大开放具有市场空间优势、人力资源优势、产业配套优势、营商环境优势。^①为此，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我国要在积极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同时坚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②

（二）中国开放型经济体制建构的理念路径

1. 始终坚持合作共赢的开放理念

2020年全球疫情“大考”，全世界都要思考在下一场“洪水”来临时究竟应当以何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去应对，而全球抗疫的实际过程已经给出了答案：以合作共赢取代零和博弈将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历史未来走向的重要分水岭。因为人类命运的共同性在全球化时代集中体现在全球性问题上，人类只有面对教训不断展开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才能规避逆全球化与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潭，真正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③由此有学者认为，应以人类整体发展为指向，强调以平等和包容为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尊重、维护并实现各国合理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实现真正的人类共同利益。^④合作共赢最终是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指导思想，^⑤同时在经济层面深刻揭示了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利益交互性、价值共通性和命运依存性，这些恰恰也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的内在准则和必然结果。^⑥合作共赢的理念顺应全球历史发展大势。我国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

① 杨长湧：《推进新发展格局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放导报》2020年第6期。

② 余雷：《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路径》，《河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③ 狄英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及其时代价值——基于全球携手战“疫”的理论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

④ 张三元：《“中国之治”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9期。

⑤ 刘海军、王峰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角色及其历史依据》，《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10期。

⑥ 王宝珠、王琳、王利云：《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理论逻辑与中国贡献》，《经济学家》2020年第4期。

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客观要求，是发挥我国 14 亿人口大市场优势以促进经济全球化、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的重大举措。^① 只有秉承合作共赢的原则，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才能减少对全球化的不满。应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修正全球化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在符合世界市场秩序的前提下，促进国家间的交流合作和经济发展。^②

2. 加快推进内陆自贸区建设

长期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先于和优于对内开放，加之区域分割、地方贸易保护主义、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地方市场发育不充分等问题的存在，国内地区之间商品、劳务、资本等生产要素仍然存在流通壁垒，这不仅降低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也会导致中国经济对国外市场的过分依赖。将扩大内需与对外开放结合，借助对外开放打造协调统一的国内市场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③ 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过去的低要素成本优势转向巨大的市场规模优势，如果没有更高水平的内部开放，对外开放就无法深入下去，建立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便无从谈起。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对内开放程度已经成为进一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④ 作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自由贸易区建设如火如荼。自国务院批准设立首个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即上海自贸区）以来，各省市竞相追逐建设自贸区的试点资格。《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强调，实施具有较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加大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压力测试。“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需要持续推动贸易自由化，通过创新自贸试验区建设与提升自贸试验区改革自主权，持续提升贸易规模与贸易质量，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向制度型开放转变。^⑤

作为自由贸易区的升级版，我国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也取得了积极成效。建设自由贸易港，应该秉承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并进行进一步拓展、改进。

① 迟福林：《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6期。

② 黄惠：《贸易摩擦、逆全球化发生的深层机理与应对方略——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20年第4期。

③ 缪德刚：《中国对外开放路径变迁与制度演进》，《广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④ 刘志彪：《重塑中国经济内外循环的新逻辑》，《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7期。

⑤ 余雷：《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路径》，《河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此外,世界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拥有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先行经验,尤其是我国香港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路径,更是我们建设发展自由贸易港的重要参考。^①202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标志着我国在高水平自由贸易港建设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②体现了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决心和信心。在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加快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的重大举措,是我国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实际行动,是我国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标志。^③

3. 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在世界经济格局面临深刻调整、经济全球化式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际,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坚持合作和互利,与周边各国开展广泛的经济外交,推进各类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建设,并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与共建国家在互惠共荣的基础上,携手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展现了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地缘经济大格局。^④在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全球产业链可能面临重新洗牌,^⑤我国在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需要始终坚持并向纵深推进“一带一路”建设。^⑥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设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颁布《外商投资法》,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这一系列重大举措,为全球贸易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展示了中国对外开放力度会越来越大的决心。^⑦中国支持以平等、包容、开放为基本特征,以多维度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国际规则,并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国际规则建设积极支持现有多边体系。“一带一路”是以共同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合作机制,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型国际公共产品,即保证、维持和拓

① 陈林、周立宏:《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到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商环境升级路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② 王达、李征:《全球疫情冲击背景下美国对华“脱钩”战略与应对》,《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5期。

③ 迟福林:《加快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8期。

④ 李敦瑞:《地缘经济视域下的对外开放:大格局与新境界》,《兰州学刊》2020年第2期。

⑤ 杨长湧、刘翔畅、陈大鹏、张一婷:《百年未有大变局下的世界经济中长期走势》,《宏观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

⑥ 余雷:《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路径》,《河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⑦ 裴长洪、倪江飞:《坚持与改革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使命——写在中国加入WTO 20年之际》,《改革》2020年第11期。

展国家间分工与贸易的国际规则。^①“一带一路”建设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一脉相承，为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为建设包容创新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指明了前进方向。^②

目前，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我国已与全球137个国家以及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97份政府间合作协议，不仅在互联互通上取得重大进展，而且与共建国家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已经被诸多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国际组纳入成果文件，“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国际融资组织机构为“一带一路”注入发展动力。^③展望未来，“一带一路”建设将继续维持过去一年间“纵深发展”的基本方向，同时要重抓项目质量而非数量，大力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继续强化制度建设塑造更加合理有效的规则体系，努力扭转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不利局势。^④通过深化推进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我国开放型高质量经济发展。^⑤

4. 努力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构建的新要求。董志勇和李成明认为中国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目的是掌握中长期发展主动权，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更深层次融入全球经济，并推动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带动全球经济走向繁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最终归宿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价值实现，基于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带来的强劲增长动力，将带动全球经济走出深度衰退的泥潭，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迎接新全球化浪潮。^⑥也有学者认为，“引进来”对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意义更加重要，是我国拉住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深度参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重点方向，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升级的重要途径，也是联结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途径。特别要注意的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

^① 马涛、陈曦：《“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构建——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4期。

^② 王德蓉：《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学习习近平关于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论述》，《党的文献》2020年第3期。

^③ 范硕、何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经济内涵与实践路径》，《经济学家》2020年第5期。

^④ 李巍、张玉环：《从应对贸易摩擦到预防经济脱钩：2019年中国经济外交形势分析》，《战略决策研究》2020年第2期。

^⑤ 黄惠：《贸易摩擦、逆全球化发生的深层机理与应对方略——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20年第4期。

^⑥ 董志勇、李成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历史溯源、逻辑阐释与政策导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是要形成封闭的单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活动都不可能完全封闭起来运行，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我国早已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体系，国内大循环需要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配合，产业技术进步同样离不开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封闭起来只会拉大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① 新发展格局就是要让国内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成长中起决定性作用，改变中国参与国际产业竞争的形式、方式和途径，不仅要以国内大市场体系循环代替“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单循环格局，而且要让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链接起来，以国内市场发展和壮大促进和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循环。^②

总之，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更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③ 也为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以及中国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明确了方向，通过内外双循环推动共建开放性合作、创新、共享的世界经济。^④ 我们相信，在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努力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中国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一定能够取得更优异的成效，进而为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① 王一鸣：《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管理世界》2020年第12期。

② 刘志彪、凌永辉：《中国经济：从客场到主场的全球化发展新格局》，《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③ 王一鸣：《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管理世界》2020年第12期。

④ 王跃生、马相东：《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数字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王金秋 赵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近年来，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数字经济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广义的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等。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产值达到35.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36.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7.7%。^①

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20年，国内学者围绕数字经济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关系、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与国家治理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理论成果。

一、数字经济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研究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通用性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渗透到生产生活过程中，并对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产生影响。从2020年相关学术研究来看，数字经济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主要从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与社会就业结构三个方面展开。

（一）数字经济与直接生产过程

数字技术革命不仅带来生产力体系的数字化，而且推动了传统劳动过程向数字劳

^{*} 本文为北京工商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项目编号：QNJJ2019-25）成果。

^{**} 王金秋，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讲师；赵敏，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①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7月。

动过程转型，改变着生产过程中具体的分工协作方式。

在数字经济时代，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范式正不断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单个企业或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而且在产业内部甚至不同产业间产生技术的“溢出效应”和“赋能效应”，从而引起整个生产过程的进一步变革。^①其中，劳动资料的数字化成为变革的起点。一方面，数字本身成为劳动资料，如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形态的劳动工具，数据从原本无法采集和未被利用的信息中分离出来，具有非排他性、规模经济性、可再生性、强渗透性等新特征，^②打破了传统要素有限供给对增长的制约，为持续增长和永续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可能，成为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投入要素。^③另一方面，传统劳动资料被数字化改造和数字化使用，如智能机器人对传统机械制造工具的替代等。智能化机器生产体系的通用装备可以不需要工人的协助，通过信息物理系统（CPS）直接拥有特种设备的性能，借助于物联网的各类传感器，将所有机器设备“连接”在一起。^④数字技术使得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边界愈发模糊，数字成为劳动资料的同时，传统的劳动资料成为劳动对象，^⑤以数据、信息和知识等为主要内容的劳动对象呈现出流动性特征。^⑥

数字技术通过劳动资料的数字化影响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从而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即数字生产方式。^⑦这种数字化生产过程孕育了新的劳动形式——数字劳动，以文化、管理、信息科技、服务、社会网络等智力性和情感性劳动为主的数字劳动在生产中的地位愈加突出，^⑧传统劳动过程正在向数字劳动过程转变，并从根本上拓展了劳动过程的范围，通过连接不同劳动过程的功能，使得以往不被劳动分工波及的领域被卷入协作劳动过程之中。^⑨根据是否支付劳动报酬，数字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两种形式，如生产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等媒介产品、进行软件开发和软件组装等雇佣形式

① 王梦菲、张昕蔚：《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变革对生产过程的影响机制研究》，《经济学家》2020年第1期。

② 戴双兴：《数据要素：主要特征、推动效应及发展路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6期。

③ 黄再胜：《数据的资本化与当代资本主义价值运动新特点》，《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④ 赵敏、王金秋：《资本主义智能化生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⑤ 胡莹：《论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⑥ 都超飞、袁健红：《资本逻辑批判视域下的智能化生产方式探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⑦ 胡莹：《论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⑧ 赵林林：《数字化时代的劳动与正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⑨ 陈文旭、徐天意：《数字资本主义及其批判》，《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1期。

的有酬劳动，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生产数据信息的无酬劳动。^① 根据劳动过程特征差异性的大小，数字劳动过程分为传统雇佣经济领域的数字劳动过程、互联网平台零工经济中的数字劳动过程、数字资本公司技术工人的数字劳动过程和非雇佣形式产销者的数字劳动过程四种类型。^②

数字技术塑造了新的生产分工与协作模式，传统机械化、流程化的生产过程正逐渐被网络化、协同化的生产和创新过程所取代，通过技术分工把现实经济空间和虚拟空间紧密连接起来，实现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提升了分工的灵活性与资源配置效率。^③ 数字技术为产品形态根本性变革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企业需要根据用户动态需求变化即时调整产品功能、形态以不断匹配新需求，产品模块化生产成为未来的战略方向。^④ 随着工业领域的数字化，标准化生产逐渐演进为模块化生产，利用数字化计算对信息的精准处理能力，有效地将产品分解成独立的模块，这些模块可以分配给不同地区、不同专业的企业进行独立设计和制造，^⑤ 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构建起虚拟车间，令产品的设计、实验、工艺、制造等活动在数字空间内完成。^⑥ 平台成为新的生产组织中心，推动了生产分工的平台化转型，企业之间的生产分工由平面链式分工向立体网络式分工转型。企业以数字平台为基础，不同产品、不同产业围绕用户的全方位、多样化需求相互融合，大大提升了用户与资源及服务匹配的效率和精准度。^⑦ 以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为代表的新型、标准化的众包平台，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劳动力众包计算机程序难以完成却是人类擅长的任务，如数据标注。^⑧ 借助网络和信息技术，平台将劳动过程控制嵌入数字化的劳动流程规范、量化的劳动服务绩效和质量控制指标中，使原本难以监管的劳动过程变得易于监管。^⑨ 组织结构也趋于网络化、扁平化，网络化的组织结构以节点为单位，具有去中心化、去中介化等特点。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能够以用户为中心，基于小型团队的分散化决策以及更广泛的连接与集合，加

① 成军青、薛俊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数字劳动本质探析》，《改革与战略》2020年第11期。

② 韩文龙、刘璐：《数字劳动过程及其四种表现形式》，《财经科学》2020年第1期。

③ 李策划：《互联网时代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改革与战略》2020年第9期。

④ 肖静华等：《数据驱动的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20年第3期。

⑤ 杨慧玲、张力：《数字经济变革及其矛盾运动》，《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1期。

⑥ 操奇、孟子硕：《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机制的几个问题》，《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1期。

⑦ 徐宏潇：《后危机时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演化特征及其双重效应》，《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2期。

⑧ 姚建华：《在线众包平台的运作机制和劳动控制研究——以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为例》，《新闻大学》2020年第7期。

⑨ 胡磊：《平台经济下劳动过程控制权和劳动从属性的演化与制度因应》，《经济纵横》2020年第2期。

快资源的交互与整合，成为企业内部数字化转型的最优方案。^①

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数字平台为依托的新经济组织通过占有数据形成了一种新的商品——数字商品。^② 数字商品在遵循劳动价值论的同时，也呈现出新特征。在表现形式上，数字商品是通过提供信息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虚拟字符串；在使用价值上，数字商品易于复制，可以独立于物理载体存在，其使用价值会随着使用人数的增多提高；在价值形成过程中，数字商品的批量复制行为，使具有同等功能的数字商品被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在价值实现形式上，数字商品的价格，产生了会员费和广告费两种特殊的表现形式。^③ 然而，不管科学技术手段发生什么变化，任何创造价值的社会生产过程都是劳动、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结合并发生作用的过程，数字技术下生产力各要素发生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创造价值的社会生产过程的本质；^④ 智能机器作为对象化劳动，只是转移自身的价值到商品，并没有创造价值。而人的直接劳动虽然被取代，但却以间接劳动的方式作用于劳动对象。^⑤

（二）数字经济与流通过程

只有通过流通环节，将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真正投送到社会需要的地方，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才能最终实现。借助科技手段缩短流通时间、扩大流通范围、加速资本循环和积累，是资本竞争或市场竞争的必然策略。

以信息技术为底层架构的全新流通媒介——数字平台的兴起，实现了一次“流通革命”。不同于以往只停留在流通部门内部经营和组织结构的变革，这场“流通革命”以技术为先导，瓦解了实体生产商主导下的商业流通格局，催生出作用越来越重要的现代电子商务和物流业，逐步建立流通主导型的新经济格局。^⑥ 数字时代的交易更多地表现出去中心化、去中介化的特点，使商品交换环节得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平台可以依托大数据资源和市场分析更有效地拓宽组织边界，并通过虚拟化交易场景的塑造持续扩大零售活动空间，在数字化需求分析基础上形成合理化的商品采购结构，

① 戚聿东、肖旭：《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变革》，《管理世界》2020年第6期。

② 曲佳宝：《数据商品与平台经济中的资本积累》，《财经科学》2020年第1期。

③ 王姝楠、张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域中的数字商品二因素》，《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④ 白永秀、刘盼：《人工智能背景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经济学家》2020年第6期。

⑤ 刘伟兵：《过时还是证明：人工智能时代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

⑥ 蔡超：《论数字平台的兴起与数据商品的生成——基于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的考察》，《消费经济》2020年第6期。

有助于零售过程尽可能降低供需误配，相对地缩短商品作为储备在市场上的停滞时间，在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范畴内实现效率突破。^① 平台企业也可与传统零售企业通过相互入股、战略协议等方式深度融合，整合线上线下的销售平台，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零售门店，提高销售精准程度及物流效率。^② 渠道线上化向线上线下一体化转变，线上线下从利润分割的竞争关系转变为合作共赢关系，是零售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趋势。^③

与传统经济相比，平台经济进入市场和竞争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平台技术、平台架构和平台治理的复杂性决定了平台竞争策略的多样性。为了获得平台竞争优势，每一个平台企业都具有独特的、基于多样竞争策略组合的技术架构和市场架构。^④ 平台经济的竞争优势更关注发挥先行者优势，^⑤ 通过跨平台连接、后向兼容以及渐进、稳定的升级更新，不断扩大产品的功能、业务的范围和客户的广度。^⑥ 不断追求新的轮次融资也成为平台企业在发展期间竞争的“源动力”，互联网平台经济已成为金融资本新的投机场所。^⑦

在消费领域，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共同推动了消费领域数字化。数字化消费转型主要表现在形式、内容、模式和思维四个方面。消费方式上，从银货两讫转向在线交易，在线消费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实现全天候跨区域消费，商品信息量丰富，操作简单便捷；^⑧ 消费内容上，呈现多元化、虚拟化和个性化特点，从物质性消费转向物质性消费与非物质性消费并重；消费模式上，从单一化走向网络化、平台化，网络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较快地实现供需双方信息的匹配，供给者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⑨ 消费思维上，通过数据思维改变消费认知与选择行为，如各种共享平台的出现使消费者对物品所有权的概念开始淡化。^⑩ 电商平台等消费方式客观上催生了消费者全过程参与的新生产方式，生产者更易获取居民消费信息并将其投入生产

① 谢莉娟、王晓东：《数字化零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

② 刘伟：《论平台经济中计划机制的形成与扩展》，《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11期。

③ 李晓雪等：《零售业数字化转型机理研究》，《中国流通经济》2020年第4期。

④ 贺俊：《创新平台的竞争策略：前沿进展与拓展方向》，《经济管理》2020年第8期。

⑤ 洪银兴：《“互联网+”市场的经济学分析》，《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3期。

⑥ 刘家明：《国外平台领导研究：进展、评价与启示》，《当代经济管理》2020年第8期。

⑦ 刘震、蔡之骥：《政治经济学视角下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金融化》，《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7期。

⑧ 张峰、刘璐璐：《数字经济时代对数字化消费的辩证思考》，《经济纵横》2020年第2期。

⑨ 韩文龙：《数字经济中的消费新内涵与消费力培育》，《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⑩ 易宪容等：《平台经济的实质及运作机制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要素的组织过程，消费者需求也将被收集反馈成为研发决策的依据。^①

数字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使得消费过程呈现出“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一体化”的新型特征，即“产消一体化”。^②消费者直接成为“在线研发人员”，承担企业部分或全部的研发功能，例如，网络游戏玩家的在线无意抱怨，即对产品“槽点”“痛点”的吐槽，成为海尔“小微”的创业灵感和数据来源。^③消费者在免费使用数字平台的过程中生产数据信息，成为数据生产者。^④数字平台通过数据信息研判、明晰潜在消费需求，以精准投放广告人为制造或放大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消费者的自由消费成为数字资本规训的活动。^⑤像美国的谷歌、苹果、脸书等数字垄断企业，通过收集到的数据，开发永久性反馈循环算法，探知用户体验价值，根据用户体验价值数据定向发出广告和垄断价格产品，获取高额利润。^⑥个体作为数据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情感的需求被异化成了对无数符号的虚假欲望。^⑦在数字化时代要为同为生产者的劳动者和消费者争取到真正的闲暇和个性自由，必须反思资本对数字技术的霸权式应用。^⑧

（三）数字经济与社会就业结构

数字技术在重塑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未来数字技术以毁灭就业岗位为主还是以创造就业岗位为主？就业岗位的创造和毁灭将分别发生在哪些部门，以什么形式发生，又将带来何种收入分配后果？……成为2020年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会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⑨数字技术对劳动力就业既有替代效应也有创造效应，在替代中低技能就业岗位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岗位。在淘汰一些旧行业的同时，催生了一大批新业态和新模式，促进了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新媒体和智慧物流等领域的新增就业。^⑩在消灭部分就业岗位的同时，新的数字流水线又把

① 马香品：《数字经济时代的居民消费变革：趋势、特征、机理与模式》，《财经科学》2020年第1期。

② 邹琨：《数字劳动的生产性问题及其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1期。

③ 李海舰、李燕：《对经济新常态的认识：微观经济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12期。

④ 张峰、赵乾宇：《对“疫后新常态”数字化生产与生活问题的辩证思考》，《学习论坛》2020年第7期。

⑤ 黄静秋、邓伯军：《数字帝国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逻辑批判》，《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第9期。

⑥ 韩永进：《论当代资本主义的数字逻辑》，《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⑦ 董慧、李家丽：《数字劳动中情感的异化和解放》，《世界哲学》2020年第6期。

⑧ 包大为：《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年第7期。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⑩ 王文：《数字经济时代下工业智能化促进了高质量就业吗》，《经济学家》2020年第4期。

分散在各处的工人汇聚起来，形成隐性集体劳动力。^① 有学者通过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认为机器人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冲击、资本要素替代冲击和投资转化率冲击三种形式，机器人技术进步短期内对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长期来看有负面作用。^② 有学者以上市企业微观数据研究人工智能上市企业的就业创造效应机制，认为企业提高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并没有对员工就业产生显著的破坏效应，反而凸显出新技术对就业带来更多的创造效应。^③ 数字技术对就业的总体影响取决于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创造”与“替代”两种相反的力量孰大孰小，并且其创造效应强弱由制度因素、经济禀赋及科技发展等因素决定。^④ 技术进步的总体就业效应由于方法与数据的差异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大部分研究认为，在近期内数字技术不会降低劳动就业总量，但是会对劳动就业结构产生较大影响。有学者从资本有机构成角度指出，资本有机构成在第一产业内呈现明显的提高趋势，但是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变化较小。^⑤ 有学者从劳动技能角度观察，认为高技能劳动者就业比重增加，而中、低技能劳动者就业比重萎缩的“T”型结构，呈现就业高端化趋势。^⑥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减少了对高中和初中教育程度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了对小学及以下学历、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劳动力的需求。^⑦ 有学者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会先抑制再提升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就业，促使传统产业就业呈“U”型变化趋势，同时会促进第三产业就业增加。^⑧ 自动化数字设备会毁灭制造业的低端岗位，但由于数字技术设备与高技能人才存在互补关系，技术同时将创造出高技能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岗位；高技能人才收入提高后引致的闲暇生

① 玛丽·格雷、西达尔特·苏里：《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左安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② 韩民春、韩青江：《机器人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当代财经》2020年第4期。

③ 何勤、邱玥：《人工智能的就业效应研究：锦上添花抑或是釜底抽薪？》，《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④ 吴宇轩、杨小勇：《〈资本论〉机器大生产理论视角下的人工智能就业创造效应探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⑤ 刘冠军、李鑫：《资本有机构成变化趋势及其对就业的影响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

⑥ 唐永、张衔：《人工智能会加剧资本主义失业风险吗——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财经科学》2020年第6期。

⑦ 阎世平等：《数字经济发展与中国劳动力结构演化》，《经济纵横》2020年第6期。

⑧ 杨骁等：《数字经济对我国就业结构的影响——基于机理与实证的分析》，《软科学》2020年第10期。

活需要，亦将产生更多低技能生活性服务业就业岗位。^①有学者从劳动力供需角度分析，认为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会引致劳动力需求的增大，使未来劳动力市场呈现“有岗无人”而并非“有人无岗”的状态。^②有学者从性别角度考察，认为技术进步对我国男、女性就业率均具促进作用，但由于其对男性就业的促进更强，导致性别就业差距的强化。^③有学者从收入分配角度观察，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岗位更迭效应倾向于在低技术部门通过自动化扩张、在高技术部门以新岗位创造方式，加剧收入不平等。^④

就业模式越来越多地从传统的、受雇于固定雇主的稳定就业向灵活就业（弹性就业）等非传统、不稳定就业转变，外包经济、零工经济、共享经济等就业模式越发普及。首先，雇佣方式日益灵活化，零工劳动者采用分散化的工作方式，工作地点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⑤其次，工作薪酬的计件工资化日益明显，平台借助强大的数据运算、存储和传输能力，极大地加强了对工作流程的监控，不仅能在传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实施计件工资，而且能在最前沿的科技服务业通过实行众包制、分包制等实施计件工资，^⑥工资按照劳动成果（包括成品的数量和质量）来结算。^⑦最后，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的区分日益模糊，全天24小时都有可能成为数字商品价值生产的劳动时间，^⑧一些数字平台充分利用劳动者闲暇时间进行各种兴趣爱好和评价反馈，将劳动者的闲暇时间转化为服务于平台的无酬劳动时间，以往用户的消费或休闲时间开始具备生产性劳动的性质。^⑨

灵活就业打破了劳动力市场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更多低技能者与失业者获得

① 赵显名、黄少卿：《创造抑或毁灭：数字技术对服务业就业的双向影响》，《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1期。

② 高春明等：《人工智能对中国未来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于劳动力供给视角的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0期。

③ 朱轶：《技术进步是否加剧了性别就业差距？》，《现代财经》2020年第10期。

④ 王林辉等：《人工智能技术会诱致劳动收入不平等吗——模型推演与分类评估》，《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4期。

⑤ 卢江、刘慧慧：《数字经济视阈下零工劳动与资本弹性积累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⑥ 丁晓钦、柴巧燕：《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引发的社会变革——兼论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数字经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

⑦ 肖斌、李旭娇：《劳动形态对工资形态的影响及其对零工经济剥削研究的价值——基于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文本的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

⑧ 杨继、刘柯杰：《区块链下互联网经济价值分配优化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7期。

⑨ 刘皓琰：《从“社会矿场”到“社会工厂”——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心—散点”结构》，《经济学家》2020年第5期。

了劳动机会，但同时也使劳动关系处于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之中。^① 尤其平台经济就业下生产要素组合呈现一种混合状态，即劳动者在使用他人生产资料（如平台数据）、提供劳动力的同时，也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如车辆、房屋），^② 平台与灵活就业者是雇佣关系还是劳务关系，仍存在较大争议。在美国，像 Uber 这样的平台企业，将司机称为独立承包商，企业的商业风险被转移到司机身上，司机难以享受到与传统雇佣劳动者同等的社会保障。^③ 德国将平台用工视为类雇员，作为自营职业者（独立性劳动）与劳动者（从属性劳动）之间的过渡形态而存在，并构建了独立性劳动、经营性劳动与从属性劳动的“劳动三分法”制度框架。^④ 劳动中人际关系的高度分散化和疏离化以及平台通过算法对整个劳动过程的高度控制，成为对零工们议价能力的最严峻挑战，零工们很难通过工会或者其他形式的劳工组织实现与“平台”的集体议价。^⑤ 受到资本逻辑的支配，平台公司有可能会在识别出劳动风险的同时通过各种手段来逃避本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如何让风险识别机制维护和保障数字劳动者的合法权益，^⑥ 现行的劳动法规、社会保障政策应该如何应对新变化、解决“滞后性”问题，成为未来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和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⑦

二、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将数据列为新的生产要素，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

① 杨滨伊、孟泉：《多样选择与灵活的两面性：零工经济研究中的争论与悖论》，《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0年第3期。

② 李敏等：《平台经济发展与“保就业和稳就业”：基于就业弹性与劳动过程的分析》，《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0年第7期。

③ 董成惠：《零工劳动对传统劳动关系的解构以及应对措施》，《湖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④ 王天玉：《互联网平台用工的“类雇员”解释路径及其规范体系》，《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

⑤ 刘文静：《平台企业：零工经济中的法律关系与责任分担》，《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7期。

⑥ 韩文龙、刘璐：《数字劳动过程中的“去劳动关系化”现象、本质与中国应对》，《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10期。

⑦ 魏巍、冯喜良：《零工经济中的工作关系研究与政策优化》，《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年第9期。

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①数据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和重大意义受到学界广泛关注。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新增长点，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数字经济重塑整个经济生产、交换、消费方式，与我国新发展理念内在要求相契合，日益成为推动我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和实施经济内循环战略的重要引擎和基础。^②有研究测度了2011—2016年中国22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水平，以企业工商注册信息微观数据刻画城市的创业活跃度，计量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高质量发展。^③这一结论在世界经济范围内也同样成立，数字技术显著提升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④数字经济推动企业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机制体现在企业生产方式、企业间组织方式、^⑤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等多个方面。

在微观层面，数字经济通过数据要素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结合，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技术驱动下的关键要素成本递减与网络效应有助于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⑥打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企业生产由规模化、标准化向定制化、个性化、服务化转变以满足消费者日渐升级的消费需求，^⑦形成敏捷、柔性的生产方式，^⑧产品、商业模式创新水平得以提高，^⑨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数字经济推动企业组织环境由静态向动态转型、生产流程由人工化向智能化转型、创新行为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型、交易成本由高向低转型、

①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② 杨佩卿：《数字经济的价值、发展重点及政策供给》，《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唐要家、唐春晖：《数据要素经济增长倍增机制及治理体系》，《人文杂志》2020年第11期；何大安：《数字经济下内循环为主战略的理论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2期。

③ 赵涛等：《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20年第10期。

④ 高敬峰、王彬：《数字技术提升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吗》，《国际经贸探索》2020年第11期。

⑤ 祝合良、王春娟：《数字经济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理与路径》，《财经理论与实践》2020年第5期。

⑥ 孙杰：《从数字经济到数字贸易：内涵、特征、规则与影响》，《国际经贸探索》2020年第5期。

⑦ 韩晶等：《后疫情时代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径解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年第5期。

⑧ 戚聿东、刘欢欢：《数字经济下数据的生产要素属性及其市场化配置机制研究》，《经济纵横》2020年第11期。

⑨ 祝合良、王春娟：《数字经济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理与路径》，《财经理论与实践》2020年第5期。

资产管理由物理资产向数据资产转型。^① 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数字经济赋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②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引领产业变革;^③ 通过推动产生新模式、新业态迎合消费者需求,提升传统产业产出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④ 数字技术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出规模均呈现指数化增长。^⑤ 经验研究表明,新一代数字技术显著提高了创新能力,^⑥ 提升其投入水平有助于提升行业经营状况和行业盈利能力,^⑦ 显著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⑧ 对中低和中高知识密集制造业部门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化具有显著正效应。^⑨

在中观层面,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产业创新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从中长期看,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不可避免地改变供给侧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驱动数字化产业生态形成。^⑩ 工业化时代的上下游厂商、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垂直架构转变为网络协同架构,^⑪ 厂商能够最大限度地去库存,高效应对社会需求的变化,优化供给侧结构。尤其是新冠疫情后,传统经济亟需向智能化和线上化转型,全球产业链布局脆弱性被放大,数字经济在推动中国产业主导产业链优化重构方面的能力更加得到重视。^⑫ 经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缓解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促进制造业质量升级,^⑬ 还可以通过不断推进技术通用性提高各产业部门的生产效率。^⑭ 数字经济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驱动效果存

① 李辉:《数字经济推动企业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② 焦勇:《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转型:从价值重塑到价值创造》,《经济学家》2020年第6期;李春发等:《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基于产业链视角的分析》,《商业研究》2020年第2期。

③ 郭晗、廉玉妍:《数字经济与中国未来经济新动能培育》,《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④ 郭晗:《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⑤ 王颂吉等:《数据要素的产权界定与收入分配机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2期。

⑥ 温珺等:《数字经济驱动创新效应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回归》,《经济体制改革》2020年第3期。

⑦ 贺远望:《数字技术要素投入对行业利润率影响研究——基于2017年投入产出表的分析》,《价格理论与实践》2020年第4期。

⑧ 沈运红、黄桁:《数字经济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浙江省2008—2017年面板数据》,《科技管理研究》2020年第3期。

⑨ 何文彬:《全球价值链视域下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升级重构效应分析》,《亚太经济》2020年第3期。

⑩ 温军等:《数字经济创新如何重塑高质量发展路径》,《人文杂志》2020年第11期;唐要家:《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增长的机理与政府政策重点》,《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0期。

⑪ 何大安、许一帆:《数字经济运行与供给侧结构重塑》,《经济学家》2020年第4期。

⑫ 韩晶等:《后疫情时代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径解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年第5期。

⑬ 马中东、宁朝山:《数字经济、要素配置与制造业质量升级》,《经济体制改革》2020年第3期。

⑭ 王开科等:《数字经济发展改善了生产效率吗》,《经济学家》2020年第10期。

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而且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存在长期、持续、正向的动态交互作用。^①

在宏观层面，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丰富要素来源、改善要素配置效率、发挥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促进经济增长。^② 通过探索挖掘大数据，各级政府可以更好地建立宏观调控指标体系，提高宏观调控精准性。^③ 基于261个地级市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具有集聚效应，显著促进了各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助推产业向中高端发展迈进。^④ 采用5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同样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会进一步放大，数字技术对于高技术制造业部门的效应更明显。^⑤

数字经济除了助力传统产业升级发展外，还可能冲击传统经济发展。在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实现新旧产业系统发展，完成经济“质”和“量”的跃迁。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避免产业体系结构性陷阱和生活服务业红利陷阱。^⑥ 前者是指产业结构中旧产业衰退但新产业成长缓慢的现象。在数字经济颠覆性创新冲击下，传统产业可能尚未完成转型就被挤出市场，数字经济获得市场支配甚至垄断地位，^⑦ 现有全产业链格局遭遇冲击失去制造业优势，影响产业现代化。有经验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负向影响，“挤出效应”明显。^⑧ 后者是指资本、人才集中于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的生活性服务业，导致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的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部门投入相对不足。

① 李晓钟、吴甲戌：《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区域差异》，《国际经济合作》2020年第4期。

② 丁志帆：《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现代经济探讨》2020年第1期。

③ 戴双兴：《数据要素：主要特征、推动效应及发展路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6期。

④ 林宇豪、陈英葵：《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要素流动视角下的空间计量检验》，《商业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

⑤ 王永龙等：《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质量变革机理与效应——基于二元边际的理论与实证》，《中国流通经济》2020年第12期。

⑥ 杨虎涛：《数字经济的增长效能与中国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⑦ 许恒等：《数字经济、技术溢出与动态竞合政策》，《管理世界》2020年第11期。

⑧ 姜松、孙玉鑫：《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科研管理》2020年第5期。

三、数字经济与国家治理研究

(一) 数字经济与国家的作用

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不管是技术革命性变化本身具有方向上的不确定性、对基础设施和克服制度障碍的需要,还是解决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都需要各种政策支持、引导和激发,国家扮演着重要角色。^①如大卫·哈维曾指出:“资本向来不是追求技术优势的唯一原动力,国家机器的各个分支一直深涉其中。”^②美国等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都得到了政府的有力支持,^③新一代智能技术的崛起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重要推动力。^④2020年,对国家在数字技术发展、数字经济竞争等方面作用的研究也比较丰富。

凭借着庞大的人口规模、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条件和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有着独特优势。^⑤但是,随着数字经济对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阻碍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的问题,如新型基础设施网络不完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变革的产业政策难以满足需要、对科学技术的创新投入不足等亟须解决。^⑥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发展。^⑦经验研究结果证明,虽然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方面已然位于世界前列,但利用数字化赋能制造业挖掘潜能的能力仍然较弱。^⑧为促进我国数字经济生态系统朝互利共生方向协同演化,需要国家加强政策供给,在完善数据要素产权界定、推动数据要素市场更加完善、推动企业

① 杨虎涛:《社会—政治范式与技术—经济范式的耦合分析——兼论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政治范式》,《经济纵横》2020年第11期。

② 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③ 谢谦等:《数字贸易政策国际比较、发展趋势及启示》,《技术经济》2020年第7期;李艳艳等:《基于美国经验启示的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商业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

④ 蒋红群:《人工智能崛起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变化》,《学术论坛》2020年第5期。

⑤ 童锋、张革:《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独特优势及路径依赖》,《科技管理研究》2020年第2期。

⑥ 任保平、李佩:《以新经济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杜雪锋:《数字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及借鉴》,《经济体制改革》2020年第5期。

⑦ 王德辉、吴子昂:《数字经济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对策研究》,《长白学刊》2020年第6期。

⑧ 何文彬:《数字化推动中国制造业价值链高端化效应解析——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华东经济管理》2020年第12期。

生产方式变革、培养核心技术人才、完善数字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①在数字经济时代，国家政策在促进数字技术创新的同时，还需要关注技术创新的破坏效应。^②在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技术差距缩小进而从非对称竞争进入对称竞争，以及在竞争缓冲环境下传统经济仍然转型失败时，政府应当降低政策强度直到完全退出。^③

除生产领域外，数字技术在流通领域发展迅速同样需要国家政策支持。数字贸易不仅包括数字化交易的产品，还包括通过电子商务完成的、主要是与货物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以及由此促成的货物贸易。然而数字贸易面临着数据统计制度不健全、贸易分类界定不清、数据跨境传输规则不完善、监管机制相对落后、以信息安全为名义的国际贸易壁垒等问题，需要从国家层面提高数字贸易战略定位、完善数据统计制度、设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国内数据跨境传输规则、探索数字贸易监管思路，在WTO框架下推动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进一步完善等。^④

在数字经济时代，国际经济竞争格局发生变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强化自身优势，大力支持本国数字产业发展，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制定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条款，甚至以技术封锁、打击其他国家企业等霸权主义方式维护本国资本的利益。^⑤发展中国家既不掌握规则制定权，又面临被“卡脖子”的困境，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⑥数字经济的全球扩张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带来预期的平等共享的机遇和福利，事实恰好相反，数字经济正在加速全球经济增长分化，^⑦“数字鸿沟”进一步固化了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产业链中低端地位。尤其是数字经济在生产端和流通端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即与消费者直接相关的产业和部门往往呈现去中心化特征，但是搭载数字产业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设施高度中心化，核心技术与服务被牢牢地掌握在发达经济体手中。^⑧全球价值链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地区和国家在数字贸易过程中能够获得绝大多数新创造价值，通过输出数字产品和服务进一步强化对发展中国家产品生产过程的控制，压缩发展中国家对新创造价值的占有。在数字贸易引起的全球价值链收入

① 孟方琳等：《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运行机理与演化》，《宏观经济管理》2020年第2期。

② 钟春平：《数字经济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及最优公共政策》，《理论探索》2020年第6期。

③ 许恒等：《数字经济、技术溢出与动态竞争政策》，《管理世界》2020年第11期。

④ 刘洪愧：《数字贸易发展的经济效应与推进方略》，《改革》2020年第3期；谢谦等：《数字贸易政策国际比较、发展趋势及启示》，《技术经济》2020年第7期。

⑤ 徐宏潇：《国际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向及其内在悖论》，《经济学家》2020年第2期。

⑥ 徐宏潇：《后危机时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演化特征及其双重效应》，《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2期。

⑦ 王璐瑶等：《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挑战及中国的参与路径》，《国际贸易》2020年第5期。

⑧ 姜宇、蓝江：《数字资本积累中的免疫机制——以美国制裁华为反观资本主义共同体的开放和保护》，《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分配格局的变化中，利润并不是向中间端集聚，而是向上游和下游集聚，这也意味着数字贸易发展会进一步加剧现有全球价值链收入分配的不平等。^①

尽管我国在部分技术领域、庞大的市场规模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是在核心技术和基础研究等领域仍然存在较大的劣势，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参与全球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影响巨大。面对数字资本主义霸权日趋激烈的挑战，中国一方面应立足于既有发展基础，需要在重点领域突破“卡脖子”问题、挖掘下游应用市场潜力、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培养关键领域复合型人才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抓住在数字经济领域“弯道超车”的机遇，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②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主导的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必然无法实现数字经济的全面发展，^③中国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新型数字全球化是其替代性方案。中国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从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国际合作开发、强化国际数字信息安全等领域入手，^④重点联合发展中国家共同积极应对国际数字霸权。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国家不仅要在国内发挥推动作用，还需要在海外积极布局。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数字经济产业链，利用“数字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技术合作，本着与全球共建共享、合作共赢、平等参与的原则，在数字贸易税收、数字贸易壁垒等问题上加强国际合作，发挥更大影响力。^⑤

（二）数字经济与反垄断监管

与传统经济相适应的管理、监管制度等大多滞后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需要，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需要国家在统计制度、激励制度、监管方式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对平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动态监管，^⑥制定随需应变的监管方案促进企业在核心技术研发、制定行业标准等关键领域的发展，^⑦积极应对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产生的监管挑战。

尽管数字经济促进生产要素不断突破地域限制、降低消费者搜索和比较成本，促

① 徐金海、夏杰长：《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数字贸易发展：战略定位与中国路径》，《改革》2020年第5期。

② 邓洲：《基于产业分工角度的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优劣势分析》，《经济纵横》2020年第2期。

③ 赵敏、王金秋：《资本主义智能化生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④ 蓝庆新：《数字经济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8期。

⑤ 潘晓明：《国际数字经济竞争新态势与中国的应对》，《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3期。

⑥ 李勇坚等：《数字经济平台垄断问题：表现与对策》，《企业经济》2020年第7期。

⑦ 张森等：《数字经济创新探究：一个综合视角》，《经济学家》2020年第2期。

进了市场竞争,提高了市场竞争强度,^①但是,数字经济的固有特征也使得数字经济具有较强的垄断性。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是数据,而数据生产又具有路径依赖和蜂聚效应,极易造成数据垄断,^②在此基础上,公司规模越大,开发新产品的成本和速度优势就越大,产品组合也越多样化,这些公司可以通过系统优势获利。^③而且,平台型企业一旦形成垄断后,会进行横向和纵向扩张,将市场垄断力量从一个垂直市场传导至多个垂直市场,从而形成双轮垄断。^④尤其对于广告支持型平台企业而言,在竞争机制、数字化运作、垄断行为等方面具备一些传统经济和其他类型平台不具备或不显著的特征,其垄断具有模糊性、隐蔽性等特点。^⑤在资本不断强化数据垄断的内在倾向下,数字经济的垄断性远超传统经济。互联网巨头在“赢者通吃”的商业法则下,利用自身垄断地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用户数据、对竞争对手实施反竞争措施,这些限制数字经济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垄断行为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现实中反垄断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传统理论不适用于数字经济时代。^⑥传统反垄断分析框架以一般均衡理论为立论基石,其静态、单向的判断标准难以适用于以动态、跨界为特征的数字经济,使得实践陷入困境。^⑦传统反垄断法律的三大支柱都或多或少遭到了数字经济的挑战。首先,通过大数据和算法形成的共谋行为较传统的垄断协议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基于算法的价格合谋通常是由算法自动执行的动态定价,企业之间并不存在信息交流,价格合谋更多地是基于算法的自动协调或平行行为,不存在“价格协议”。^⑧其次,围绕数据形成的一系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也说明原有的反垄断分析方法存在缺陷,包括市场边界的模糊、以市场份额为核心的支配地位判断方法和以价格为核心的竞争损害分析方法出现不足,是否要在营业额之外引入新的考量因素,如数据的占有数量等,也引发了极大的争论。^⑨互联网平台的公共属性日益

① 孙杰:《从数字经济到数字贸易:内涵、特征、规则与影响》,《国际经贸探索》2020年第5期。

② 杨虎涛:《社会—政治范式与技术—经济范式的耦合分析——兼论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政治范式》,《经济纵横》2020年第11期。

③ 方莉:《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主义剥削的发生、实现及其批判》,《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④ 李勇坚、夏杰长:《数字经济背景下超级平台双轮垄断的潜在风险与防范策略》,《改革》2020年第8期。

⑤ 许获迪:《数字经济背景下广告支持型平台的反垄断治理》,《西南金融》2020年第6期。

⑥ 陈万钦:《数字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研究》,《经济与管理》2020年第6期。

⑦ 陈富良、郭建斌:《数字经济反垄断规制变革:理论、实践与反思——经济与法律向度的分析》,《理论探讨》2020年第6期。

⑧ 唐要家、尹钰锋:《算法合谋的反垄断规制及工具创新研究》,《产经评论》2020年第2期。

⑨ 杨东:《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理论和规制体系的重构——以竞争法为核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7期。

增强，将互联网平台认定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也成为加强反垄断措施的重要理由。^① 有学者认为，如何界定平台经济的市场支配力、确定平台企业是否垄断等数字经济时代的反垄断问题可以被看作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争论的现代版本，美国的反垄断“大争论”中三个主要学派的理论观点为我国反垄断事业提供了启示。^② 应以创新为代表的垄断，与同质完全竞争下的垄断及行政垄断区分开来，这有利于将创新驱动的思想纳入反垄断的基本思路中，^③ 同时厘清平台垄断中“马歇尔冲突”等多元矛盾与利益冲突，在多元价值目标中果断取舍。^④

（三）数字经济与政府治理方式数字化

数字政府建设既为数字技术提供了市场需求，也不断创新管理方式，提高治理能力。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不仅产生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和商业模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可以有效消除传统公共管理中信息不完全所带来的高公共行政成本，大幅降低公共治理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⑤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城市治理提供了数据采集和分析系统，促进社会资本和社会福利的提升，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⑥

2020年新冠疫情对于数字技术助力大规模突发事件来说尚属首次。面对2020年新冠疫情的考验，各级政府加快数字化转型，我国数字化治理能力在缓解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冲击、调动社会各种资源等方面迅速提高。^⑦ 数字技术可以实现人与人非接触性生产关系的特征在新冠疫情面前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⑧ 通过立足公共数据开放、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在线协同共管以及场景关联下的政策创新，我国数字政府建设逐步探索形成了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路径。^⑨

迅速蔓延的疫情也暴露出数字化治理的短板领域。目前我国数字经济主要面向终

① 刘云：《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国际趋势及中国应对》，《政法论坛》2020年第6期。

② 吴汉洪、王申：《数字经济的反垄断：近期美国反垄断领域争论的启示》，《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2期。

③ 姜奇平：《数字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与定性、定量两种分析框架》，《财经问题研究》2020年第11期。

④ 张泉：《互联网经济“下半场”的垄断危机与管制对策——基于互联网寡头市场动态均衡模型》，《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

⑤ 唐要家、唐春晖：《数据要素经济增长倍增机制及治理体系》，《人文杂志》2020年第11期。

⑥ 师博：《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⑦ 吴静等：《抗疫情助推我国数字化转型：机遇与挑战》，《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年第3期。

⑧ 李韵、丁林峰：《新冠疫情蔓延突显数字经济独特优势》，《上海经济研究》2020年第4期。

⑨ 徐梦周、吕铁：《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数字政府建设：内在逻辑与创新路径》，《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3期。

端消费领域，但是供给端的数字化程度仍然比较薄弱，政府在调拨、调配与周转急需物资方面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① 科层体制下纵向权力结构强化了层级间信息控制，条块分割体制下信息系统建设呈现出碎片化局面；^② 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大数据缺少整合共享渠道，既说明部分地方政府的大数据应用能力有限，也说明我国目前缺少既懂信息技术又懂行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技术人才，以及既懂政府又懂市场的复合型管理人才。^③ 构建政府治理体系要吸收数字技术以重塑组织过程，促进主体协同多元化、信息数据流动化和组织结构扁平化。^④

数字经济不仅是国内政府治理的有力支撑，也是中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有力抓手。数字经济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治理方向、治理内容、治理路径、治理效果等都产生了诸多影响。^⑤ 以2017年中国和其他7国共同发起的《“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为标志，随着数字经济跨区域迅速发展，数字经济治理在顶层设计、规则制定等方面相对滞后问题益发突出，“一带一路”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日益紧迫，^⑥ 全球经济目前面临传统治理模式指导乏力、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不足、G20机制长效化困难等问题。^⑦ 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融入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各国协同合作，构建多层次、跨行业、多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多元混合治理平台，^⑧ 进而形成以多边主义为理念的共同治理、以制度对接为主线的深层次合作、以新型大国关系为引领的对话磋商等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机制。^⑨

四、评论与研究展望

国内学者在数字经济对生产和流通环节的影响问题研究上已经取得了重要进步，

-
- ① 徐峰：《公共卫生危机视域下数字治理的应用及法治化初探》，《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 ② 刘祺：《当代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的梗阻问题与整体协同策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 ③ 王伟玲、吴志刚：《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数字经济发展研究》，《经济纵横》2020年第3期。
 - ④ 谢富胜、潘忆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5期。
 - ⑤ 马述忠、郭继文：《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经济治理：影响解构、特征刻画与取向选择》，《改革》2020年第11期。
 - ⑥ 方丽娟、张荣刚：《“一带一路”数字经济治理逻辑、问题及应对》，《理论导刊》2020年第11期。
 - ⑦ 徐佳等：《全球经济治理困境与中国的参与策略》，《上海经济研究》2020年第1期。
 - ⑧ 陈伟光、袁静：《区块链技术融入全球经济治理：范式革新与监管挑战》，《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 ⑨ 刘航、孙早：《习近平全球经济治理思想的核心内容、生成逻辑与学科价值》，《经济学家》2020年第7期。

然而，一些关键议题研究仍存在争议，有待进一步突破。随着生产和消费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如何摆脱数字消费异化、突破“数字资本逻辑”统治等问题，仍然缺乏有效的研究。对于数字经济对就业模式的改变，不应仅仅关注零工经济这一新用工模式，数字经济对传统就业模式的冲击同样需要研究，劳动力技能结构与岗位需求的匹配程度问题既是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基石，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关注的目标之一。此外，数字经济下人类所有的活动环节都逐渐被数据所记录，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如何参与分配的问题应成为进一步研究的重点：一是数据要素如何在各个社会成员之间分配，二是数据所有者如何凭借数据要素的贡献获得报酬。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数据产权界定，而且关乎新技术下新垄断的出现以及财富的过度集中等问题。

大量研究都支持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契合性，指出了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重点。需要注意的是，高质量发展远不止生产效率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等，它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核心与关键。^① 在我国既有发展基础上，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区域均衡发展、产业垄断等领域的影响与高质量发展的辩证关系都迫切需要更深入的理论研究。相关经验研究表明，虽然数字经济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但是，从区域层面来看，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并且这一差异的缩减速度较为缓慢。^② 例如，对我国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长中游以及成渝这五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特征，城市群间差异是数字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③ 也有研究质疑数字经济对产出效率的贡献，认为我国大部分省份的数字经济运行长期处于无效率状态。^④ 关于数字经济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还需要更深入的理论工作。未来应该在数字经济基础理论、经验研究、提高政策制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方面进一步拓展。

① 习近平在2020年10月26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必须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2020年12月17日，人民网：<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86374649537201202&wfr=spider&for=pc>。

② 宁朝山：《基于质量、效率、动力三维视角的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多维影响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③ 刘传明等：《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中国科技论坛》2020年第3期。

④ 蔡昌等：《中国数字经济产出效率：区位差异及变化趋势》，《财会月刊》2020年第6期。

既有关于国家在数字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研究，尽管不乏创新性的理论研究，利用数字经济的独特运行规律及其对社会经济结构深远影响，揭示国家需要重点面向的政策领域，但也有大量研究只是基于如何解决数字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将国家简单地作为解决阻碍发展问题的工具。这些理论虽然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困境进行了比较明确的刻画，但也因为缺乏对数字经济运动规律的研究而难以对其在经济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从而难以探讨国家作用的根本逻辑、具体机制及其影响。数字经济既是一种新产业形态也是一种新组织形式，它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的变化，社会总资本运动内在矛盾也必然产生新的表现形式。考虑到数字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障碍及其发展所产生的问题既可能是数字经济特殊运行方式的结果，也可能是资本运动更深层次矛盾的新表现形式，如果笼统地将国家作用定位为解决产业发展问题，而不分析产生问题的深层逻辑，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可能既不利于产业本身的长期发展，也影响国家作用的发挥。另外，在研究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时，既应该关注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西方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共同之处，也应该关注到区别，如发达国家政策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以及资本主义数字经济发展遭遇困难的原因，^① 而不应该笼统地将发达国家的实践当作先进经验用于指导中国数字经济发展。

^① 陈文旭、徐天意：《数字资本主义及其批评》，《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1期。

货币金融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马慎萧 田佳禾 黄德威 区铭彦^{**}

历年来，货币金融相关问题都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的重点关注主题。作为经济运行的润滑剂与主动脉，货币和金融涉及经济生活的各个层次，从微观的个人金融、公司金融到宏观的货币政策，从局部的地区金融到跨国的资本流动，与其相关的经济现象数之不尽，所对应的研究文献亦汗牛充栋。而在2020年，围绕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的相关讨论是政治经济学界研究重点关注的内容。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六稳”“六保”成为202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关键词，“稳金融”也是保障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的重要举措。一方面，中国要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另一方面，要持续推进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在支撑经济稳增长的基础上，严守风险底线。立足这样的实践要求和共识，政治经济学界就货币金融问题的理论难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展开了重点研究，以期为中国未来的货币金融实践提供启示和借鉴。

一、货币金融理论问题

2020年，在货币金融相关的理论领域，学者们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一是结合2020年全球性的经济停滞乃至收缩，研究金融周期与经济危机的相关关系，进而从学理上提出可能的对策；其二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

^{*} 本文为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项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前沿研究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的探索”（批准号19GJJC011）的阶段成果。

^{**} 马慎萧，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田佳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黄德威，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区铭彦，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探讨货币职能与货币权力等根本问题，厘清概念、总结现象并进行分析；其三则是延续了2019年以来由美国主流经济学界掀起的对后凯恩斯主义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 MMT）的讨论热潮，学者们热议主流和非主流货币理论之间的矛盾，从现代货币理论出发提出了一些替代性、启发性的观点。

（一）金融周期与经济危机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周期与经济危机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在货币金融领域内多年来长盛不衰的热点话题。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冲击，学者们结合时事热点、基于相关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

李黎力从思想史角度出发，回顾并介绍了后凯恩斯主义的两类内生经济周期波动，并与主流的外生周期理论作了对比。与主流理论相反，后凯恩斯主义特别强调货币和金融的非中性，以及由金融的不稳定性引发的内生周期与经济危机，而非把危机视作外生冲击。文章提出，主流理论未来或许会在模型中借鉴吸收内生经济周期的观点。^① 陈昆亭、周炎介绍了西方近年来发展起来的“金融经济周期理论”（Financial Business Cycle, FBC），总结了理论的发展背景、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危机的解读，探讨了基于该理论的长期稳定金融政策。^② 在具体模型构建的尝试上，赵燕菁试图将货币和经济增长问题整合到同一个理论模型中，对主流增长理论进行改进。^③ 该研究体现了部分后凯恩斯主义有关存量流量一致和内生周期的思想，却没有能够更主动地吸收后者的养分。

新冠疫情这一“黑天鹅”事件之后，学者们就如何维持金融稳定、恢复经济增长也进行了讨论。范从来分析了长期保持金融稳定的原因，指出金融改革的双轨制至关重要。^④ 史正富提出，促进经济发展宏观战略投资需要可靠的金融体系支持，后者则可以由“货币发行双轨制”来保证稳定，也就是在现有体系之外，由政府向战略规划直接注入“功能性货币”。^⑤ 这种建议带有典型的现代货币理论色彩，所谓“功能货币”也就是现代货币理论中债务驱动货币和功能财政的翻版，其具体效果如何，有待进一步探讨。

① 李黎力：《货币与经济周期：后凯恩斯主义的逻辑》，《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5期。

② 陈昆亭、周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西方金融经济周期理论货币政策规则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③ 赵燕菁：《现代增长与信用货币——一个“双螺旋”增长假说》，《学术月刊》2020年第8期。

④ 范从来：《中国的金融稳定是如何实现的？》，《政治经济学报》2020年第1期。

⑤ 史正富：《功能货币论与货币发行“双轨制”》，《政治经济学报》2020年第1期。

（二）货币职能与权力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中所定义的货币基本职能出发，探讨货币在现代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各国政府与之相应的政策手段和政治目标，长期以来都是政治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

蒋海曦、余赛男评述了大卫·哈维的货币理论，并将其概括为一种货币权力理论。她们指出，哈维把货币视作一种储存社会权力的工具，是“权力拜物教”的基础和符号，并且由于货币可以在私人手中集中、累积和传递，带来了社会权力的集中，将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然而哈维为此提出的方案是改良式的、空想主义的，这导致他的理论不能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①

哈维将货币视作战力的观点，显然直接来源于马克思。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一定量的货币本身就代表着对一定量商品的占有权和支配权，在劳动力成为商品和货币成为资本以后，货币（资本）的所有者就具有了对劳动力商品的占有和支配权力。“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特性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② 这种权力形成了哈维所关怀的“货币权力拜物教”的基础，他意识到了其中的矛盾，但是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通过某种“机械降神”式的技术进步，让货币权力集中于某些个人或团体手中并且代代相传的问题被自然地解决。正如蒋海曦、余赛男所批评的那样，其没有能够将对现象的批判上升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的高度。

在更具体的问题上，现代主权国家作为货币的发行方，可以通过自身的政策工具来影响货币数量，因而拥有了从货币对商品的占有权衍生而来的一系列权力。冯永琦、刘韧指出，在货币的几大职能中，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这三种职能是货币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派生职能，并不是货币之所以成为货币的前提，但是它们的存在让货币的生命更有活力，并直接关系到主权国家的货币权力，关系到一国的国际金融话语权。^③ 陶士贵、亓桂萍的研究表明，不同主权国家的货币在国际上的地位并不相同，所具有的权力也并不对称，这使得部分国际货币具有了一种新的

^① 蒋海曦、余赛男：《当代货币的权力：大卫·哈维的货币理论研究》，《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8页。

^③ 冯永琦、刘韧：《货币职能、货币权力与数字货币的未来》，《经济学家》2020年第4期。

职能：国际制裁手段。文章以美国为例，分析了美国通过掌控货币发行量、流通渠道、汇率和利率水平、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等方式，行使国际制裁手段职能的现实案例。陶士贵还指出，美国通过这一手段，将国际金融活动纳入其国内管辖范畴，取得了霸权红利。^①

两类研究中虽然都提到了权力，但是对权力的定义并不相同：前者更强调的是货币本身所代表的权力；后者强调的则是国家在其统辖范围内拥有的权力，是一国的货币主权和经济主权。后一种对国家货币主权的强调，在过去一年热火朝天的有关现代货币理论的论争中也常常出场。

（三）现代货币理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实行了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但该政策组合的有效性却存在争议，进一步引发了对主流货币理论和政策的反思。2019年，一种关于货币金融的非正统理论突然受到了部分美国政客的追捧，继而掀起了美国政界、学界和金融界正反双方的大论战，现代货币理论也由此进入了主流经济学者的视野。受国际学术潮流影响，国内学者近两年也围绕现代货币理论进行了大量讨论。从立场来看，偏向新古典正统经济学的学者大多对现代货币理论持批评态度，而后凯恩斯主义及其他非正统经济学的同情者则多持肯定或中立态度。我们将在本节对相关讨论进行简要回顾。

张晓晶、刘磊将现代货币理论的三大支柱概括为“货币国定论”“财政赤字货币化”和“最后雇佣者计划”，肯定了其思想的启发性，并从主流经济学的视角提出批评，认为现代货币理论在理论的形式化和模型化上还存在缺陷，其自身的理论逻辑也不能圆满自洽。^②孙国峰的批评则更为尖锐，他认为现代货币理论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在实践中的应用十分危险，是“开历史倒车”，并将德国魏玛政府时期的恶性通胀视作现代货币理论的直接后果。^③

作为现代货币理论最早的推介者，贾根良为了回应相关争议，在《学术研究》杂

① 陶士贵、亓桂萍：《货币职能视角下货币权力非对称性：表现与影响》，《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10期；陶士贵：《主权国际货币的新职能：国际制裁手段》，《经济学家》2020年第8期。

② 张晓晶、刘磊：《现代货币理论及其批评：兼论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的融合与发展》，《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7期。

③ 孙国峰：《对“现代货币理论”的批判》，《中国金融》2019年第15期；孙国峰：《现代货币理论的逻辑错误》，《比较》2019年第6期。

志组织了一次专栏，以澄清主流学界对现代货币理论的误解，打破“稻草人谬误”。^①在专栏中，贾根良和何增平、李黎力针对批评，回应了现代货币理论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是否混淆了财政与金融等问题；王娜、马国旺也根据现代货币理论的相关思想，对理解货币政策、贸易赤字提出了替代性、启发性的观点。^②作为对这场辩论的补充，贾根良、何增平回顾了国内外主流、非主流学派经济学者围绕现代货币理论展开的争论，指出现代货币理论为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在未来也有可能对美国的实际政策产生影响，值得国内学者进一步关注。^③

在辩论之外，也有一些研究从较为中立的观点出发，探讨了现代货币理论的启发作用。王娜、赵璐雨指出，现代货币理论首先对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体系构成了挑战，颠覆了撒切尔夫人提出的“别无选择”论，为探讨替代性的政策方案提供了想象空间。^④袁辉认为这场理论界的论争本身就颇具思想意义，能增进我们对经济运动的理解，我国的金融改革也可以批判性地吸收相关思想。^⑤张明、刘瑶则提出，现代货币理论虽然也有对中国的相关分析、其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但是由于其固有的缺陷，难以直接被用于指导我国经济建设实践。^⑥

（四）关于未来探索的展望

现代货币理论带来的冲击深深影响了学者们关于货币金融理论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2020年在货币金融领域内最值得关注的研究就是围绕着它的一连串争论。无论是讨论理论本身，还是在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国际货币与国家主权等具体问题研究上，都有现代货币理论的影子。

例如，当货币金融问题与国家概念相联系的时候，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主要落在了“权力及其边界”上。在关于现代货币理论的争论中，正反双方的学者都认可的一个观

① 贾根良：《对现代货币理论等非主流经济学说需做深入研究——现代货币理论研究专栏导语》，《学术研究》2020年第2期。

② 参见：贾根良、何增平：《现代货币理论与通货膨胀》，《学术研究》2020年第2期；李黎力：《政府、银行与现代货币——现代货币理论真的将财政与金融混为一谈了吗》，《学术研究》2020年第2期；王娜：《为什么货币政策经常失灵——基于现代货币理论对主流货币理论的批判》，《学术研究》2020年第2期；马国旺：《从现代货币理论看美国贸易逆差的本质和成因》，《学术研究》2020年第2期。

③ 贾根良、何增平：《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对现代货币理论的争论》，《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6期；贾根良、何增平：《现代货币理论大辩论的主要问题与深层次根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④ 王娜、赵璐雨：《现代货币理论对新自由主义“别无选择”的颠覆》，《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10期。

⑤ 袁辉：《现代货币理论视域下的政府债务及其影响：争论与启示》，《求是学刊》2020年第5期。

⑥ 张明、刘瑶：《现代货币理论：现状、实践、争议与未来》，《学术研究》2020年第9期。

点是，由于货币在经济中执行的基本职能，国家超量发行的货币将会与私人资本争夺实体经济的产出。这种情形下，国家意志其实是使用政策手段对本国产品进行再分配。双方争议的重点就在于，这种基于货币职能的权力，其边界何在：是以维持货币信用和政府平衡预算为纲，还是以达成政府政策目标为纲？遵循同样的思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化程度更高的货币，在国际货币等级金字塔中居于更高层，也更有能力将国内行使货币主权的手段在国际上复制，乃至形成货币的“国际制裁”这一新职能。

现代货币理论发轫于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随后形成了自身独立的理论框架，不仅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和货币数量论存在争议，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其他学派的观点也有龃龉。这一炙手可热的理论可以从两个层次上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者提供启发。

一方面是研究方法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尽管现代货币理论和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并不全然相通，但是其蕴含的针对现代经济运行的思考与洞见值得我们学习吸收。另一方面是对研究结果的宣传上，现代货币理论之所以能掀起理论界的波涛，其根源还在于美国政界和金融界基于实际需要，将其作为某种政策理念的理论基础进行宣传。这提醒我们，一种理论要想扩大影响力，就必须扎根于实际经济需要，研究世人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而不是关起门来自娱自乐。

在对待现代货币理论的态度上，我们也应当站定理论立场，实事求是，批判地学习、吸收、运用。不能因为该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属于经济学的非主流派，共同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就将其引为盟友，一味地认可它；也不能因为它的主要创立者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不赞同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就片面地否定它。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现代货币理论为货币金融理论问题的池塘注入了活水，其分析思路也可以很好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相结合，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养料。我们期待更多学者针对经济、金融学界所共同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政治经济学的声音。

二、资本主义货币金融实践研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从 70 年代中后期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变化，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伴随着日益成熟的金融技术，金融资本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经济金融化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而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金融霸权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和控制他国经济发展。并且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愈加紧密，在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冲击下，各国的货币政策不再独立，而是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各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变得更加困难。特别是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肆虐，世界经济发展遭受重创，这也使得这些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因此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就成为了学界的热点。

（一）金融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金融化倾向，经济金融化在增加经济资源流动性的同时，也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投机性和风险性，这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广泛关注。陈享光、黄泽清指出，伴随金融化发展，金融化资本不断积累，并逐渐突破产业资本循环的约束，在金融领域、投机性非生产领域以及全球资源配置领域中循环和扩张，使得纯粹虚拟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这必然会抑制产业资本积累和实体经济发展，同时，金融化资本的高流动性、投机性和虚拟性将加剧金融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①李连波、陈享光表示，金融化的发展使主导资本形态由金融资本转变为金融化资本。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实质是金融化资本日益广泛地渗透到非物质生产领域，将家庭和个体作为榨取利润的对象，这一转变是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表现，并深刻影响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形式。^②俞使超研究发现当前资本主义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发展，已经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异化，并强化了世界经济结构体系的依附结构。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产业“去工业化”、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不断扩大，以及金融资本的全面垄断。^③

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指出，信用作为本质的、发达的生产关系只有在以资本为基础的流通中才会历史地出现。任瑞敏认为，就本质而言，当代资本的金融化是在扩大了信用基础上对流通领域的重塑，是资本为克服自身限制而进行的超越，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然而，流通中的限制根源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资本的金融化并不能彻底消除流通中的限制，虽然金融的社会性从形式上调和生产资料私有制

^① 陈享光、黄泽清：《金融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兼论“脱实向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② 李连波、陈享光：《从金融资本到金融化资本——日常生活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6期。

^③ 俞使超：《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经济效应——基于对过度金融化的批判》，《社会科学家》2020年第11期。

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但会导向一个虚拟化的经济模式，从而实质加剧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① 宁殿霞则发现在金融化世界中，由于非生产劳动的作用，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虽然是一个事物加速发展的两个方面，然而这两个方面却因为金融资本“看不见的腿”的作用，而使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像正负电荷一样向两极流动，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更容易突破国家界限进行积累，即资本积累主要在发达国家进行，而与此相对应的贫困积累却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出来。^②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化浪潮是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下逐步兴起的，但经济金融化转型也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裴祥宇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显著扩大。美国经济金融化通过降低工会议价能力、提升食利者和管理层收入水平、增强消费信贷进而恶化普通居民财富结构等多种手段，对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产生了重要影响。严重的贫富差距极大地削弱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力量，造成国内政治力量分化，这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主体制的根基。^③ 武海宝发现“金融化”转型在法国具体表现为实体经济萎靡不振、产业空心化、虚拟化和债务化等特点。法国经济的金融化转型带来了普通民众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社会福利被削减、生活日益贫困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黄马甲运动”就是这种社会矛盾积压到一定程度后的总爆发，它是法国经济金融化模式的必然产物。^④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使得西方国家面临着多重危机。张慧君、黄秋菊认为，西方国家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超级量化宽松政策使金融化加剧，社会不平等进一步扩大。一方面，金融化通过资产价格膨胀，使收入向拥有更多金融资产的群体集中；另一方面，金融化导致低收入群体在家庭借贷的刺激下扩大消费，提高了家庭债务水平，这将进一步扩大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因此这有可能引发更严重的金融动荡和经济萧条。^⑤

（二）金融霸权对世界经济的支配

随着资本主义金融化趋势的发展，在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金融霸权发挥着举足

① 任瑞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资本金融化的内在逻辑——基于资本在流通中的限制与超越》，《经济学家》2020年第9期。

② 宁殿霞：《金融化世界中的非生产劳动》，《经济纵横》2020年第11期。

③ 裴祥宇：《金融化背景下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及其影响》，《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④ 武海宝：《法国经济的金融化与“黄马甲运动”的兴起》，《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4期。

⑤ 张慧君、黄秋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调适——兼对新自由主义体制弊端的批判》，《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5期。

轻重的作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金融霸权对其他经济主体进行掠夺和剥削，并通过推行霸权主义控制其他领域，进而获得霸权利润，这对被支配国家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谢富胜指出，美国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实现全球金融掠夺，是当今世界金融自由化秩序的缔造者、维护者和最大受益者。首先，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可以带来国际铸币税收入。其次，美国不断通过金融制度优势和娴熟的金融运作手段在金融市场上套利，实现对南方国家公司和个人财富的剥夺。最后，美国金融资本大规模介入南方国家私有化过程，收购大量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来获得大量垄断性租金。^① 刘爱文、陈洪良研究发现，在美国金融霸权基础债务转置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加速了资本去管制化进程。债务美元极大地扩张了作为新型帝国的美国的对外权能，因而，建基于债务美元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和操控性。^② 吴茜指出，特朗普政权推行经济霸凌主义来打压其他国家，通过对外采取一系列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肆意挑起全球贸易争端，目的是让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加强对他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③ 李策划、李臻表示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依靠美元的世界货币职能，控制全球生产要素流动，成为凌驾于主权国家的“资本帝国”。世界各国解除外汇管制、放松金融市场管制、提高投资自由化，使得美国金融垄断资本能够控制和支配全球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剥夺和转移世界各国创造出来的价值和财富，获取高额垄断利润。^④

金融制裁作为经济制裁的重要形式，成为金融霸权国家实施报复措施的重要手段之一，并且金融制裁显现出明显的单边主义和权力不对称的霸权主义，而美国是金融制裁的主要发起国。张颖等通过制裁国与目标国间、国际各国与目标国间及目标国内部这三条路径分析了金融制裁传导机制：一是制裁国一方面采取停止援助或贷款、冻结资金、暂停金融交易等措施限制目标国投融资渠道，另一方面利用 SWIFT 与 CHIPS 组织切断目标国美元使用渠道，影响目标国经济正常运行；二是国际各国迫于制裁国的政治压力会减少对目标国的贷款及资本投资，影响目标国经济正常运行；三是目标国外来资金流减少促使国内利率上升，投资水平下降，同时外币供应量减少易

① 谢富胜：《当代帝国主义研究的三种范式》，《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1期。

② 刘爱文、陈洪良：《美国金融霸权基础虚化的逻辑演进及其危机指向》，《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

③ 吴茜：《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及其制度转型》，《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④ 李策划、李臻：《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全球积累逻辑下贸易战的本质——兼论经济全球化转向》，《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

引发本币贬值，国际清偿能力下降，最终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家主权信用下降。^①在具体制裁案例中，陶士贵、高源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发现，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经济金融制裁，导致俄罗斯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经济衰退、资本外逃、外汇储备骤减、投资环境恶化、通货膨胀飙升等。并且金融制裁累积的影响会逐年递增，即使是采取有效的反制裁措施，在短时间内也只会减缓制裁对经济的进一步影响，而无法消除制裁对经济已经产生的消极影响。^②姜薇、陶士贵也基于合成控制法研究发现，美国通过阻碍伊朗石油出口、恶化伊朗国内消费和投资环境、破坏伊朗贸易关系和条件等三个方面对伊朗的金融制裁，不仅导致伊朗GDP总额和增长率下降，同时加剧了伊朗经济的波动性。^③

（三）资本主义国家货币政策研究

当前，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等系列难题，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大背景下，对于资本主义货币政策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马理、马欣怡提出影子利率可以作为金融危机背景下反映宽松货币政策影响效应的替代指标。他们基于欧洲央行与欧元区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发现，影子利率下降虽然促进了就业与出口的增加，但并没有对产出与物价产生有益的推动作用。这说明欧洲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传导渠道存在阻滞，通过分析发现主要是资产价格传导途径和银行信贷传导途径不通畅。^④郑尊信等采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将商品库存因素和金融化因素纳入宏观经济理论框架，结合菲利普斯曲线和泰勒规则，建立了新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模拟结果表明，货币扩张驱动商品库存增加、便利收益下降，进而促进商品投资或质押融资的金融化交易，甚至触发贸易融资套利行为，而商品金融化反过来使得货币政策效果更集中于库存等存量资产形成的泡沫，而非实体经济。货币政策与经济金融化之间的交互作用加剧物价波动。^⑤战明华等则构建了数字金融如何通过利率与信贷两个传导渠道机制影响货

① 张颖、刘晓星、柴璐莹：《金融制裁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基于全球金融制裁数据的实证分析（1945—2017）》，《金融论坛》2020年第1期。

② 陶士贵、高源：《西方经济金融制裁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20年第11期。

③ 姜薇、陶士贵：《金融制裁对目标国经济的影响——来自合成控制法下伊朗的证据》，《金融论坛》2020年第2期。

④ 马理、马欣怡：《理解欧洲宽松货币政策传导的新视角》，《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29日。

⑤ 郑尊信、姜春艳、徐晓光、朱福敏：《货币政策、商品金融化与物价波动》，《经济研究》2020年第7期。

币政策整体效果的理论模型。其研究发现，一是数字金融发展总的来说提高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其主要表现是放大了产出关于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幅度、减少了滞后时段和弱化了“价格之谜”；二是货币政策效果提高的深层机理，主要是数字金融对利率渠道的放大效应要强于对信贷渠道的弱化效应。数字金融发展对信贷渠道的弱化作用主要体现在完善了银行外部融资市场上，但对企业外部融资市场的完善影响不大。^①

基于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相关论点，李善燊、王君萍分析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质上是通过调节剩余价值的分配关系发挥作用，房价为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分配创造了新的载体，但同时也加剧了货币政策调节的矛盾，房地产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也加大了信用体系与其货币基础之间的冲突。由于货币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围绕房地产对剩余价值的过度攫取，产业资本所得剩余价值份额相对不足，资本脱实向虚，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可持续运转机制遭到干扰和破坏。^②

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在不断加强，尤其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陈雨露认为负利率政策实际上是对基于债务和资产价格泡沫增长模式的维护和鼓励，可能会造成内部金融脆弱，对外在全球央行间产生外溢效应，诱发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和货币危机。当前的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是基于金融危机的政策，容易引发竞争性货币贬值和金融动荡，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可能会受到冲击。^③ 谭小芬、邵涵指出，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大规模资本流入新兴市场，造成这些国家利率下降、汇率和资产价格上涨，最终导致经济过热。美国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的溢出效应大小主要取决于接收国的贸易发展水平、汇率制度、金融发展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对于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存在异质性。^④ 尤阳等发现无论是宽松时期还是紧缩时期，美联储货币政策冲击大多都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即在宽松货币政策时期，发达国家通过大规模量化宽松，降低汇率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商品转嫁危机；在紧缩货币政策时期，发达国家通过严厉的贸易惩罚措施压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逼迫发展中国家

① 战明华、汤颜菲、李帅：《数字金融发展、渠道效应差异和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经济研究》2020年第6期。

② 李善燊、王君萍：《房价内生与货币政策危机——基于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

③ 陈雨露：《当前全球中央银行研究的若干重点问题》，《金融研究》2020年第2期。

④ 谭小芬、邵涵：《美国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溢出效应：资本流动视角》，《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年第6期。

加大进口，通过攫取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来发展经济。^①

三、社会主义货币金融实践研究

货币金融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中也十分重要。国内理论界研究和揭示社会主义货币金融问题具有体系化和本土化的特点，在研究货币金融一般问题的同时结合我国的货币金融实际和实践抽象提炼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理论体系。因此，在持续跟踪的基础上，今年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货币金融实践，报告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防范经济运行“脱实向虚”；二是完善金融治理，理性发展金融市场；三是加快推动我国“十四五”时期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

（一）防范经济运行“脱实向虚”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不论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促进实体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防范经济运行“脱实向虚”，扭转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赴广东考察调研时指出，“从大国到强国，实体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② 习近平总书记一向高度重视经济发展“脱实向虚”问题，体现了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更明确了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深刻把握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新要求，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③ 2020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指出，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必须采取措施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以鼓励互联网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④ 防范经济运行“脱实向虚”，才能进一步推动经济高

^① 尤阳、马理、何云：《以邻为壑：为什么“吃亏”的总是发展中国家——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的差异化溢出效应与风险防范研究》，《金融经济研究》2020年第4期。

^② 《防止脱实向虚，习近平再次为实体经济撑腰》，《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3日。

^③ 《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人民日报》2020年8月24日。

^④ 《2020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中国经济发展新航向》，《中国青年报》2021年1月4日。

质量发展，才能稳步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关于经济运行“脱实向虚”问题的内容与事实的研究，学者们尝试从不同方面来解释造成“脱实向虚”问题的根源。刘晓欣和田恒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指出“脱实向虚”可以理解为实体经济部门与虚拟经济部门结构性失衡，大量资金滞留于虚拟经济部门。虚拟经济的规模扩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实体经济实现积聚和扩张的重要保障，虚拟经济发展不充分反而会抑制实体经济的增长。进一步地，通过相关模型和数据指出，中国近年来的确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脱实向虚”问题，其特征事实是产业资本虚拟化和虚拟资本垄断化。^①姜英华认为，虚拟经济既诞生和孕育于实体经济，同时又有反噬和统制实体经济的自发倾向，造成两者扭曲背离和失衡错配的博弈困局。分析经济“脱实向虚”的本质和内在机理可以发现，一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自然倾向可以归因于四个方面：资本作为生产关系的本质、资本不断寻求价值增殖的属性、资本永无止歇的流动性偏好和剩余价值资本化的积累逻辑。^②石凯等以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和现行的SNA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基础，并且基于中国现实进行经济虚拟化测度体系的测算，提出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合理界限，并且指出我国经济系统中结构性虚拟化程度呈提高的趋势，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逐渐脱离良性互动的合理范围。^③冯涛等认为，我国经济“脱实向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资源在金融体系内自循环而非进入实体经济；二是具有融资优势的企业将低息金融资源转贷给不具有融资优势的企业而成为“影子银行”；三是实体企业将资金投入金融资产或房地产中，对生产性投资形成挤出效应，这体现为“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脱实向虚”现象导致金融发展阻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④

虚拟经济诞生于社会化生产程度的提高以及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出现以来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体现之一，因此，分析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需要紧紧围绕它们之间的矛盾来进行。周绍东和潘敬萍认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实体经济决定着虚拟经济的发展水平和

① 刘晓欣、田恒：《中国经济从“脱实向虚”到“脱虚向实”》，《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8期。

② 姜英华：《习近平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益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基于资本逻辑视角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③ 石凯、彭刚、朱莉：《中国经济虚拟化问题的测度——基于SNA的视角》，《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7期。

④ 冯涛、吴茂光、张美莎：《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金融“脱实向虚”视角的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20年第10期。

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双重作用，它既能为实体部门提供有效的融资工具，也能引发金融领域内的过度投机。金融属于价值分配领域，它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和物质生产活动而独立发展。因此，我国需要在实体经济部门和虚拟经济部门之间合理配置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正确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①肖磊通过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提出，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根源在于实体经济的内在矛盾，这是市场经济客观的必然结果，在本质上属于“生产过剩”的表现形式。因此，防范我国经济走向“脱实向虚”，可以通过在总体顶层设计、过剩经济调节机制、利润增长机制、泡沫消化机制、货币流通机制和政府监管机制等方面采取措施，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②

防范经济运行“脱实向虚”需要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出发，理解自身工业生产的现状，进一步地需要重视金融系统对现代实体经济的影响。刘晓欣和田恒通过研究中美两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工业背景差异，认为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背景是美国实体经济处于价值链高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引领和对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不加约束，而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背景是我国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大而不强。因此，要明确国内产业结构调整 and 对外金融深度开放是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同时要正确认识纠正“脱实向虚”倾向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③刘新刚认为金融问题已经极大地改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类当前的生存状态，要合理利用金融工具达到其服务人类而非敌视人类的目的。当前我国正致力于探索金融发展的中国方案，应该站在马克思的高度去解决马克思所处时代尚未出现的经济金融虚拟化问题，并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角度探讨具有实践性的金融发展道路。在当前中国语境中，要在深刻了解虚拟资本内在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探索在经济层面对虚拟资本的治理方案，解决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理论问题。^④刘志国和胡翔认为，信用膨胀的加杠杆过程加速了货币资本的“脱实向虚”和资金利用效率低下。根据马克思的货币与信用理论，信用与货币具有内生性，在某种程度上金融资本可以摆脱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完成资本积累，这个过程是信用膨胀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加杠杆的过程。同时，去杠杆的本质是收缩信用的过程，经常会伴随着较大的金融风险，故必须重视我国去

① 周绍东、潘敬萍：《现代产业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读》，《财经科学》2020年第4期。

② 肖磊：《信用创造、虚拟资本与现代经济运行——兼论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12期。

③ 刘晓欣、田恒：《中国经济从“脱实向虚”到“脱虚向实”》，《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8期。

④ 刘新刚：《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范畴及其中国语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2期。

杠杆过程中可能触发的重大风险。^①由此可见，我国是靠实体经济发展起来的，也必将依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我国要采取措施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止“脱实向虚”。壮大实体经济不仅是提振中国制造业整体水平之需，也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所在。

此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认识以及“脱实向虚”内涵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判定，许多学者借鉴延续对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现象的分析思路，忽略经济制度层面的差异，借用“金融化”的内在逻辑理解“脱实向虚”内涵和发展趋势，或是将我国经济“脱实向虚”这一极端经济现象作为研究前提，直接对其表现、原因及动机加以论证。我们认为，“金融化”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用以分析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领域系统性变化的范畴，而“脱实向虚”是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面临的问题，两者在现象层面存在相似性，但由于产生的经济制度基础不同，是存在本质差别的，对这两个范畴的使用应该建立在更加规范的定义和严谨的讨论基础之上。

（二）提升金融治理能力

完善金融治理，让金融市场理性发展，从而推进我国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2020年10月，王岐山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开幕式上指出，当前全球金融经济环境变化剧烈，既要坚守底线，也要灵活应对风险挑战，要坚持金融创新与加强监管并重，在鼓励金融创新、激发市场活力、扩大金融开放与提升金融监管能力之间寻求平衡，寓管理于服务之中。^②2020年10月出台的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金融业的最大优势，这能够确保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是抵御各种风险挑战、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根本保障，是新中国金融事业从无到有、

^① 刘志国、胡翔：《去杠杆与金融风险防范——基于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分析》，《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② 《王岐山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开幕式上发表致辞》，《人民日报》2020年10月25日。

^③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封闭到开放不断发展壮大的决定性因素。^①当前,我国经济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迈入深水区,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只有完善金融治理,让金融市场理性发展,推进我国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完善我国金融治理体系、提高我国金融治理能力,对于我国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大全局具有重要意义。宋立认为我国金融发展仍然相对滞后、金融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现实,是由于金融治理体系不完善,金融治理能力不适应,制约了金融发展和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国际经验教训反复表明,金融治理不完善是金融服务不到位和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金融制度体系和金融治理体系,培育理性的金融市场主体。^②王朝弟指出,完善金融治理和金融监管能力,一方面需要培育理性和有效治理的市场主体、深化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另一方面,要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务必以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为健全金融治理体系的根本目的,以提高“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作为健全金融治理体系的目标,以强化金融监管作为提高我国金融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以发展金融科技作为提高我国金融治理能力的重要支撑。^③吴晓求等学者认为,中国所构建的是市场主导型的现代金融体系,所以在监管重点上,金融监管将更加关注透明度风险在整个风险结构中的核心位置;在监管模式上,将实现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协调;在监管架构上,将基于“一委一行两会”架构继续发展与完善;在监管方式上,将更加注重智能监管。^④

就如何完善金融治理、让金融市场理性发展而言,杨慧玲和张力基于中国经济动能转换的金融—技术路径指出,构建稳定的金融环境为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前提和保障,而防范风险的根本途径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为了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及其国际竞争力,我国将持续深化和推进金融开放作为金融发展的基本战略。^⑤魏益华和吴子熙认为,金融风险需要金融监管的引导和规范,金融监

①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光明日报》2020年1月7日。

② 宋立:《推进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金融》2020年第3期。

③ 王朝弟:《以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为抓手——推进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红旗文稿》2020年第12期。

④ 吴晓求、许荣、孙思栋:《现代金融体系——基本特征与功能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⑤ 杨慧玲、张力:《技术周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稳定金融——中国经济动能转换的金融—技术路径》,《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5期。

管需要明确监管标准，而监管标准又受到监管理念的影响，故我国要以普惠金融为指导设定金融监管标准，正确对待金融安全和金融创新。金融监管理念对金融制度变迁具有直接影响，如何处理金融安全和金融创新的关系是金融监管理念的核心，在有效监管和治理的前提下，金融创新可以很好地推动金融发展。^① 陈昆亭和周炎以西方金融经济周期理论及其货币政策规则为基础，认为我国需要在以价值体系稳定为目标的政策规则与宏观金融审慎的框架下，将更多的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纳入宏观监管的覆盖范围，并且和稳定价值的货币政策充分协调配合。^② 杨世伟认为要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就必须坚持推进我国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金融强国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为战略目标，以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为中心任务，坚持“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和市场导向”的金融改革发展安全的正确方向。^③ 宋立认为改革完善金融管理制度，首先要加强金融公司机构治理、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同时加强金融行业自律管理和以审计与财务监督为核心的外部监督等金融治理框架；其次要推进金融治理能力建设，着力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能力；最后要完善金融法律法规支撑、金融基础设施支撑、人力资源支撑、金融科技支撑、社会信用体系和金融生态环境支撑。^④ 因此，我国要以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为健全金融体系的根本目的，集中精力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切实推进金融治理体系和金融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加快推动我国“十四五”时期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

在过去 40 年的金融变革中，中国在资源配置方式、风险分散机制和监管模式改革等领域朝着现代金融方向推进，在开放和国际化方面秉承试错性探索的原则，积极拥抱金融科技带来的变革。“十四五”规划时期，中国在面临开放加速、金融科技实践的冲击的同时，将延续市场化的方向进行结构性改革，顺应技术性特征和国际化趋势，探索适合自身的大国金融模式。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指出，新发展格局下的金

① 魏益华、吴子熙：《普惠金融创新模式下网络借贷发展困境的制度因素分析》，《求是学刊》2020 年第 2 期。

② 陈昆亭、周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西方金融经济周期理论货币政策规则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1 期。

③ 杨世伟：《习近平关于金融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探析》，《经济学家》2020 年第 9 期。

④ 宋立：《推进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金融》2020 年第 3 期。

融发展可着眼于四个层次：一是通过金融科技引领，推动金融体系集成创新，服务第四次工业革命；二是立足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循环路径和战略基点，着力提升金融服务能力；三是以内外循环相互促进为目标，深化金融业高水平开放，同时注意防控系统性风险；四是结合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优化金融改革开放布局。^①另外，“十四五规划”指出，应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同时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推进金融双向开放，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②由此可见，当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

构建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现代金融体系是我国近年来金融实践产生的新认识。吴晓求等认为，中国所构建的市场主导型现代金融体系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实现了规模扩大和更高效率，中国构建的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要素是高度市场化、高科技化、开放性、更强的风险分散能力和更高的金融效率。基于中国金融的发展与变革，现代金融体系包括的功能特征应该是：融资与财富管理功能并重，支付清算功能的升级和金融资产的跨时空配置。^③唐松认为，中国的金融崛起开辟了崭新的金融发展与改革道路，向世界贡献了具有鲜明中国本土特色的智慧经验。同时，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强国金融建设，要坚守金融本源，确立金融改革根本方向；推动金融转型，强化金融改革的基本路径。具体而言，中国的强国现代金融体系是具备高科技内涵的金融体系，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更加关注科技基因与金融基因的融合；也是具备高度开放特征的金融体系，通过开放所带来的压力能够倒逼金融体制改革；也是具备鲜明本土特色的金融体系，在国情需求中汲取国外先进经验，这才是实现金融改革稳步前进的坦途正道。^④

我国资本市场结构单一、金融体系效率不高、难以满足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投融资需求的现状，决定着我国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功能。张亦春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液，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不仅能优化资源配置，而且有助

① 陈雨露：《“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金融改革发展》，《中国金融》2020年第1期。

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

③ 吴晓求、许荣、孙思栋：《现代金融体系：基本特征与功能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④ 唐松：《新中国金融改革70年的历史轨迹、实践逻辑与基本方略——构建强国现代金融体系》，《金融经济研究》2019年第6期。

于分散风险，服务更为广泛的经济个体。要遏制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的持续上升以及风险的过度集中，就必须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充分分散风险，增强融资结构的稳定性。^① 易宪容认为，发展和完善中国资本市场的要求是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目前中国的金融资源配置不是由价格信号来引导，而是由政府权力来配置。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的当事人会把其行为的成本转移给社会，导致资本市场投机炒作盛行。因此，要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一套严格的标准来改善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通过制度安排促进公司治理结构完善。^②

当今世界，各国在经济金融方面日益紧密相连，因此深化金融对外开放十分必要。于春海和张斌从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市场化两个维度考察了金融开放、货币政策调控效力与经济稳定的内在关联，验证了金融开放影响经济稳定的双重路径的理论逻辑，认为金融开放能够直接作用于外生冲击的传导和扩散，从而直接影响经济稳定；另外，金融开放能够改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力，从而间接影响经济稳定，可以通过金融开放的路径选择，利用制度安排直接消减部分外生冲击的影响。^③ 丁东铭和魏永艳认为，优化我国对外开放营商环境是继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奠基石和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在要求，是抓住并用好重要发展机遇期的必然选择。^④ 盛松成和张承惠等学者认为，金融开放最大的风险是中资金融机构竞争力不足，目前应重点关注短期资金大量流入和人民币过快升值问题，要充分认识到开放的风险，深化体制机制配套改革。^⑤ 谢贤君和任晓刚认为，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制度创新具有发挥先行先试效应，深刻影响金融开放创新、推动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价值。未来应扩大服务贸易对外开放，加强金融风险防范管理体系建设，深化金融对外开放，以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建设金融基础设施“硬件”与“软件”。^⑥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金融科技的发展在促进金融效能提升的同时必将引发新的金融风险，因此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深化金融科技发展过程通常是一致

① 张亦春：《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几点思考》，《中国金融》2020年第1期。

② 易宪容：《构建适应经济增长新模式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22期。

③ 于春海、张斌：《金融开放、货币政策调控效力与经济稳定》，《国际金融研究》2020年第11期。

④ 丁冬铭、魏永艳：《优化对外开放营商环境进程中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经济纵横》2020年第5期。

⑤ 盛松成、张承惠等：《中国金融开放的形势研判与风险预警讨论》，《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6期。

⑥ 谢贤君、任晓刚：《新时代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制度创新研究：发展格局、问题审视与战略性调整》，《当代经济管理》2020年第11期。

的。就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内在机制而言，王学凯和樊继达认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有着内在的逻辑，微观逻辑在于处置单个部门的风险点，中观逻辑在于阻隔跨部门、跨产品、跨区域的交叉风险，宏观逻辑在于平衡防风险与稳增长。分析系统性风险要以经济发展为起点，构建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三位一体”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框架。因此，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分别从各主体的不同形成机制采取相应的措施。^① 陈昆亭和周炎分析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及危机形成机制，并且认为面对当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的复杂严峻经济形势，深入研究西方金融经济周期理论并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对我国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借鉴意义。^②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③ 在推动金融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也要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累。陈建奇认为，维护金融安全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金融科技不断催生金融模式创新，故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④ 周蓉蓉指出，我国金融科技监管理念僵硬，未能构建起现代化金融科技监管体系，金融科技所形成的风险较高。故我国需要统筹兼顾共建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相结合的微观发展机制，升级和重塑传统金融业务领域和新的金融科技生态系统，以改变现有金融体制对传统金融模式的约束，促进我国金融科技2.0的健康发展。^⑤

由此可见，系统性金融风险既来自经济体中各主体的形成机制，也来自金融科技所带来的风险因素。因此，我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紧紧围绕把握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① 王学凯、樊继达：《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在逻辑、形成机制与防范策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② 陈昆亭、周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西方金融经济周期理论货币政策规则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④ 陈建奇：《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理论视野》2020年第10期。

⑤ 周蓉蓉：《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现状、困境与战略路径》，《新金融》2020年第10期。

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新进展（2020）^{*}

南开大学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新进展课题组^{**}

2020年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年。不仅诸如新冠疫情这样突发而又影响深远的公共卫生事件在这一年发生，而且全球贸易体系、技术过程等方面的深层次变革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在这一年表现得也更加明显。而这些因素也体现在了国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中。为体现这些因素，我们选择了六个议题：基础理论与方法、宏观动态、技术变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国际分工与世界市场、卫生政策与新冠疫情、对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与往年的议题数量相比，2020年的议题更加聚焦。同时这六个议题在保留政治经济学领域经典的、具有延续性的议题之外，也更多地反映了2020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变化。

一、基础理论与方法

2020年国外政治经济学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劳动价值论以及货币理论的研究，二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批判。而在研究方法上则推陈出新，不仅有演化政治经济学的蓬勃发展，而且一些学者还将物理学的分析工具与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议题结合了起来。

（一）基础理论研究

1. 价值理论

弗里曼（Freeman）研究了创意产业中的创意劳动（creative labor）在使用价值生

^{*} 本课题受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科学研究类项目（ZB21BZ0309）资助。

^{**} 南开大学冯志轩、曲佳宝、刘子嘉、计佳成和张佳琳参与了本报告的写作，南开大学刘凤义教授统稿。

产和价值形成中的特殊性。他认为创意劳动所产生的使用价值具有一种独特性 (distinctness), 反映生产者本人的独特个性, 并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的需要。创意劳动与一般工业领域的机械化劳动不同, 它是无法被机械地重复的。同时创意劳动的结果以精神客体 (mental object) 的形式存在, 比如写在纸上的文字以及存储在唱片中的音乐, 因此创意产品的使用并不会带来其自身的损耗。弗里曼进一步认为, 我们需要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安排特有的财产制度以保障创意劳动者的权益, 从而更好地发展创意产业。^① 皮尔格梅尔 (Pirgmaier) 梳理了目前生态经济学中存在的几种价值理论。他认为, 从新古典价值论出发, 社会的经济活动仅仅是一个成本效益系统, 而市场会自动带来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效率的最大化。而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出发, 使用价值与价值是截然不同的。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为基础, 可以更加科学地分析当前社会经济活动的生态可持续性, 更好地理解市场的性质。^② 而兰格 (Lange) 的研究发现,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于我们透过拜物教观念去理解货币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一种关于形式与内容之间联系的理论, 在现实经济运行中, 货币、资本以及利润等范畴都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而在拜物教观念的影响下, 它们对价值的表达是扭曲且遮蔽的。兰格认为, 日本的“后宇野 (post-Uno) 学派”仅仅从流通或交换领域出发去理解货币等价值形式的意义是片面的, 会混淆价值与价值形式, 而后者仅仅是交换的结果。他们与马克思相反, 认为货币在逻辑上先于商品交换, 货币是社会关系的符号化表现, 代表了交换关系的基础。这种以货币代替价值并抛弃价值理论的方法, 抹杀了由价值理论所揭示的阶级关系。^③

也有学者运用现代经验分析手段, 验证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比如程瀚 (Han Cheng) 和李民骐 (Minqi Li) 运用 1990 年到 2012 年中国的投入产出表, 计算并分析了直接价格 (labor-value-based direct prices)、马克思生产价格 (Marxian prices of production)、斯拉法生产价格 (Sraffian prices of production) 和市场价格 (market prices) 之间的偏差。他们发现, 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直接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偏差平均为 17%—18%, 并且前者变化可以解释后者变化的 70%, 而生产价格的变化则可以

① A. Freeman, “Creative Labor, Mental Objects and the Modern Theory of Production”, *Science & Society*, vol. 84, no. 4 (2020), pp. 458–484.

② E. Pirgmaier, “The Value of Value Theory for Ecological Economics”,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179 (2021), 106790.

③ E. Lange, “Money versus Value?: Reconsidering the ‘Monetary Approach’ of the ‘Post’—Uno School, Benetti/Cartelier, and the Neue Marx-Lektür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28, no. 1 (2019), pp. 51–84.

解释市场价格变化的至少 80%。^① 朴贤勇 (Hyun Woong Park) 和柳东民 (Dong-Min Rieu) 则以新解释学派 (the New Interpretation) 提出的 MELT (monetary expression of labor time), 即以单位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为核心变量, 在多变量的最优化模型的基础上, 通过区分生产性部门的价值创造与非生产部门的价值转移, 求解并分析了在不同情形下单个经济体中非生产部门的最优规模以及其对资本积累能力的影响。他们发现, 在有限的劳动力供应下, 当生产性部门的工资率相对于劳动生产率过高而导致该部门发展停滞时, 可以通过提高非生产性部门的规模来促进总体经济的增长。但是目前的经验研究表明, 非生产性部门的过早扩张反而会带来总体经济增长的疲软。^②

最后, 在经典的转形问题的探讨中, 学者也提出了有价值的思考。比如霍卡尼恩 (Honkanen) 围绕价值的定义、变量的时续关系 (连续或共时)、投入品的度量方式、单一或多体系以及抽象劳动的度量等这些价值转形问题中的核心命题, 梳理了现有学者不同的分析和解决思路。霍卡尼恩认为, 运用数学工具去解决转形问题甚至是马克思的其他命题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现实经济运行的分析包含了很多范畴之间的数量联系。我们首先不应该排斥通过更加复杂和科学的数学工具去解决这些问题, 并应该考虑如何更好地将现实生产活动物质形态的变化反映到数学参数之中。在应用这些数学工具之前, 我们应该明确所分析命题的抽象层次, 从而选择合适的工具以充分展现经济运行的基本结构。^③

2. 货币理论

在货币理论方面, 2020 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该理论的应用上。长谷清 (Kiyoshi Nagatani) 认为从货币起源的历史来看, 早期的商品交换并不必然以劳动作为价值实体。在交换发生之前, 买卖双方会提前根据以往的供求情况以及自我意愿形成对商品价格的估计。而在交换关系中, 这种价格会直接通过货币表现出来。因此, 货币形式 (money-form) 是先于价值形式而存在的。^④ 伊万诺娃 (Ivanova) 以货币不同职能的区

^① H. Cheng and M. Li, "Do Labor Values Explain Chinese Prices? Evidence from China's Input-Output Tables, 1990-2012",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52, no. 1 (2020), pp. 115-136.

^② P. Woong and D. Rieu, "A Mathematical Formulation of the Dual Nature of Unproductive Labor",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52, no. 4 (2020), pp. 716-738.

^③ P. Honkanen,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and Value-Form: Methodological Comments", *Confronting Capit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pp. 91-124.

^④ K. Nagatani, "Value-Form and the Mystery of Money", *Capital & Class*, vol. 44, no. 1 (2020), pp. 27-46.

分为基础，分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流动性不足的本质原因。她认为，信贷货币的数量和可获得性可能会受到中央银行和私人银行系统活动的影响。然而，只有当信贷货币作为社会劳动或社会购买力的体现进入社会生产领域时，它才能真正变成作为收入的货币。因此，危机时流动性不足的原因并不是没有货币，而是没有作为收入的货币，这是因为生产性领域的过剩商品无法实现，导致虚拟资本大量膨胀。^①而杜克(Duque)则以新兴的加密数字货币(cryptocurrency)为研究对象。他认为，根据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加密数字货币是一种具有内在价值但没有使用价值的新型无形商品货币。加密数字货币没有自然的形式，但却具有与所有其他商品直接交易的互换性，加密数字货币在未来可能会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发挥作用。^②

(二) 理论批判

2020年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重点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与一般均衡理论。巴里(Barry)对目前经济学研究中盲目痴迷于经济增长的传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经济增长这个概念的提出本质上维护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利益、为特定阶级或精英的利益服务。^③而费利佩(Felipe)和麦康比(McCombie)认为用仅仅作为会计恒等式的生产函数来在经验上研究经济增长是有问题的，因为任何对生产函数的拟合估计都是提前决定的，这类等式的恒等性导致这种拟合只是一种无意义的计算练习。这种对经济增长的研究范式产生了与现实的经济增长毫不相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通常仅仅是人们主观上的会计习惯造成的，比如解释和计算全要素生产率(TFP)。他们还认为，即便使用微观层面的企业数据也无法避免上述问题，因为这类会计恒等式在任何计算层面都预先成立。^④

法蒂尼(Fratini)则质疑了新古典经济一般均衡分析的基础，即阿罗—德布鲁模型假设的合理性。他认为，该模型假设所有市场在同一时间开放并且不会重新开放，

① M. Ivanova, "Marx's Theory of Money: A Reappraisal in the Light of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52, no. 1 (2020), pp. 137 - 151.

② J. J. Duque, "State Involvement in Cryptocurrencies: A Potential World Money?", *The Japanese Political Economy*, vol. 46, no. 1 (2020), pp. 65 - 82.

③ J. Barry, "A Genealogy of Economic Growth as Ideology and Cold War Core State Imperative",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25, no. 1 (2020), pp. 18 - 29.

④ J. Felipe and J. McCombie, "The Illusions of Calculat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esting Growth Models: From Cobb-Douglas to Solow and Romer",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vol. 43, no. 3 (2020), pp. 470 - 513.

这个假设排除了所有与代理人预期和投机交易相关的问题，因此该模型并没有为动态问题的解释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贡献。通过进一步研究该模型的基本设定，法蒂尼发现该模型中的利息其实是同一种商品在不同日期交割的相对价格，企业利润与资本投入并不相关，而储蓄仅仅是家庭在给定日期交付的过剩商品。^①

最后，比纳（Bina）对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技能形成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发现，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技能的形成是每个工人的内在特征，技能的获取或消失取决于个人的选择，与劳动过程的变化无关，并非一种社会概念。他认为我们应该将技能看作一种商品，其形成类似商品生产，也需要满足一定的市场条件。^②

（三）研究方法

1. 演化政治经济学

随着各国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如今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不会集中在某个孤立、个别的问题或危机上，而是体现在复杂的系统性现象和过程之中。对于这些问题，除了目前以新古典经济学为首的主流经济学提供的分析框架和方法外，非主流经济学也提出了自己有价值的思考并贡献了许多原创性的方法。2020年新创刊的国际期刊《演化政治经济学评论》为非主流经济学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宝贵的平台。钦科蒂（Cincotti）等在该期刊创刊之际，介绍了非主流经济学中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流派构成和当前研究领域。在他们看来，演化政治经济学包含了政治经济学、演化和制度经济学、基于主体的计算经济学和非正统宏观经济学等。演化政治经济学反对理性主体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简单的市场均衡原理。该流派主张从社会制度和惯例的角度去动态地理解人类行为。其中，演化经济学贡献了重要的方法论原理，其总体目标是解释变化并观察社会经济系统的历史发展。同时，演化政治经济学也从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汲取方法灵感，比如复杂动态方法和网络建模。^③

在具体的研究方面，贝肯巴赫（Beckenbach）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范畴其实存在着

^① S. Fratini, "Interest, Profit and Saving in Arrow-Debreu Equilibrium Models", N. 254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Roma Tre.

^② C. Bina, "A Note on Technical Change, Skil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Inst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49, no. 1 (2020), pp. 83 - 91.

^③ S. Cincotti, et al., "The Review of Evolutionary Political Economy Inaugural Issue, Part 2", *Review of Evolutionary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2 (2020), pp. 145 - 148.

不同的质与量方面的规定性，这些规定性适用于不同的抽象层次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不同模块。贝肯巴赫希望可以构建一个这些不同模块之间动态联系的基础框架，从而使得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经济演化。由此，贝肯巴赫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系统分为几个主要活动，分别是获取劳动力人口、以适当方式利用劳动力产生剩余、实施积累、促进再生产和克服分配方面的紧张关系。在这个框架之下，他构建了描述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以及剩余价值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动态方程组。^① 在此基础上，贝肯巴赫还通过仿真模拟技术验证了该方程的有效性以及相关推论。^②

格鲁什卡 (Gruszka) 等人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试图在复杂的资本主义演化发展之中，找出数字化技术转型、生态危机以及平台经济下不稳定就业这三者起源的共同之处。他们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的积累体系的演化发展方式可以理解为一个濒临崩溃但又不断自我稳定的过程。这个积累体系不会突然毁灭，而是处于内部不断的摩擦和冲突之中。资本主义目前的发展阶段依赖于独立于时空并高度集中的资源利用方式，以确保该积累体系的稳定。在这一背景下，数字化平台已经成为社会上各经济主体间的主要协调者，尤其是塑造了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这是一种数字化转型，并造成了工人总体间的孤立与分化。在数字化平台的媒介下，人类活动与自然界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被割裂，人类劳动失去了在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协调作用。^③

哈纳皮 (Hanappi) 则为我们介绍了演化政治经济学中复杂性研究的相关内容。哈纳皮认为，既有主流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假定以及产生的模型沿用了牛顿物理学的基本形式，忽视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复杂性，并由此失去了刻画人类社会动态演化基本特征的能力。因此，哈纳皮希望将复杂性建模 (complexity modelling) 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动态分析基础。^④

帕加诺 (Pagano) 研究了劳动分工在群居昆虫和人类社会中的不同机制和性质。

① F. Beckenbach, "A Value-Theoretic Approach to Economic Dynamics and Evolution-Synthesizing Different Marxian Modules in a Simulation Model: Part I: Foundations", *Review of Evolutionary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1 (2020), pp. 103-135.

② F. Beckenbach, "A Value-Theoretic Approach to Economic Dynamics and Evolution-Synthesizing Different Marxian Modules in a Simulation Model: Part II: Simulation Experiments", *Review of Evolutionary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2 (2020), pp. 221-243.

③ K. Gruszka, et al., "Planetary Carambolage: The Evolutionary Political Economy of Technology, Nature and Work", *Review of Evolutionary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3 (2020), pp. 273-293.

④ H. Hanappi, "Perplexing Complexity Human Modelling and Primacy of the Group as Essence of Complexity", *Review of Evolutionary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3 (2020), pp. 397-417.

他发现, 群居昆虫社会中的劳动分工特点符合巴贝奇原则 (Babbage Principle), 而人类社会中的劳动分工在最初是以斯密原则 (Smithian Principle) 为特征的。帕加诺进一步认为,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人类社会的分工开始走向另一面, 即越来越符合巴贝奇原则。这也就是说, 生产过程中的经验和知识往往没有被社会分享, 而被少数人垄断, 并且工人的技能要求和成本也被降至最低。帕加诺认为, 这种类似群居昆虫式的分工的发展是对人类的暴力行为。^①

2. 物理学与政治经济学

沙芬内克 (Scharfenaker) 梳理并总结了目前在分析政治经济学中对统计均衡方法的应用。沙芬内克认为, 以边际主义学说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均衡理论, 倾向于抽象出一个完全稳定均衡的经济系统。而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系统是复杂的分散系统, 可衡量的经济变量是具有统计学性质的。将经济变量的现实的统计分布简化为估计值或平均值的做法大大简化了经济理论, 也使得经济理论无法解释一些更加复杂的动态问题。但沙芬内克认为, 以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假设与统计均衡方法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从目前这一方法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应用来看, 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合路径, 即根据无限时间平均 (infinite time averages) 进行推理的遍历方法 (ergodic approaches) 和根据系统层面信息 (system-level information) 进行推理的宏观传统。^② 而在另一篇与杨 (Jangho Yang) 合作的文章中, 沙芬内克梳理并介绍了目前统计力学中最大熵 (maximum entropy) 理论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③

多斯桑托斯 (dos Santos) 批判性地反思了统计均衡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他的研究发现, 基于个人还原主义或微观动力学的统计均衡方法将一个社会系统的宏观功能仅仅视为个体成员的功能的放大。这种分析方法将观察到的规律归因于个人特征, 而不是个人之间的互动。而具有社会组合 (socio-combinatorial) 特征的统计均衡方法不拘泥于非常具体的个人主义模型中的参数估计, 而是努力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因此在分析结果时, 这种方法不以代表性的同质个体的规律为基础, 而是侧重于社会规

^① U. Pagano, "Why Only Humans and Social Insects Have a Division of Labour",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44, no. 1 (2020), pp. 1 - 16.

^② E. Scharfenaker, "Statistical Equilibrium Methods in Analytical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Published online, (2020), pp. 1 - 34.

^③ E. Scharfenaker and J. Yang, "Maximum Entropy Economics", *The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Special Topics*, vol. 229, no. 9 (2020), pp. 1577 - 1590.

律的把握。^①

维纳 (Wiener) 则利用量子响应统计均衡 (the quantal response statistical equilibrium) 方法衡量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并研究了美国本土劳工以及移民劳工之间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效应。维纳认为, 量子响应统计均衡方法允许我们从观察到的工资分布中提取未观察到的行为信息。尽管没有对行为的直接观察, 但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个衡量工人对工资差异反应程度的指标, 以及一个衡量个人行为对不同市场工资累积影响的指标, 而这些指标可以用于刻画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程度。维纳的研究证明了在数据不完全的情况下, 统计均衡方法对社会经济分析的有用性。^②

二、宏观动态分析

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最活跃、与其他经济学流派交流和互动最多的领域之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宏观分析在 2020 年度也有很多成果。

(一) 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

在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当中, 一个关键性因素是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之间的关系, 而这个关系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分配过程。新卡莱斯基理论尽管在很多情况下被视作典型的“后凯恩斯主义”模型, 但是由于这一理论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抓住了上述两个关系而被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所借鉴。在 2020 年度的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文献中, 也有许多讨论是围绕新卡莱斯基理论展开的。

近年来对于新卡莱斯基理论的一个重要批评是认为在这个理论当中, 劳资间的分配是被视作外生变量引入模型的, 这样才能讨论收入分配和增长之间的关系, 但是这种收入分配实际上是由一些社会制度因素内生决定的, 因此模型所需要讨论的不是外生的收入分配, 而是这些更为具体的社会制度因素。尼基福罗斯 (Nikiforos) 针对这一批评从方法论上进行了回应, 提出, 将变量视作外生, 代表了一种抽象机制, 这忽

^① P. dos Santos, “Statistical Equilibria in Economic Systems: Socio-Combinatorial or Individualist-Reductionist Characterizations?” *The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Special Topics*, vol. 229, no. 9 (2020), pp. 1603–1622.

^② N. Wiener,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Immigrant Competition: A Quantal Response Statistical Equilibrium Analysis”, *Entropy*, vol. 22, no. 7 (2020), p. 742.

略了一些复杂性，只要这一抽象所舍弃的复杂性的再次引入不会使得模型的有效性下降，那么这类抽象就是没有问题的。进一步，根据罗森 (Lawson) 提出的两个判断模型抽象是否合理的标准，也即抽象得到的机制是不是现实的，以及这种机制是否与本质相关，其认为对新卡莱斯基理论收入分配外生性的批判并不触及本质。因为首先，在卡莱斯基理论中，收入分配作为外生变量是一个很好的理论起点，能够展现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这在类似新古典经济学这种将收入分配完全内生的研究中是做不到的；其次，对收入分配的分析固然可以加入包括利润挤压在内的周期性波动机制，但是即便如此，其仍然是一个相对“自主”的范畴。^①

卡莱斯基模型在增长领域的应用已经非常丰富和成熟了，而近年来利用卡莱斯基理论讨论周期问题的文献也逐渐增多。坎普-本尼迪克特 (Kemp-Benedict) 在卡莱斯基—哈罗德模型内引入了包括分配变化引致的技术进步和冲突的劳动力定价在内的古典—马克思宏观经济机制，同时放弃了凯恩斯稳定条件——储蓄对产能利用率的反映要大于投资——以此构建了一个卡莱斯基—哈罗德—古典宏观模型，在这个模型下，哈罗德不稳定性得以解决，同时模型能够兼容包括短期不稳定性、古德温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在内的多重周期和波动。^②

西洋 (Nishi Hiroshi) 和斯托克汉姆 (Stockhammer) 的研究也关注了类似的主题，并且有趣的是，尼基福罗斯的方法论在这篇文章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这篇文章在卡莱斯基模型内部引入了内生的自然产出水平和收入分配两种体制，分别是劳动力市场引导体制和商品市场引导体制，前者的条件下实际产出与自然产出的缺口会降低利润份额，后者则相反。由此，模型可以分析需求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给出了古德温周期的另一种可能性：在不依赖产业后备军效应的情况下，周期可以由商品市场引导体制中收入分配和产出缺口的互动产生。模型的一组基本结论是在工资引导与商品市场引导体制的组合，以及利润引导与劳动力市场引导体制的组合下，经济是渐进稳定的，而在两组相反的组合下，模型的动态过程则高度依赖自然产出的内生程度和产出的调整速度，可能会存在不稳定性 and 长期波动。^③

① M. Nikiforos, "Abstraction and Closure: A Methodological Discussion of Distribution-Led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published online, (2020), pp. 1 - 24.

② E. Kemp-Benedict, "Convergence of Actual, Warranted, and Natural Growth Rates in a Kaleckian-Harrodian-classical Model", *Metroeconomica*, vol. 71, no. 4 (2020), pp. 851 - 881.

③ H. Nishi and E. Stockhammer, "Cyclical Dynamics in a Kaleckian Model with Demand and Distribution Regimes and Endogenous Natural Output", *Metroeconomica*, vol. 71, no. 1 (2020), pp. 256 - 288.

也有一些学者利用新卡莱斯基模型进行了经验分析。奥瓦特 (Oyvatt) 等人构建了一个相对综合的经验分析框架, 并在这个框架下考察了各种可能影响增长体制的因素。文章首先利用 VECM 和 ARDL 方法计算了 41 个国家工资份额对增长的影响, 获得相对稳定的增长体制, 然后利用 Meta 分析考虑了各种制度对增长体制的可能作用。研究发现, 对外开放程度与工资引导型体制的可能性呈现了强烈的负相关关系, 而较高的收入不平等和私人信贷水平也具有相似的作用。^①

贾汀 (Jetin) 和奥尔特兹 (Ortiz) 运用新卡莱斯基理论分析了中国的宏观增长体制, 他们利用奥纳伦 (Onaran) 的方法^②估计了中国的增长体制类型, 发现中国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整体而言是利润引导型的, 在 2008 年之后则逐渐转向工资引导型体制。这解释了为什么 2008 年之前中国一直致力于提高国内消费而不得。文章进一步提出, 目前偏向劳动的分配政策将是中国稳定增长、改善其对投资和国际市场依赖的可能途径。^③

(二) 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动态的影响一直是各个学派宏观经济分析的重点, 在 2020 年也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献拓展了对这个领域的认识。

塔瓦尼 (Tavani) 和赞帕莱利 (Zamparelli) 在古德温周期模型的框架内考察了政府收支的两种作用: 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创新活动的支持, 前者会提高产出并因此更可能通过提高就业水平而提高劳动报酬份额, 后者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因此降低就业份额。根据这两种相反的机制, 文章发现, 存在两个可以分别最大化劳动报酬占比和最大化积累过程的最优税率, 二者并不相同且后者比前者更低。并且这个结论无论是否考虑劳动份额与技术进步之间的正反馈效应都是成立的。这意味着在财政具有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时候, 决策者实际上会面临一种权衡取舍。^④

奥布斯特 (Obst) 等人采用了一个可以更好地反映不同国家之间经济联系和财政

① C. Oyvat, O. Öztunalı and E. Ceyhan, “Wage-Led versus Profit-Led Demand: A Comprehensive Empirical Analysis”, *Metroeconomica*, vol. 71, no. 3 (2020), pp. 458 - 486.

② O. Onaran G. Galanis, “Is Aggregate Demand Wage-Led or Profit-Led?”,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Report, 2012.

③ B. Jetin and L. Ortiz, “Wage-Led Demand as a Rebalancing Strategy for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vol. 43, no. 3 (2020), pp. 341 - 366.

④ D. Tavani and L. Zamparelli, “Growth,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vol. 30, no. 1 (2020), pp. 117 - 141.

溢出效应的经验分析框架，分析了欧盟 15 个国家的增长体制和财政政策的作用。研究发现，如果将欧盟视作一个整体，那么其增长体制整体上是工资导向的，这与以往的研究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且如果欧盟各国整体上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且采取更加偏向工资的税制，如降低工资税并提高资本税率，那么不仅会提高各国的增长率、抑制目前的通货紧缩，还能够更好地实现预算平衡。^①

在传统上，一般认为政府财政收支尤其是政府债务对经济波动具有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但是梅德伦 (Medlen) 和陈泽林的研究对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见解。他们利用卡莱斯基和明斯基的理论，说明了政府财政赤字是资本家获取利润的重要来源，但是同时他们指出，只有在利润和投资基本相等的情况下这种赤字才能成为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力量。而近年来美国的高赤字在带来高利润的同时，这些利润没有进行投资，而是持续流入股市，不仅没有促进增长，反而扩大了经济中的收入差距。并且由于高收入人群支出的自由度和自主性更大，反而带来了经济更加剧烈的波动和投机。^②

政府的军事支出对经济的影响是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话题。埃尔文 (Elveren) 的研究为如何考察军事支出对利润率的影响提供了综合的框架。埃尔文总结了军事支出影响利润率的几个基本途径：增加需求从而促进价值实现、通过技术外溢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通过剩余抽取延缓非军事部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除此之外，文章还认为军事部门由于其寡头垄断的性质，销售时滞更短，因此军事部门的扩大也会提高整个经济的资本周转速度。文章利用资本循环模型的思路，将这些因素进行了综合，说明上述机制都可以通过影响时间结构来实现。接下来，文章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经验研究，将军事支出、资本循环的时间结构和二者的交互项作为关键解释变量对利润率进行了回归。经验结果表明军事支出确实可以直接或通过改变资本循环的时间结构来提高利润率水平。^③

(三) 货币金融问题

货币金融问题，尤其是金融危机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对象，在 2020 年有

① T. Obst, Ö. Onaran and M. Nikolaidi, "The Effect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Fiscal Policy on Aggregate Demand, Investment and the Budget Balance: The Case of Europ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44, no. 6 (2020), pp. 1221 - 1243.

② C. Medlen and Z. Chen, "Deficits for the Rich: Inequality and Insta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54, no. 2 (2020), pp. 517 - 524.

③ A. Elveren, "Military Spending and Profit Rate: A Circuit of Capital Model with a Military Sector",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2020), pp. 1 - 18.

两篇文章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有趣的对比。麦克考马克 (McCormack) 分析了加拿大银行业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中相对稳定的原因。在以往的许多研究中,这一现象被归因于加拿大相对垄断的银行业结构,这种银行业结构使得银行的利润率和现金流水平更高,从而具有更高的抗风险能力。麦克考马克反驳了这种观点,并通过经验证据说明是较强的实体企业盈利能力和积累水平促进了经济的稳定性,而经济的稳定性又进一步促进了金融系统的稳定性。^①

麦克考马克的这种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金融危机的一种常见思路,即金融危机是与实体经济相联系着的,金融危机需要从实体经济运行过程中寻找原因。但是这种观点在很多时候会被过度解读为一种“退化的”金融危机理论,也即金融问题被归结为实体问题,金融本身处于一个相对从属的地位。^②而格兰迪 (Grandi) 和图汀 (Tutin) 的研究则旨在通过对马克思金融危机思想的梳理和重构来反驳这样一种观点。该研究认为在马克思对危机的分析中,信用和金融始终处于核心地位。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实际上与明斯基的不稳定性理论具有高度相似的结构,都说明经济是如何从相对稳定的金融结构逐渐演变为一个不稳定的金融结构的,并且认为这个叙述与希法亭比例失调的危机理论是一致的,二者相互配合能够更好地说明实体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性是如何相互作用的。金融不稳定性不仅仅是危机的一个“反映”,也处在危机形成和爆发的“路径”之上。^③

(四) 长期分析:长期停滞问题

近年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一直处在相对低迷的状态之中,这使得“长期停滞”问题成为各个经济学流派关注的焦点。2020 年,政治经济学学者也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

长期停滞在很多情况下意味着潜在产出的下降。基弗 (Kiefer) 等人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提供了一种测度潜在产出的方法。这种方法以古德温周期理论为基础刻画了劳动报酬份额与潜在产出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来利用经验上的收入分配数据估算

① G. McCormack, “Canadian Banking Stability through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f 2007—2008: A Classical Marxian Analysi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28, no. 1 (2019), pp. 114 - 146.

② J. Toporowski, “Marx, Finance and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0, no. 3, pp. 416 - 427.

③ A. Grandi and C. Tutin, “Marx and the ‘Minsky Moment’ Liquidity Crises and Reproduction Crises in Das Kapital”,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vol. 27, no. 6 (2020), pp. 853 - 880.

美国战后的潜在产出。作者发现,潜在产出在 2000 年左右就开始经历快速的下降,这一方面再次说明了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并非一个突然的现象,背后实际上存在着深刻的趋势性因素;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停滞的长期性这一基本事实。^①

长期停滞本身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系统性现象,这也意味着其产生的基础和机制的复杂性。2020 年有多篇文献从不同角度对长期停滞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帕里伯尼 (Pariboni) 等人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相对“传统”的解释:资本主义的“金融化”或者说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下金融管制的放松、资本自由流动、劳动力市场去管制和福利制度的萎缩造成了经济当中生产和实现的诸多困难,而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的形成不是一系列偶然政策使然,而是资产阶级权力不断扩大的结果。在此基础上,这一研究利用 OECD 国家的数据验证了这一观点。^②

加勒兹 (Gualerzi) 的研究则提供了一个相对“结构化”的观点,探讨了长期停滞与信息通信技术 (ICT) 之间的关系。加勒兹认为,ICT 的发展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方面其扩张和投资表现出明显的“重组”性质,替代了现有的商业模式,改变了现存的技术和产业结构,但是却没有带来大规模的投资和需求的生长;另一方面在创造工作岗位方面存在明显的“极化效应”,在创造一部分高收入岗位的同时,也更多地创造了低技术、低收入和较差劳动环境的工作岗位。这使得 ICT 的发展无法成为助推经济增长的技术基础。^③

特明 (Temin) 对研究美国的长期停滞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直接但是基础的说明。这一研究指出,美国实际上存在一个明显而危险的现象即资本投资无法覆盖其更新需求,也就是说美国的资本存量正在被逐步消耗,这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毫无疑问是有重大负面影响的,但是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的原因是现行的美国国民收入和产品统计账户 (NIPA) 无法有效估计真正的资本投资量,并将其与“虚假”的投资和生产区分开来。^④

^① D. Kiefer, I. Mendieta-Muñoz, C. Rada, and R. von Arnim, “Secular Stagn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Dynamic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52, no. 2 (2020), pp. 189–207.

^② R. Pariboni, W. Meloni and P. Tridico, “When Melius Abundare Is No Longer True: Excessive Financi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as Drivers of Stagnatio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2, no. 2 (2020), pp. 216–242.

^③ D. Gualerzi, “Secular Stagnation Revisited”, *Bulletin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4, no. 1 (2020), pp. 55–79.

^④ P. Temin, “Finance and Intangible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ating the Family Co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49, no. 1 (2020), pp. 23–42.

长波理论是一种经典的长期宏观分析视角，可以说许多对于长期停滞的分析都可以归类为不同类型长波理论的应用。这些不同的长波理论对于经济长达数十年的波动提供了不同的见解，这些不同意见的一个重要体现是长波的上升和下降阶段是如何形成的。约翰逊（Johnson）的研究对这一更基础的长期理论做了经验研究，研究结合英国和美国的长期历史数据，发现长波的下降阶段是有其内在逻辑的，而上升阶段则需要外生于经济系统的“冲击”，这与曼德尔的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相吻合。在曼德尔的理论当中，长波下降是由于资本主义内在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而上升所需要的利润率的恢复则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内生的，需要在长期的阶级冲突过程中以一种“非预定的”方式形成。^①

三、技术变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国家、企业以及劳动者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技术变革的相关研究也成为政治经济学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2020年国外关于技术变革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技术创新过程的趋势与影响；第二，对平台经济的批判性分析；第三，对人工智能所产生问题的分析与反思。

（一）技术创新过程的趋势与影响

技术创新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一直是经济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在全球化、数字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李英秀（Young Soo Lee）等使用了31个OECD国家1990—2006年的数据，对金融化如何改变企业技术创新战略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随着金融化的发展，企业经营的短期性日益增强，经济实体将技术创新战略从涉及高风险和长期投资的基础性创新逐渐转向增量式创新。具体表现为：随着金融化的发展，技术创新的基础性下降，而专利注册的数量却增加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专利持有量对金融市场上企业的价值或IPO成功率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信号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专利作为企业融

^① N. Johnso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Long Wav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Critique*, vol. 48, no. 2 - 3 (2020), pp. 149 - 168.

资抵押品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从而企业在申请和注册专利方面变得越来越积极。^①

利用企业层级的微观数据，拉斐尔·格兰德（Rafael Grande）等开发了一组关于创新与工作质量的指数，以定量地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企业层面创新对工作质量的影响因创新类型而异：按照对工作质量的积极影响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产品创新、过程创新、营销创新。而组织创新在控制了影响工作质量的其他变量之后，似乎对工作质量没有显著影响。（2）创新与工作质量各个维度之间的相关性也存在显著差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参与程度和就业质量与创新显示正相关，而工作的内在质量与创新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劳资关系对工作质量很重要：公司的集体谈判对工作质量汇总指数有积极且重大的影响，并且工会代表在促进创新转化为企业更高的工作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4）公司最近的就业变化对工作质量产生了非对称的影响，即最近减少就业的公司的的工作质量明显较低，但就业增长的公司的的工作质量却没有明显提高。^②

（二）对平台经济的批判性分析

随着数字技术和商业平台在经济活动中的快速发展，学者们对平台经济的研究也逐渐深入：从起初对平台经济或者平台资本主义含义和性质的界定与探讨，到现今从不同的角度、结合不同的理论，对平台经济的经济意义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展开深入分析。这些议题包括对平台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平台经济发展对城市地理空间的影响，以及对平台经济中众包劳动的分析等。

对于数字化信息技术条件下新兴的经济组织形式，斯尔尼塞克提出了“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这一极为深刻的概括。在此基础上，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平台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吉尔德（Gjerde）揭示了平台话语（discourse）与网络剥削之间的关系，他将互联网上的社交话语称为数字化社交（sociodigital）。社交媒体的用户是通过数字化社交所产生的内容而被剥削的，相比于在传统工厂里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剥削，这种网络剥削是通过让自由劳动力进入数字工厂这所虚拟的“社区”而实现的。拉尔斯进一步认为，这将平台经济转变为一种资本主义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休闲和劳动最终完全融为一体，将资本主义带入了一个新的“自愿者”非物质奴

^① Y. Lee, H. Kim and S. Joo, “Financialization and Innovation Short-termism in OECD Countrie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52, no. 2 (2020), pp. 259 - 286.

^② R. Grande, R. Muñoz-de-Bustillo, Enrique Fernández Macías, José Ignacio Antón, “Innovation and Job Quality: A Firm-Level Explora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no. 4 (2020).

隶制时代。^① 当网络社交逐渐成为日常时，该研究通过揭示数字化社交话语与网络剥削之间的关系，为平台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的视角。此外，范·多恩（van Doorn）等人对平台资本主义背后剥削的分析也值得关注。该研究认为在金融化平台资本主义条件下，对零工工作进行治理的一个核心特征在于其称之为“双重价值生产”的过程：平台经济中的零工工作者在提供服务的同时产生了数据资产，而平台资本主义的隐秘之处就在于对这些零工工作者产生的数据资产的剥夺以及利用其进行价值增殖。^② 该研究通过对零工经济中的数据资产的生产过程的分析来揭露平台资本主义背后的价值剥夺，从而对平台资本主义提出了更加深入的批判性分析。杰森·萨多夫斯基（Jathan Sadowski）将平台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中食利者（rentier）的主要形式加以讨论。为此，他将有关租金的理论从土地和自然扩展到平台和数据。他认为，平台这种业务模式正以新的名义建立起食利关系（rentier relations）。这种模式的前提是平台渗透到生产、流通或消费过程中，从而创造了获取价值的机会。^③ 该研究拓展了租金理论，并将平台作为当代资本主义食利者的新形式，将其理解为食利资本主义（rentier capitalism）的新形式，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平台资本主义的本质理解。

平台经济对于地理空间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约翰·史特林（John Stehlin）等探索了城市交通平台化的驱动力和具体表现形式，在构建和分析包含来自全球的 200 个城市交通平台的数据库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平台形成的五个关键轨迹：第一，由大量风险投资和数字资本的支持建立新的互联网企业，并破坏现有公司和商业模式的资本融合；第二，现有运输公司倾向于追求平台化，通过扩展其在固定线路方面的现有优势来应对数据资本所造成的扰乱；第三，包括汽车制造商、汽车租赁公司、汽车保险公司等在内的汽车产销体系，通过建立汽车共享平台以及开发自动驾驶汽车和平台，保障现有资本的利用；第四，政府为公共平台开发模型并为私营企业创造基础条件；第五，由集体形成的非营利性合作平台。^④ 通过对五种平台化轨迹的分析，该研究表明了城市交通平台化对重塑城市空间的影响。马丁·肯尼（Martin Kenney）等认为平台经

① L. Gjerde, “Behind the Veils of Discourse: Analys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Discourse and Exploitation on the ‘Social’ Internet”, *Capital & Class*, vol. 44, no. 3 (2020), pp. 423 - 442.

② N. van Doorn and A. Badger, “Platform Capitalism’s Hidden Abode: Producing Data Assets in the Gig Economy”, *Antipode*, vol. 52, no. 5 (2020), pp. 1475 - 1495.

③ J. Sadowski, “The Internet of Landlords: Digital Platforms and New Mechanisms of Rentier Capitalism”, *Antipode*, vol. 52, no. 2 (2020), pp. 562 - 580.

④ J. Stehlin, M. Hodson and A. McMeekin, “Platform Mobilit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Toward a Typology of Platformization Trajectories”, *Economy and Space*, published online (2020), pp. 1 - 19.

济及其领先企业正在重组本地和全球范围内价值创造和获取的地理空间。他们首先展示了平台巨头在美国西海岸的位置及其在各种服务中市场份额的集中度，其次说明了这些平台对劳动力市场的广泛影响力，并通过亚马逊和谷歌地图的例子来具体分析平台企业对经济地理空间的影响。^① 对平台巨头的影响力的一般讨论表明，在全球范围内，获取价值的能力高度集中在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几家公司，并且众多的商业部门正在向平台转移价值。这将对资本积累产生全球性的影响。

莫里茨·阿尔滕里德（Moritz Altenried）分析了将各种形式的数字劳动外包给全球数字化工作者的众包平台，这些众包平台是自动测量、管理和控制劳动的新形式，创造出了高度灵活的全球按需式劳动力（global on-demand workforce）。^② 分析表明，这些众包平台并不是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中立的中介。此外，众包工作者的劳动以各种方式被隐藏。例如，在数字平台上完成的许多工作都被掩盖为软件，众包工作者所做的许多工作被认为已经自动化。该研究通过对各种形式的众包平台以及具体工人的考察说明了平台所具有的高度灵活性、标准化、可分解、自动化监管的按需式劳动趋势。

此外，西蒙·乔伊斯（Simon Joyce）基于马克思得出的两个概念——劳动的容纳和金钱纽带（subsumption of labour and the cash nexus）——重新思考了关于平台工作中社会关系的理论。他认为相比于通常被认为是“三角”的平台关系（例如，Uber司机、消费者、中介的三角关系），新兴的劳资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平台工作。这种劳资关系通过容纳过程（process of subsumption）在平台和工人之间建立了金钱纽带。^③ 正如马克思曾分析了资本如何将以前存在的工作形式纳入到资本的统治之下，在平台工作中，越来越多的独立工人。也被纳入到以平台企业为形式的大型资本下工作，这就是劳动的容纳过程。马克思的“容纳”概念为理解资本主义有偿工作的社会关系变化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三）对人工智能及其所产生的问题的分析与反思

人工智能的应用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例如由于人

^① M. Kenney and J. Zysman, “The Platform Economy: Restructuring the Space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no. 13 (2020), pp. 55 - 76.

^② M. Altenried, “The Platform as Factory: Crowdwork and the Hidden Labour behi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pital & Class*, vol. 44, no. 2 (2020), pp. 145 - 158.

^③ S. Joyce, “Rediscovering the Cash Nexus, Again: Subsumption and the Labour - Capital Relation in Platform Work”, *Capital & Class*, vol. 44, no. 4 (2020), pp. 541 - 552.

工智能对劳动者的替代而带来的就业影响，从而对人工智能所产生问题的分析、反思以及治理成为相关研究的重要方面。

人工智能技术的引进可能会替代部分劳动者，就这一问题，沃德曼·布朗（Waldman-Brown）通过对中小企业的案例研究发现，替换整个生产过程的成本和风险以及旧设备仍具有的相关功能，促使受访企业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辅助而不是替换现有技术和工人。^① 雷伊（Leigh）等探讨了机器人是否在劳动力市场上施加了超出先前工业自动化所带来的压力，研究使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机器人库存数据作为机器人使用的主要指标，使用来自于网络职位发布的实时劳动力市场信息（RTLMI）度量劳动力市场压力，进而重新审视了技术对就业和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自大萧条结束以来，机器在城市这一层级上为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作出了积极贡献。^② 而克利夫顿（Clifton）等在回顾了关于技术对增加、替换、破坏工作的争论后，认为迄今为止技术变革并未产生预期的令人担忧的影响。他们探索了人工智能的变化对社会、地理、政府的一系列影响，认为目前就影响而言，人工智能在许多方面被高估了。^③

此外，相关研究还包括关于人工智能应用的反思与监管。摩尔（Moore）考察了工作场所中人工智能的最新用途，进而对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当机器被赋予智能，并逐渐在工作中成为决策者和管理者时（例如，技术通过使用可穿戴的计算设备来加强对工人的管理控制，还可以通过数字决策来提高生产率和效率，而人工参与和干预变得越来越少），那么在人类与机器的关系中，究竟谁是谁的镜像？该研究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准确的答案，但给予了我们一定的警示。^④ 艾伦·迪格纳姆（Alan Dignam）认为人工智能带来的最大挑战并不在于认识到其产生的问题，而是在于公共治理。人工智能需要基于公共而非私人利益的监管。因此该研究提出一种将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置于人工智能监管的核心的监管模式。^⑤

① A. Waldman-Brown, “Redeployment or Robocalypse? Workers and Automation in Ohio Manufacturing SMEs”,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13, no. 1 (2020), pp. 99–115.

② N. Leigh, B. Kraft and H. Lee, “Robots, Skill Demand and Manufacturing in US Regional Labour Markets”,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no. 13 (2020), pp. 77–97.

③ J. Clifton, A. Glasmeier and M. Grayd, “When Machines Think for Us: The Consequences for Work and Place”,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no. 13 (2020), pp. 3–23.

④ P. Moore, “The Mirror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apitalism”, *Capital & Class*, vol. 44, no. 2 (2020), pp. 191–200.

⑤ A. Digna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Regulatory Response”,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no. 13 (2020), pp. 37–54.

四、国际分工与世界市场

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运行一直表现出发展与冲突并存的特点。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各国经济受到冲击,不稳定性加剧,经济摩擦层出不穷,全球化浪潮面临挑战。与往年相比,关于国际分工与世界市场的研究除了包含经典议题之外,贸易摩擦与日益突出的逆全球化趋势成为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的关注点,其中,中美贸易摩擦成为国外学者聚焦的热点问题之一。面对国际经济形势的诸多变化,2020年关于国际分工与世界市场的研究主要包含以下三个议题:(1)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涉及理论和现实分析两个层面;(2)全球价值链,包括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影响;(3)全球经济失衡、逆全球化与贸易摩擦。

(一) 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

关于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的研究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两部分内容,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对不平等交换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的新发展,现实方面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运用这些理论解释当前国际贸易中的具体经济现象。

在理论层面,芬格(Finger)对传统的不平等交换理论进行了反思。芬格指出,不平等交换是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关键。由伊曼纽尔(Emmanuel)首创的不平等交换理论由于并未审视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运行逻辑时的基本假定,从而得出“第一世界工人将作为劳动贵族,同资产阶级共同剥削第三世界劳动者,并退出无产阶级革命”的荒谬结论,传统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对于理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矛盾、冲突并不具有解释力。芬格强调,在重构不平等交换理论之前,首先需要对抽象劳动、异质劳动、转形问题、国际货币交换规律等一系列问题进行重新审视,重构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将为劳动价值理论提供有力支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并不会因为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价值的转移而消解,这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①

戈登(Gordon)和韦伯(Webber)则对当前地缘政治经济学和资本积累国际化理

^① B. Finger, "Unequal Exchange: Key Issues for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Critique*, vol. 48, no. 2 (2020), pp. 169 - 187.

论进行了批判性发展。戈登通过对当前存在的各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进行批判，指出其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局限性，并提出了一个理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框架，该框架突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复杂性、分层性的特点，重点关注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资本主义整体性、国家和资本的多元性以及由此构成的帝国主义链条中的世界秩序。^①

学者们也考察了国际不平等交换带来的结果。拜曼 (Baiman) 论证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价值转移的过程。基于谢赫 (Shaikh) 对美国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研究，拜曼通过对比不同数据期限下经典菲利普斯曲线 (CPC) 的表现差异指出，2008 年经济危机后，美国存在失业率增加、劳动者工资降低与财产性收入上升、利润份额扩大并存的现象。^② 拜曼认为，这种利润份额的扩大并非由于剩余价值生产能力的提升，而是全球范围的不平等交换引起的利润转移的结果，拜曼将这种经济现象称为“食利者”经济 (“rentier” economy)。进一步地，拜曼具体分析了 2014 年美国的广告和市场研究部门 (A&MR) 的价值转移，并以 Facebook 公司为例，将其作为微观层面的证据，进一步论证了美国由不平等交换获得利润转移的事实。^③

查拉基 (Chraki) 考察了国际经济组织成员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现象。查拉基运用 GMM 方法，研究 1995 年至 2014 年间北美自贸区 (NAFTA) 成员国之间的不平衡发展现象。作者指出，成员国之间的实际贸易条件 (即实际有效汇率) 并非由比较优势决定，而是受绝对成本优势的影响。实际贸易条件与两方面因素有关：(1) 相对实际垂直整合的单位劳动力成本 (RVIULCs)，(2) 部门内部利润率差异 (Rs)。通过计量结果分析，作者发现，实际贸易条件与 RVIULCs 的降低正相关，与 Rs 的扩大负相关。^④

总体来看，2020 年关于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的研究主要围绕不平等交换和世界体系构建展开，既包含对传统理论的新发展，又包含对全球经济现象的新解读，对于理

① T. Gordon, and J. Webber, “Complex Stratification in the World System: Capitalist Totality and Geopolitical Fragmentation”, *Science & Society*, vol. 84, no. 1 (2020), pp. 95 - 125.

② A. Shaikh, “Capitalism: Competition, Conflict, Cris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③ R. Baiman, “The Impact of Rent from Unequal Exchange on Shaikh’s Classical-Keynesian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The Example of Facebook”,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52, no. 2 (2020), pp. 239 - 258.

④ F. Chraki, “Tes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and Absolute Cost Advantage: A Dynamic Panel GMM Analysis from NAFTA”,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published online, (2020), pp. 1 - 5.

解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逻辑、解释现实问题具有启发性。

(二) 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 (global value chains) 是国际分工体系的重要内容。2020 年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主要围绕其对于主导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意义, 以及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利益分配的影响展开, 内容丰富, 角度多元。

巴廖尼 (Baglioni) 等从管理学的视角, 考察了全球价值链中生产的政治本质。其研究表明, 位于“微笑曲线”中高附加值端的企业和国家, 通过标准化、知识的集中控制等手段, 实现了对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控制, 影响劳动分工过程。巴廖尼指出, 管理的本质是阶级斗争, 全球价值链并非简单地意味着技术性劳动分工, 而是一种作为管理方式的政治组织形式, 全球价值链的构建不断地再生产出阶级对立, 实质上提供了一种对全球价值的占有形式, 而非价值生产方式。^①

杜兰德 (Durand) 等考察了全球价值链中存在的知识垄断现象。杜兰德指出, 无形资产的强化是全球价值链中新的市场势力的来源。文章提出了知识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 即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赋予无形资产以垄断力量。进一步地, 杜兰德将这一概念扩展到“信息租金”的范畴, 用于刻画由与无形资产生产相关的规模经济和网络外部性而产生的经济现象。全球价值链一体化需要密集的信息流通, 以传达规格、标准、技术诀窍以及成本和其他运营细节等。因此, 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的扩大与无形资产的流动增加密切相关, 需要在这一背景下评估在全球价值链与国际贸易中由无形资产产生的垄断行为。^②

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一直是理解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主流框架, 参与全球价值链环节被认为是产业升级的必要步骤。然而相关研究较少考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对其国内产业升级的影响, 对政府参与的理解较为局限, 贝胡里亚 (Behuria) 的研究补充了这部分缺失。贝胡里亚综合了全球价值链文献和政治解决 (political settlements) 文献的分析视角, 考察政府在卢旺达特色咖啡产业升级中扮演的角色。咖啡产业是卢旺达的重要经济产业, 不同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劣质咖啡出口战略, 1994 年, 卢旺达政府加强了对咖啡价值

^① E. Baglioni, L. Campling and G. Hanlon, “Global Value Chains as Entrepreneurial Capture: Insights from Management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7, no. 2 (2020), pp. 903 - 925.

^② C. Durand and W. Milberg, “Intellectual Monopoly in Global Value Chai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7, no. 2 (2020), pp. 404 - 429.

链的干预，制定了优先出口特种咖啡的宏观战略，自上而下推动特种咖啡的生产、销售各环节改革。最初卢旺达政府采取干预主义政策，强制咖啡农民转向特种咖啡生产的各环节。政府还同国内外烘焙商和零售商就参与国内咖啡价值链、接触农民生产进行谈判，以进入特种咖啡市场为目标，在促进国内咖啡产业升级中扮演了监管者、推动者和生产者的角色。干预主义战略在促进卢旺达咖啡出口份额提升、国内咖啡价值链升级与全球咖啡价值链参与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①

在全球价值链中，经济发展和环境升级是相互交织的过程。许多研究认为，通过环境升级，供应商可以改善其生产过程，通过减少浪费、优化资源使用和节约成本来提高运营效率，遵守当地环境法规以及买家的环境要求，也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受到经济处罚、罚款或取消订单的风险。供应商与买家的联系加强，竞争优势因此而提高。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发展中国家供应商在环境升级中难以获得上述收益。汗（Khan）等人以巴基斯坦服装企业为例，探讨其产业环境升级中面临的挑战。汗指出，对于供应商来说，环境升级同利润收益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甚至环境升级成本的扩大会限制其盈利能力的提升。环境升级是供应商与潜在买家建立商业联系的关键资格，提高生产环境质量并非供应商的自愿举措，而是为了获得销售渠道而不得不承担的、由买方转嫁的成本。在环境升级过程中，供应商们面临着“工厂经理困境”（factory manager dilemma），即环境升级成本高、买家价格压低、采购行为不可持续、需求季节性变化等一系列压力，这些因素使发展中国家供应商无法兼顾经济盈利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从而陷入“悲惨的绿色增长”（immiserizing green growth）的困境。^②

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制定大多以全球价值链为导向，许多研究认为在这一背景下本国的传统产业政策的影响力下降。奥迪杰（Odijie）的研究反驳了这一观点。该研究以尼日利亚水泥产业为例指出，尽管当前尼日利亚的产业政策制定以参与全球价值链为核心，但是传统的产业政策仍然对于建立起完整的国内产

① P. Behuria, “The Domestic Political Economy of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How Politics Shapes Pathways for Upgrading in Rwanda’s Coffee Secto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7, no. 2 (2020), pp. 348–376.

② M. Khan, S. Ponte and P. Lund-Thomsen, “The ‘Factory Manager Dilemma’: Purchasing Practices and Environmental Upgrading in Apparel Global Value Chain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vol. 52, no. 4 (2020), pp. 766–789.

业链具有重要意义，传统产业政策是制定以全球价值链为导向的产业政策的先决条件。^①

在全球价值链主导的分工体系下，还伴随着由不平等交换带来的全球贫困链（global poverty chains）现象。塞尔温（Selwyn）等通过考察东欧、中欧出口鞋类部门在过去三十年间经历的经济、社会倒退情况指出，在当前的全球分工体系下，存在着基于性别的对劳动者的强烈剥削，发展中国家劳动者面临着危险的工作条件、极低的薪酬等困境。塞尔温从性别政治经济学（gendered political economy）的视角，对全球贫困链的出现进行了分析，强调这种贫困在世界范围内是相当普遍的，因此，需要从更具批判性的视角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进行考察。^②

相对于主流文献，2020年国外政治经济学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更具批判性，在看到全球价值链拓展带来的福祉的同时，还关注到其背后蕴含的利益分配关系，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居于主导地位，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主要获益者通过不平等交换赚取高额利润，而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在进行本国产业升级时仍然面临着价值剥削、产业链低端、环境成本转嫁、劳动者贫困等问题。

（三）全球经济失衡、逆全球化与贸易摩擦

21世纪是全球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也是充斥着全球经济冲突的时代。2020年，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诸多矛盾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表现为逆全球化趋势的流行以及国际贸易摩擦的层出不穷，其中又以中美贸易摩擦最具代表性。2020年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研究主要围绕对逆全球化浪潮的反思展开，还有许多研究着重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登特（Dent）将21世纪初的国际贸易情况同19世纪的情况进行了对比，指出这两个时期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民粹主义抬头，贸易保护主义和关税战争升级，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上升，经济超级大国快速崛起带来世界秩序的变动，是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特征。进一步地，登特运用经济民族主义、全球化和国家依附等概念范畴对英国

^① M. Odijie, "Is Traditional Industrial Policy Defunct? Evidence from the Nigerian Cement Indust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7, no. 3 (2020), pp. 686 - 708.

^② B. Selwyn, B. Musiolek and A. Ijarja, "Making a Global Poverty Chain: Export Footwear Production and Gendered Labor Exploitation in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7, no. 2 (2020), pp. 377 - 403.

脱欧、特朗普的经济政策等进行了具体分析，为更好地理解当前和未来全球经济发展格局提供了见解。^①

科莫洛夫 (Komolov) 对当前存在的逆全球化趋势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大停滞”进行了分析。科莫洛夫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一场全球化危机，世界贸易活动和资本流动减少，保护主义倾向加剧，各国在货币战争和制裁制度中的相互对抗愈演愈烈。这些逆全球化现象与最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有关。当前世界体系中，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不平等、金融化、失业、科技进步放缓等现象反映出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持久性“大停滞”时期，2008 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体现了这一点。^②

中美贸易摩擦是逆全球化趋势的具体表现之一，2020 年，中美贸易摩擦的全球性影响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韦伯 (Weber) 等分析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 (CCT) 是大多西方发达国家制定政策的主要依据。该理论认为，在市场自由的情况下，贸易平衡是其自然趋势，持续的贸易不平衡被解释为由外汇干预促成的汇率操纵导致，因此许多主流经济学研究将中美贸易不平衡归结为中国对实际汇率的操纵。然而比较成本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存在问题的，外源性资本流动和外汇干预可以暂时改变名义汇率，但不能改变长期实际汇率和贸易平衡状态，这两者与实际成本竞争力挂钩。相比之下，绝对成本理论 (ACT) 更具解释力。该理论认为，即使在自由竞争的国际贸易中，贸易持续失衡的情况也会存在。据此，在分析了比较成本理论对于解释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诸多问题后，韦伯指出，中美两国的实际成本差异才是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③

丸川 (Marukawa) 从日本学者的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产生原因，以及其对中美、日三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丸川认为，当前美国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限制，其目的与冷战时期的出口限制措施类似，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经济战争的武器。丸川通过回顾美国出口管制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以及日本和中国卷入这场经济战争的经历后指出，当前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措施的效果将远不如冷战时期的有效，而且对

① C. Dent, "Brexit, Trump and Trade: Back to a Late 19th Century Future?", *Competition & Change*, vol. 24, no. 3-4 (2020), pp. 338-357.

② O. Komolov, "Deglobalization and the 'Great Stagnation'",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 10, no. 3 (2020), pp. 424-439.

③ I. Weber and A. Shaikh, "The U. S. - China Trade Imbalance and the Theory of Free Trade: Debunking the Currency Manipulation Argu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no. 3 (2020), pp. 1-24.

于执行国美国来说，实施制裁措施也将为其带来经济上的困境与痛苦。^①

以上研究对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逆全球化、贸易冲突等现象进行了分析，揭示了这些现象背后隐含着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下，必然会产生这些矛盾和冲突。对以上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并为分析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供国际视角。

五、卫生政策与新冠疫情

新冠肺炎大流行这场重大的健康危机给全球卫生系统带来了沉重负担，并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巨大冲击，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失业、公司倒闭、剥削增加以及普遍的饥饿和贫困。同时，封锁和社交距离的限制也对社会秩序产生了负面影响。政治经济学学者将新冠疫情与资本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的全球不平等加剧和生态环境恶化等现象相联系，并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针对如何更好地应对此类冲击提出了启发性见解。

（一）卫生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新冠疫情全球流行之前，就有政治经济学学者关注了全球卫生治理的制度基础和影响全球卫生治理成果的基本因素，推动了这一跨学科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许多有力的理论研究都指出公共卫生事件所暴露出的卫生系统的脆弱性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社会经济基础的。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RIPE）2020年1月份专刊就预见性地揭露了新自由主义卫生政策背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系统性弊端。

塞尔（Sell）和威廉姆斯（Williams）指出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由社会关系和嵌入的制度关系组成，是引导全球卫生状况恶化、疾病传播的“媒介”。资本主义一方面通过结构性因素如制造贫富差距、恶劣的生产条件和有害产品威胁人类健康；另一方面通过超结构性因素如制定不合理的财政紧缩计划、贸易政策和药品食品监管措施对全球卫生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资本主义作为支配性的全球体系本身具有致病性，对人类健

^① T. Marukawa, “Export Restrictions in the Japan-China-U. S.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The Japanese Political Economy*, vol. 46, no. 2-3 (2020), pp. 152-175.

康构成了根本挑战。^① 施雷克 (Schrecker) 批判了卫生政策忽视与不平等有关的限制因素而强调生活方式的选择的特点, 这使不同阶级享受卫生服务的差距扩大。这体现了新自由主义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本质, 其加剧不平等并对全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问题不容忽视。^②

关于新自由主义卫生政策和健康结果的具体联系, 莫斯 (Moth) 考察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HS) 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的制度重组, 指出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后, 心理健康从业人员的劳动去技能化且强度增加, 同事之间互助性的结构被打乱了, 用户也越来越被强制塑造为管理个人风险的消费者, 从而社区心理健康组 (CMHT) 不能提供全面和平等的心理健康服务。^③ 努内斯 (Nunes) 则指出, 新自由主义的宏观制度通过对社区、家庭和个人的不利影响导致了卫生系统的脆弱性。他以巴西应对寨卡病毒的日常经验为切入点, 提出了被忽视的关于健康的日常政治学。这一理论框架适用于分析社区卫生工作者, 即医疗保健提供者作为连接卫生系统和弱势群体的工人, 与全球新自由主义财政紧缩、私有化一致, 他们的低工资和工作的不稳定性阻碍了巴西有效地应对寨卡病毒。^④

海丝特 (Hester) 和威廉姆斯 (Williams) 的研究指出了世界范围内不平等生物信息交换制度的存在, 即发达国家制药业免费获得受疾病影响国家向世卫组织提供的病毒信息和生物标本, 生产疫苗等产品并申请专利, 再以高价卖回发展中国家。当然, 从另一方面来说生物信息交换和共享使得具有强大数据基础设施和先进的研究、制造能力的国家可以通过挖掘病毒数据库来保障全球卫生安全, 并生产医疗产品。因此, 他们认为应当克服资本主义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剥削, 促进生物信息交换并利用其生产潜力。^⑤

① S. Sell and O. Williams, "Health under Capitalism: A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f Structural Pathogenes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7, no. 1 (2020), pp. 1-25.

② T. Schrecker, "Globalization and Health: Political Grand Challeng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7, no. 1 (2020), pp. 26-47.

③ R. Moth, "'The Business End': Neoliberal Policy Reforms and Biomedical Residualism in Frontline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Practice in England", *Competition & Change*, vol. 24, no. 2 (2020), pp. 133-153.

④ J. Nunes, "The Everyday Political Economy of Health: Community Health Workers and the Response to the 2015 Zika Outbreak in Brazi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7, no. 1 (2020), pp. 146-166.

⑤ R. Hester and O. Williams, "The Somatic-Security Industrial Complex: Theoriz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alized Biolog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7, no. 1 (2020), pp. 98-124.

（二）资本主义制度与疫情

一些学者指出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大流行和资本主义制度关系密切。福斯特（Foster）和苏万迪（Suwandi）通过梳理流行病学的革命性发展指出，在全球价值链中，从事单一基因作物或物种混合种植农业的综合企业，不顾自然和社会限制滥用土地、劳动力和生态系统，从而破坏了生态系统和物种之间的关系，导致生态灾难和新冠肺炎流行的连锁反应。而全球商品生产链条也被扰乱甚至中断，出现物资短缺问题和现金流危机，金融风险大幅上升。^①

图尔岑（Turshen）和莫妮（Mony）更具体指出，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为了满足全民保健的需要，推动了公共卫生资源和服务的金融化，但是这一变化反而助长了金融投机行为，导致多国出现系统性的健康不平等，从而加剧了新冠病毒的影响，并引发粮食安全危机等新问题。^②

华莱士（Wallace）等的研究发现，全球资本循环和扩张破坏了区域环境的复杂性，提升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交通运输效率，并促进了牲畜繁殖的工业化，从而使有毒病原体缺乏自然选择，致命性更强，更多样化，也更易跨越生态和政治边界在更广泛的区域传播。他们认为应当从根本调整人类适应自然的模式，以及施行医院国有化、药品社会化等计划制度。^③

面对疫情期间全球健康和经济危机对当前资本主义秩序和新自由主义原则的挑战，普利姆罗斯（Primrose）等人指出在工人阶级等弱势群体更易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的治理逻辑仍将病毒视作对本国政治经济秩序构成威胁的外源性冲击，而非需要共同对抗的、危害人类健康的敌人。因此西方政府并未纠正 40 年来新自由主义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有害影响，作者也对新冠肺炎流行能否促使新自由主义进行实质性转变持消极态度。^④

① J. Foster, and I. Suwandi, "COVID-19 and Catastrophe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vol. 72, no. 2 (2020), pp. 1 - 20.

② M. Turshen and A. Mony, "The COVID-19 Pandemic Exposes Fatal Health Inequities", *Monthly Review*, vol. 72, no. 6 (2020), pp. 28 - 39.

③ R. Wallace, A. Liebman, L. Chaves, and R. Wallace, "COVID-19 and Circuits of Capital", *Monthly Review*, vol. 72, no. 1 (2020), pp. 1 - 13.

④ D. Primrose, R. Chang and R. Loepky, "Pandemic Unplugged: COVID-19, Public Health and the Persistence of Neoliberalism", *Journal of Australian Political Economy*, no. 85 (2020), pp. 17 - 28.

（三）社会主义与疫情

还有学者强调新冠危机启示了对全球现有治理模式的改革，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吸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从而更好地应对健康不平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当代挑战。

德赛（Desai）认为美国和中国在疫情期间的表现迥异的根源，在于这两个社会对经济的组织方式尤其是货币和信贷体系的组织方式截然不同。相较美国，中国的银行体系仍以满足生产性经济而非小部分金融精英的需求为关键。他认为疫情压力下，应当结束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单方面支配，奉行更加注重社会管理、以生产为导向、平等的国家经济。^①

马丁内斯（Martinez）还指出中国面对疫情的及时反应和良好防控得益于社会主义经济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优先于经济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公共卫生领域实施财政紧缩相反，中国动员了前所未有的技术、科学和人力控制疫情，并率先与世界卫生组织分享病毒基因序列，因此在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和保护最基本的人权方面，社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更具优越性。^②

古巴应对疫情的经验同样值得关注，菲茨（Fitz）阐明了古巴在医疗体系改革后，医疗保健范围从大城市扩大到最需要的农村社区。在苏联解体和美国封锁的背景下，古巴医疗体系克服了艾滋病危机，因此在面对新冠肺炎流行时，这一基础也使古巴能够有效地进行国内联合防控和国际医疗援助，比如迅速实行封锁和检测等防疫计划，免费分发药物，改造国营工厂设备生产口罩以及向塞拉利昂等国派遣志愿医生和护士。^③

六、对社会主义的讨论

近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家间经济冲突

① R. Desai, "The US vs China: Economic Models in the Pandemic Stress Test", *The Japanese Political Economy*, vol. 46, no. 2-3 (2020), pp. 102-126.

② C. Martinez, "Karl Marx In Wuhan: How Chinese Socialism Is Defeating COVID-19",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 10, no. 2 (2020), pp. 311-322.

③ D. Fitz, "How Che Guevara Taught Cuba to Confront COVID-19", *Monthly Review*, vol. 72, no. 2 (2020), pp. 21-30.

加剧，资本主义的矛盾日渐凸显。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进一步冲击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暴露出其弱点。以此为背景，2020年有关社会主义的探讨明显增加，成为年度的一个重要热点，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作为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社会主义，及其可行性和进步性。

（一）理论与思想史

首先回顾一下对于社会主义问题相对“理论化”的讨论。

弗利（Foley）在2020年度撰写了一组长篇文章，对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争论的历史脉络做了思想史的分析。他关注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讨论的一条重要线索：复杂的、异质的生产如何通过一个系统相互协调。这个线索深刻地体现在马克思本人对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部分继承和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批判当中。在此基础上，弗利用系统科学的思想将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归类为自上而下的控制论思想和自下而上的自适应系统两个逻辑。前者包括了计划经济理论、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早期尝试和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争论等等，后者则包括了市场社会主义、工人合作社等相对“分散化”的理论与实践路径。在做了上述归类之后，弗利并没有对两种思路进行优劣对比或者折中，而是进一步提出了在上述理论和实践中都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如何在分散化的生产过程中解决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不平等问题。许多理论、经验研究和对社会准实验的观察，都能够发现相对平等的、分散化的生产会不断再生出高度不平等的收入和财富分布，其机制可能并非各种具体、偶然的制度、历史因素，而是相当一般性的。第二，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并非简单的改变所有权，而是需要解决一系列联系着的问题：生产资料所有者收益的获得、生产主体的再生产以及不同生产主体之间生产资料的分配。第三，雇佣劳动制度的替代。以上不同的问题对于两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路径而言，其挑战性和解决路径可能是不同的。这暗示了两种路径之间深层次的关系。^{①②}

伊藤诚（Itoh Makoto）讨论了一个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相对传统的问题：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定价以实现价值规律的作用。伊藤诚给出了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让工资和剩余成比例，也即剩余价值率在不同部门之间相等。在这种条件下，价

^① D. Foley, “Socialist 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 I: Marx to Hayek”, *Review of Evolutionary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3 (2020), pp. 297–311.

^② D. Foley, “Socialist 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 II: Vienna to Santa Fe”, *Review of Evolutionary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3 (2020), pp. 313–328.

格等于价值。伊藤诚以此为“基准”比较了不同社会主义运行方式下的价格模式：在苏联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条件的限制，价格实际上是一种成本加成定价，这类似于一种“斯拉法价格体系”；而在“市场化”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则更多的是现实中的竞争价格。由此伊藤诚引申出两个进一步的议题。第一，在“基准”的定价模式下，可以通过先将新增价值发给工人再征税的方式获得社会剩余；而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当中，由于工资是先定的，剩余的获取权掌握在企业的控制者手里而不是工人手中，这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第二，如果我们试图将价格、收入和价值联系起来，那么如何解决复杂劳动的问题？伊藤诚的回答继承了经典作家的想法：相当一部分复杂劳动的再生产过程不再是由劳动者自己出资完成，因此在工人的报酬当中无需考虑这个部分。尽管有相当多的理论试图以此为突破寻找社会主义条件下差异化收益的合理性，但在理论上这却是很难成立的。^①

相较上述两位学者对社会主义传统议题的讨论，福斯特（Foster）的研究则秉承了他对于环境问题一贯的关注，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分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路径和方向。在可能性上，他提出了“全球环境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个概念的理论逻辑来自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提到英国工人阶级并不仅仅在劳动过程中被剥削，还受困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造成的环境状况的恶化。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激化了全球尤其是南方国家人民与中心国家资本之间的矛盾，这将能够成为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动力。在实现路径上，福斯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全球矛盾日益激化、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法西斯化的情况下，任何社会民主党式的运动、不破坏现有政治框架的运动都是难以奏效的。而在方向上，福斯特强调了共产主义两个阶段之间的联系：不能将社会主义视作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而应该将其视作一个以资本主义为起点向共产主义不断过渡的过程。^②

（二）关于计划问题的再讨论

社会主义的一个优越性正在于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这不可避免地和国民经济的计划过程联系在一起。尽管计划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被“符号化”，并成为市场经济的“反面”，但是随着近年来信息通信技术前所未有的发展、企业规模和

^① M. Itoh, “Marx’s Theory of Value for Socialism”, *The Japanese Political Economy*, vol. 46, no. 1 (2020), pp. 83–93.

^② J. Foster, “The Renewal of the Socialist Ideal”, *Monthly Review*, vol. 72, no. 4 (2020), pp. 1–13.

组织形式的变化以及人们对于市场运行过程的进一步认识，国民经济的计划过程再次被作为严肃的学术对象加以讨论。

在长久的理论争论当中，计划被认为是无效率和缺少激励的，聂托 (Nieto) 和马特奥 (Mateo)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回应：一方面，在关于计划无效率的说明——尤其是奥地利学派的阐述——中，效率实际上恰恰是以私人商业活动和市场来定义的，这带来了一种无意义的同义反复；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将计划和“中央计划”或者“集中计划”划等号，计划本身是允许分散化的决策过程的，而分散化的决策是可以利用默会知识、激励创新的。^①

另外两篇文章则将这种理论说明向前推进了一步，试图阐述一些可能且有效的计划方式。哈内尔 (Hahnel) 和科克霍夫 (Kerkhoff) 在一篇相对形式化的文章当中解释一个单部门经济如何能够利用技术和消费者偏好的信息来获得较有效率的计划。其核心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计划结构的时间嵌套，长期计划随着短期计划进行更新，短期计划随着时间的变化和新信息的获得进行更新，从而减少计划过程中信息不可得带来的偏误；二是不同的信息和计划由不同的代表性组织提供，消费信息和技术信息分别由消费者和劳动者系统提供，从而减少激励问题。^② 莱伯曼 (Laibman) 则用比较平实易懂的方式，重述了他在 2011 年的一篇相对形式化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核心旨在构建一个多层次的计划系统，系统的协调和信息的获取依赖一个多层级的计划体系，中央计划者率先进行计划，然后地方或企业再根据自身的信息进行计划，地方计划可能与中央计划存在不一致，这时中央计划者再根据地方计划进行修改，最后不断迭代，收敛到中央和地方一致的情形。同时，为了让企业或地方计划者能够有激励去反映自身的真实信息，对地方计划者的奖励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地方计划者的计划水平，计划的目标越高收益越高；二是目标和实际结果差异的绝对值。二者的权衡取舍能够使地方计划为了自身收益最大化而进行有效的计划。同时莱伯曼还进一步分析了这种计划得以实行的技术和劳动过程基础。^③

可以看到这两篇文章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他们关心的问题是相似的，都是如

① M. Nieto and J. Mateo, "Dynamic Efficiency in a Planned Econom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without Markets", *Science & Society*, vol. 84, no. 1 (2020), pp. 42 - 66.

② R. Hahnel and A. Kerkhoff, "Integrating Investment and Annual Planning",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52, no. 2 (2020), pp. 222 - 238.

③ D. Laibman, "Incentives, Optimization, and Democratic Planning: A Socialist Primer", *Science & Society*, vol. 84, no. 4 (2020), pp. 510 - 535.

何在计划中实现信息的有效组织和对个体进行激励。而二者的关注点有一些微妙的“互补”关系：哈内尔和科克霍夫的文章关注的是时间方向上的问题，主要是宏观动态和各种信息的变化，而莱伯曼关注的则是横截面上不同层级之间的组织。

图多雷亚努 (Tudoreanu) 和科兹 (Kotz) 则关注了计划条件下的创新问题。计划经济在很多时候被认为是缺少创新动力的，而两位作者首先说明历史上的计划经济表明，高度集中的计划在创新方面尽管存在一些结构上的问题，但是也存在多方面的优势，并且通过计划和经济的民主化，可以在保留集中计划的前提下保证计划过程能够更多反映人民的偏好。但是民主化的计划过程会揭示社会主义创新过程一个更深层次的矛盾：创新本质上是一种破坏，会破坏原有的生产结构，造成收入、就业、劳动过程意义上的不稳定，这对于劳动者而言是不合意的，因此在获得创新带来的更好消费品和保持自身工作环境的稳定之间就会存在一种权衡取舍。在考虑了这种权衡之后，社会主义计划的创新可能会比资本主义更“温和”，而如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的话，计划创新过程的这种相对缓慢和保守的倾向就会随着时间积累，影响社会主义的稳定性。文章的作者分三种情况探讨了这种矛盾的解决。第一，在马克思设想的经典情况下，如果最发达的国家首先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那么问题就不会存在。第二，如果世界经济处在快速自动化的浪潮中，快速自动化带来的产业后备军会降低工资，从而阻碍自动化的使用，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采用自动化技术会存在“自限性”，而社会主义不存在这个问题，从而能够弥补前述问题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的滞后。第三，如果上述两种特例没有发生，作者提供了四种可能的手段：首先是改变就业保障过程，采用更加灵活的就业保障方式；其次是通过非经济的方式，如群众运动和动员来实现技术的赶超；再次是进行国际贸易；最后一种则尤为有趣，是建立一个“二元经济”，劳动者在两个部门——一个有保障的、稳定的部门，另一个是灵活的、不稳定的部门——进行劳动，劳动者可以在不同部门之间分配时间。这种“二元经济”能够在兼顾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的同时，激励劳动者进行“创造性毁灭”。^①

七、结语

2020 年，经常刊发政治经济学论文的 40 多本英文期刊，总计大约刊登了 1 500 篇

^① M. Tudoreanu and D. Kotz, “Stable Jobs or iPhones? The Dilemma of Innovation in Socialis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52, no. 4 (2020), pp. 642–649.

左右的文章。想要对这些研究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概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此我们的报告采取了一种相对“聚焦”的方式：在文献相对充分的领域，将一些相互联系着的研究加以串联和总结。并且，我们希望这些研究能够具有一定的“一般性”：这些研究无论是从对象、方法还是理论上，应该不局限于论文本身，而是能够在更广大的范围上具有借鉴意义。本报告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来展现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研究范式、方法和旨趣，为国内学者的研究提供一些线索和启发。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学界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界的交流和互动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高质量的成果。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实际上使得我们定义“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变得相对困难。在本报告当中，我们采取以研究者的工作单位为准这种简单的办法，而将主要活跃在国内学术界的学者在国外发表的成果作为我国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的一部分。

Annual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China (2020)

*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ditorial Notes: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ic research in both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issues and to better serve China'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from 2010 onwards, NISPECC began to publish Annual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China. The reports focus on a variety of topics to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in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ic research and to discuss the problems as well as the orientation of further development. The reports do not aim to cover all the topics but to focus on major topics in political economy instead. We hope the reports can highlight the features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China and the path of its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further research.

The 2020 Annual Report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1. Research on Marxian theory and classic works;
2.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3. Research on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of accelera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4. Research on the decisiv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and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5.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on China's income distribution pattern;
6. Research on the new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open economic system;
7. Research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digital economy;
8. Research on monetary and finan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9. Recent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abroad.